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臧國仁博士

官方消息來源之模糊傳播研究

—以馬英九總統受CNN訪談內容為例

Equivocal communication of the official news sources: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CNN's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Ma Ying-jeou

研究生：劉伶伶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一月

謝辭

終於完成碩士論文，感謝臧老師兩年多以來的指導和耐心，論文撰寫對我是很大的挑戰，幸好有老師嚴謹且悉心的指引，讓我一步一步完成這份得來不易的論文。心裡對老師有太多的感謝，這一路上老師不僅在學術領域上給予指導，同時更深刻體會老師的關切，記得研究之初老師即多次叮嚀千萬別為了做研究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但見我心已有所屬，卻也只好陪著我冒險。謝謝老師的付出，尤其我每次都是利用中午時間，拿著論文草稿衝到學校找老師討論，佔用老師不少讀書、思考的寶貴時間。也要感謝口試委員黃老師、陳老師對論文提出寶貴的意見，在此深表謝忱。當然，本論文如有任何謬誤，仍應由作者自負責任。

在論文撰寫的過程中，面臨諸多挫折和瓶頸，個人的情緒也經常波動，家人的支持和體諒，一直是驅策我的原動力。謝謝雙親的包容，修業期間一直要我以學校課業為重，相對的減少了回家相聚的機會；謝謝老公盈洲無怨尤的配合著我外出工作寫稿及在校修課期間獨自照顧著兩個孩子，同時更要感謝他在這段期間受了我不少氣，為了論文與我有多次的辯論，即使都被迫口頭認輸，但仍不間斷地鼓勵我，有助於我釐清部分研究方向和思緒；當然也要謝謝兩個可愛乖巧的女兒田霓及田薔貼心體諒，陪著我渡過這一段艱辛美好的歲月。

此外，感謝新聞局長官適時的提點及鼓勵；感謝在新聞媒體工作的記者好友協助，為避免困擾，姑隱其名；還有謝謝麗芳助教的諸多協助，讓我順利完成這本論文。

最後想說的是：

A diplomat must always think twice before he says nothing.

這是愛爾蘭流傳的諺語，有點嘲諷，但觀諸台灣政壇，庶幾近之。當我選擇研究模糊語言，蒐集資料及撰寫這篇論文的過程，一直想起那句諺語，會心一笑。所以，最後也要謝謝政治人物，因為他們的發言內容，讓我們的研究題材，永遠不會匱乏、枯燥。



摘要

長期以來，有關新聞訪問中的模糊語言實際運用並無具體化分析成果，本研究藉由現任總統馬英九接受國際媒體 CNN 專訪之研究，以論述分析法逐一分析問句及答句，具體歸納出了模糊語言之運用方式。

本研究在文獻回顧章節透過面子威脅、雙避衝突及組織框架等理論來探討官方消息來源如何使用模糊語言，再以論述分析法逐一探討提問者問句與受訪者答句間之對應情形，並納入語境因素，試圖尋找出官方消息來源常見之模糊語言形式。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內官方消息來源在衝突性提問中確實經常引用模糊語言作為回應媒體提問之方式，不論國內或是國外消息來源均偏愛採取「製造政策重點」之模糊語言方式回應，國內官方消息來源尤其青睞採取「製造政策重點」中之「提出新的論點」、「自我肯定」及「未來作法及期待」等項目，主要是基因於模糊語言類型的運用具有「看似言之有物」、「轉移焦點」、「離開情境」、「不冷場」及「較不容易出錯」等優點，至於負面效應則是引發媒體的「追問」，但由於問答劇本之設定及訪問時間等有利因素，消息來源之模糊語言並無礙於專訪之進行。

關鍵詞：模糊溝通、面子威脅、雙避衝突、框架

Equivocal communication of the official news sources: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CNN's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Ma Ying-jeou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equivocal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on the effect of equivocal language and source credibility, in interviews between the press and its official sources. An unedited version of CNN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Ma Ying-jeou on April 30, 2011, was used in this study in order to find out how equivocal language, if any, was involved.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literature of face-threatening theory, avoidance-avoidance conflict and frame analysis, this research centers on two levels: first, how the officials choose/manipulate the wording of answers in interviews; and second, what the syntax differences are between questions and answe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official sources, when facing harsh questions, usually turn to equivocal language and intend to induce avoidance towards certain questions. The technique that an official frequently adopted is “making political points,” i.e., to divert attention by “presenting policies,” “talking up one’s own side,” and “making pie in the sky.”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quivocal language, therefore, are mainly resulted from the fact that it might trigger more aggressive follow-up questions from the press. Nevertheless, officials still maintain an upper hand over the press in the wake of Q&A time restraints and the constant stress to beat deadline.

Keywords: equivocal communication, face-threatening theory, avoidance-avoidance conflict, frame analysis

目錄

第一章 源起：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之探析	1
第一節 源起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	5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相關研究簡述	7
第四節 研究問題	11
第五節 研究價值及重要性	13
第二章 文獻探討－官方消息來源之模糊語言	15
第一節 新聞與真實	15
第二節 模糊傳播	23
第三節 消息來源之模糊傳播	32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8
第一節 論述分析法	38
第二節 研究架構及重要概念定義	42
第三節 研究過程	49
第四節 研究流程及前測	51
第四章 研究資料分析與說明	67
第一節 問答分析	67
第二節 語境及成因分析	105
第三節 綜合分析	121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125
第一節 研究摘述	125
第二節 研究發現綜述	127
第三節 研究意涵	136
第四節 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之建議	140

參考文獻

中文參考書目..... 146
英文參考書目..... 148

附錄

附錄一：媒體對吳院長回應之相關報導..... 156
附錄二：本研究樣本全文157



論文題目：「官方消息來源之模糊傳播研究—以馬英九總統受 CNN 訪談內容為例」

第一章 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之探析

第一節 源起

案例一：

記者問：王建瑄院長說現在公務員體系裡面有很多的笨蛋，他說有一大堆笨蛋，他說做不好就應該下台，就像是劉內閣做不好下台，換成吳內閣。那您怎麼看呢？監察院長這樣子講的一個評論，是不是真的就像他講的一樣，公務員裏面有很多還是要檢討的？

行政院長吳敦義答覆：我想公務員的人數很多，從地方到中央有幾十萬人，包括...。假如廣義地講是軍公教，那當然軍公教人員基本上守法、守紀，又循規蹈矩的是...應該是絕大多數，最好是每個人都非常聰明、那麼伶俐，既能做事又能說話，那能力很好、品德有很好，恐怕就不全然。有些可能比較會做事，可能說話比較不是那麼擅長，有些人可能比較能夠表達，但是做事也許速度比較慢，這個不一而足，一定有些缺點嘛！但是人不可能十全十美，又長得很好，然後行動又很快，然後做事又很棒，品德又很好，口才又很好，像這種大概就不是隨處可得，所以我們用人因材施教，然後因人來用這個人，有些口才很好的，你儘量讓他在跟民眾接觸多個部門，也許比較容易把政府的政策說明的很清楚，有些口才比較拙一點的，就讓他們默默的為國家做事，我覺得他也可以在他的崗位上做的很好，那有些效率比較快，你要他小心一點，有效率比較慢，你也許幫他多一點，很快的就容易...容易因為快而出一點錯嘛，那你要包容他、幫助他，那有些速度比較慢，你一定要多幫他一點，希望他們加快一些，那這是最基本的嘛！所以王院長講的也不是絕對沒有，但是我想絕大多數，你只要好好發現他的才能，用他的才能，那麼讓他比較短處的地方，多幫忙他一點，我想也就能夠發揮比較大的戰力。

記者：會覺得他這樣子講有一點...就是...太尖銳了？

吳院長：嗯...也不能說通通沒有見地，如果每個用人都要求他十全十美，那這個天下可以用的人就不是這麼多，就跟人生小孩一樣嘛，你說你生五個、三個、八個小孩，說個個都拿諾貝爾獎也不太可能，那有些他能夠安份守己，有很好的品德，願意為社會多做好事，我覺得也是國家的資產，我們不要用負面的眼光去看他，謝謝！謝謝！好！

（取自 2009 年 12 月 25 日行政院吳敦義院長回應媒體記者問答內容，
依據記者訪問現場之錄音檔整理紀錄）

上述案例出自稍早媒體記者與行政院長吳敦義間的一段對話。由其所錄可知，吳院長當時並未針對記者所問（王建煊說「公務員體系裡面有很多的笨蛋？」「...，【公務員】做不好就應該下台？」...，「公務員裏面有很多還是要檢討的？」；見案例一畫底線處）回應，改以與提問無關之方向說明。而記者並未追問，可能原因在於其已由吳院長所說內容獲得可撰稿（或撰寫廣電報導）之新聞素材（媒體報導全文見【附錄一】）

若從上述案例之中央社報導結果來看，官方消息來源（如吳院長）所言與記者提問問題似無直接關連，問答間僅有部份關鍵詞重複，記者提問之作用亦僅在於引發話題進而促使消息來源提出看法或說明，至於其所答內容是否與原提問相關則不盡然。又如下例：

案例二

劉薰愛：我覺得... 這個就是我的身分證（手持身分證）。

記者 A：這是什麼時候開始拿的？

劉薰愛：這就是我的身分證啊！

記者 B：你是因為想進演藝圈所以才有... 才有所改變的嗎？

劉薰愛：也不是耶！就是我一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就是以我這樣的型態。對。

記者 C：從高中到現在，你在身材上面有做過什麼樣的變動嗎？

劉薰愛：嗯~我一直以來都是...，就是 172 啊！（劉的手勢做了些微左右擺動）
然後就是，... 這樣的身份。

記者 D：我們這樣子問好了。這次就是因為有一個你高中的學弟爆料，說你過去是男生，你是學長，你可不可以直接回應這個問題？

劉薰愛：嗯...，我覺得以前不重要，現在我很...，非常喜歡我現在這個樣子，而且我非常熱愛我現在的工作。

記者 A：那觀眾都很好奇就是爆料的真實性，對，你要不要自己講一下？

劉薰愛：嗯~就我還是...，就還是劉薰愛，嗯...。

記者 C：他【爆料學弟】說你以前是他的學長，不是嗎？是真的嗎？

記者 E：劉子華是誰？

劉薰愛：嗯~我覺得劉薰愛現在是我的名字，對，我也非常喜歡我現在的名字。

記者 E：曾經叫劉子華嗎？

劉薰愛：嗯~我現在的名字叫劉薰愛。

記者 D：我們是問你以前是叫劉子華嗎？

劉薰愛的助理：劉薰愛是因為她這個...，算命的說妳這個...。

劉薰愛：對... 對...。

記者 E：有改過名字？

（記者群：有改過名字嗎？）

劉薰愛的助理：薰愛也是她這個算命的說為了...。

劉薰愛：對... 對...。

（劉面對記者的一再詢問始終保持笑容...）

(2010年1月15日劉薰愛被爆變性自清記者會，問答取自 Youtube 網站

NowNews 劉薰愛被爆變性自清記者會採訪畫面)

在〔案例二〕中，受訪者劉薰愛同樣極力迴避記者提問。如記者問「這【指身份證】是什麼時候【才】開始拿的？(增添語句出自本文，見記者 A 提問)」，劉薰愛回說，「這【本來】就是我的身分證啊！」，間接回答了記者所質疑之「身分證是後來所發」的假設。記者 B 隨即再問，「你是因為想進演藝圈所以才有所改變的嗎？」，劉薰愛則強調，「我一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就是以我這樣的型態。對。」，再次否定身分證是「後來所發」之提問。同理，記者 C 質疑「從高中到現在，你在身材上面有做過什麼樣的變動嗎？」，劉則以一貫方式答曰，「嗯~我一直以來都是...，就是 172 啊!...」。

從以上二例觀之，記者與受訪者間幾可說是「諜對諜式」的問答流程：一方極力想要透過持續「追問」(翁維薇，2000) 索取相關資訊以釐清真相，另一方則不斷閃躲拒絕「就範」，兩者間的語言互動充滿了爾虞我詐，誠屬有趣人際互動現象。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由於工作職場長期接觸官方消息來源回應媒體記者之訪問，經常耳聞媒體記者抱怨「他（指官方消息來源）根本沒有回答問題嘛」、「有講跟沒講一樣」，甚至有媒體稱消息來源的回應簡直就是「鬼打牆」來形容，亦即消息來源「問答不相符」的情形十分普遍，可見其（消息來源）面對媒體提問時實多採「實問虛答」之「模糊語言」策略。

實際上，中外文獻均曾發現官方消息來源發言多常透過「媒體策略」(media strategies)與新聞單位互動與溝通，藉此爭取成為媒體報導之內容。翁秀琪(1996)即曾指出，「媒體策略」是消息來源為了能上媒體版面所發展出來的文字的（如背景資料）、新聞發布的或行動的（集會公聽會、示威遊行）策略。

除上述媒體策略外，官方消息來源亦常透過接受記者訪問而形成報導內容，而若與媒體策略相較，此法獲得被報導之機率顯然為高。如 van Turk (1986: 25) 所稱，記者主動要求的資訊（如向媒體詢問消息）之上報率遠較消息來源主動提供者為高，顯示公關人員採用「回應式」方式反可能較易獲得記者信服，此一矛盾現象卻也是消息來源發送新聞發布最難突破之處。

然而，消息來源「回應式」的資訊內容與記者提問是否相關？消息來源面對記者提問時是否一定「有問必答」？Gitlin (1980) 認為，消息來源須要依賴某種框架建構過程來組織內部看法，將訊息整理成可供新聞媒體接受的事件、說法或言說行為。若由官方消息來源面向來看，官方發言內容實係透過內部機制所發展之有組織、有結構、有計畫、有策略及有實施步驟之新聞產製成果，並非隨意所為（言）。

Epstein (1975) 另也指出，消息來源通常只在對自己有利情況下才會願意把訊息透露給新聞記者，對自己不利之處則儘量隱瞞或採迴避方式。如 Bull (1998) 所稱，政治人物為顧及形象，在電視新聞訪問中對一些敏感且易造成負面形象的問題常採不正面回答的迴避語言。由於螢光幕前直接拒絕回答易對其形象造成負面效果，模糊語言的迴避行為儼然成為政治人物面對新聞訪問的最佳手段。

就此而言，在面對媒體記者提問互動中，「模糊語言」顯然是說話者（官方消息來源）企圖影響聽話者（記者）進而降低不利報導的最優先選項。

綜上所述，接受媒體採訪（問與答）一向是官方消息來源採取回應媒體的手

段與方式，不僅可為組織或部門爭取新聞曝光機會，亦可滿足媒體需求有利雙方互動。但官方消息來源的「答」與記者的「問」間是否具有關聯，「有問必答」及「問答不符」的語言內容產生的成因為何，將是本研究有意探討的重要問題。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相關研究簡述

一、研究目的

源於實務上之觀察，官方消息來源面對記者提問時經常出現「模糊語言」。為瞭解其運用情形，本研究設定探討主題為：

- (一)國內官方消息來源如何回應媒體記者提問？
- (二)國內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應用情形為何？
- (三)國內官方消息來源運用源模糊語言之成因為何？

官方消息來源的模糊語言產生原因與是否來自天性？Bavelas, et al. (1990) 指出模糊語言存在於日常生活是因人們常面臨說假話或說實話皆可能造成傷害的情況，如有可能，人們多會傾向選擇第三種回應方式，即模糊回應。而 Harris (1991) 研究指出，政治人物在回答問題時確實會運用較多迴避性語言策略，而這種不完整性的非直接性回應誠屬自然反應，亦即天性使然。

簡而言之，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內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內容之模式，基於上述對於模糊語言出於天性使然的研究基礎，本研究前提為設定所有消息來源在面對媒體提問時皆無可避免地必須使用模糊語言，誠屬自然現象，此無關乎對與錯之評斷（見下節說明）。

二、研究範圍與名詞定義

本研究有意探討官方消息來源回應記者提問時所採取之模糊語言。假定官方消息來源係藉模糊語言磨合其與媒體記者間對新聞事件或議題之認知差異，其作用舉足輕重，可視為官方消息來源所設下的語言溝通障礙，旨在阻擾記者持續追問。即便其（記者）不斷發展各式策略促請官方消息來源說明（見林金池，2009），在官方消息來源有意識的防守策略下勢將難以獲得具體答案。

喻靖媛(1994)曾以社會交換論觀點分析記者與消息來源人際關係，認為對消息來源來說，記者以愈大篇幅對消息來源做愈有利報導，便可謂提供了某種「交易報酬」。喻靖媛並指出，在與消息來源交換的過程中，記者唯有提供被消息來源認為有價值的資源，消息來源才會樂於與記者進行交換。因此，記者如何處理

新聞內容(資源)不僅可能影響消息來源提供資訊的品質及數量,也影響了兩者持續互動的可能,而此處所稱之互動關係實包含了彼此間之語言運用情形。

就此而言,消息來源對記者採訪採取不正面回應的語言內容應有其語用動機,或基於維護與記者間的關係,或是避免衝突發生。Grice(1975)曾提出人際溝通之「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認為要保證對話順利必須遵守該原則。Lakoff(1973)也提出了「語用能力原則」(rules of pragmatics)概念,亦即語言使用須清楚且注意禮貌。由此觀之,消息來源所採取之不正面回應,應屬語用學中「禮貌策略」(politeness strategy)的體現。

另在語境方面,消息來源面對記者訪問時之情境可能異於一般對話問答。何兆熊(1992: 301)指出,語用學將語言本身之固有意義與使用者聯繫起來,也與特定使用場合結合。除了一個詞、一個句子的意指外,語用學要進一步弄清楚是誰、在什麼情況下、使用了這個詞或句子,且其使用這個詞或句子想要達到什麼目的。其意在於,字詞的意義顯然不純然存在字面,也在「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且這種意義之表現有賴對「語境」之了解。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對象為官方消息來源,語境設定為官方消息來源接受公開性之媒體採訪活動如專訪、記者會等,研究主題則為涉及模糊回應(答非所問)之採訪問答語言。為使本研究內容呈現具體明確,茲就官方、消息來源及政府機關定義如下:

- (一) 官方: 英文 official 指「正式的」、「法定的」官員,而本研究所指則為正式的、公開的、官員的、公務上的發言,其內容常有決策影響力。基本上,舉凡由政府部門人員或發言人之名義針對相關事件或議題公開進行之說明或記者會,皆具官方性質。
- (二) 消息來源: Sandman (1987) 認為,消息來源就是「新聞內容中所標明的事件製造者,或是在段落中發言、可資辨認、或聲稱某項訊息者」。Shoemaker & Reese (1996) 則認為消息來源是提供資訊且被媒體組織用以轉換為新聞報導的個人與團體。鄭瑞城(1991)曾定義廣義之消息來源,泛指能作為新聞素材的任何資料,是新聞工作者透過人物訪問、蒐集之文件和觀察所得,其中人物訪問(以口語資料為主)最常運用,也是最重要

的新聞來源；而狹義的新聞來源就單指人物而言。鄭瑞城並指出，在整個新聞製造過程中，消息來源人物是主要守門人（primary gatekeeper），最常藉由「近用媒介」的機會篩選、宣揚與已有利之資訊。劉蕙苓（1989：30-31）亦曾指出，消息來源為新聞引述詞如「指出」、「建議」、「表示」、「透露」、「覺得」、「批評」前後所連接的句子中而可指認之發言者。

綜合上述，本研究所稱之「官方消息來源」為依〈行政院組織法〉所列中央政府各部會具主導權且可對外發言（如總統、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等）或身負機關代表性（如總統府、行政院及各部會發言人等）之個人，可針對政策、議題、事件主動性說明或被授命可公開召開記者會向外說明及回應記者之提問者。

（三）政府機關：指依憲法第 61 條規定：『行政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而由〈行政院組織法〉所設置之政府部門。

三、相關研究

就模糊語言內容來看，曾有研究指出(Bavelas, et al., 1990)，個人雖非促成模糊語言的動機及理由，但模糊語言應是個人溝通情境的結果。換言之，當溝通情境處於預期有可能導致負面效果時，模糊語言是在各種回應中最有可能被選擇使用的選項。

另就新聞發布角度而言，官方消息來源顯具優勢，Gans(1979)指出，消息來源的權力部分來自其在政治、社會、經濟面向上具有得以製造新聞的能力。相關研究亦曾指出，公關稿件與新聞發布（含發言人）兩項為消息來源最常使用新聞發佈管道。如 Shoemaker & Reese (1996)即認為，消息來源的常規管道（routine channels）包括：官方手法（如試探氣球、議會聽證）、公關稿件、記者會、非即時事件（如演說、典禮）等；這些手法約佔所有新聞布的一半以上（58.2%），而訪問安排、事件或記者親身採訪另佔 25.8%。Nimmo（1978）則認為，主要新聞發布正式管道包括：記者會、新聞見報、人物訪問、新聞洩密以及其他新聞宣傳設計等。

官方消息來源多數希望能與記者間保持良好互動關係，常會採用主動提供訊

息，以「資訊津貼」(information subsidy) 方式提供新聞素材。首先創建此一概念的 Gandy (1982) 指出，消息來源會以資訊津貼方式與新聞工作者交換利潤，包括減低新聞工作者蒐集資訊所付出的時間與支出、減低科學研究的費用、減低撰寫與製作電視節目的支出。Gandy 強調，消息來源利用這些方式提供資訊，旨在控制新聞內容或甚至影響新聞框架或新聞中的核心意義。透過消息（或資訊）的刊出或見報，表面上雖然新聞記者是資訊津貼的直接受益者，但實質上消息來源不但會因受到大家注意（media visibility）而成了間接受益者，更會因其對議題的價值與觀點得以進入新聞報導的深層面向進而成為社會意義建構的主控者，奠定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體系的影響與控制力。

不同媒體對新聞內容之速度、深度、觀點或素材需求均有不同，如平面報紙或雜誌要求內容較深且廣或屬專題性新聞素材，廣播新聞要的是速度及聲音，而電視新聞所需則是速度及畫面等。無論如何，「新聞」應是所有媒體記者共同不變的需求，引述消息來源談話內容則屬普遍。

劉蕙苓 (1989) 即曾指出，台灣報紙七成以上都在新聞中引用消息來源，每則新聞引用的次數約為 1.61 個。Whitney, et al. (1989) 曾以 1980 年代之電視新聞網為研究對象，發現 72% 為官方消息，86% 屬男性人物。Brown, et al. (1987) 另以頭版新聞出現的消息來源為例，發現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為政府官員。Smith (1979) 則分析 317 則電視晚間新聞，找出約近半數 (45.4%) 為政府官員。

綜而言之，官方消息來源是媒體追逐的主要新聞來源，其回應涉及在語用動機下所運用的「模糊語言」內容，目的可能是為了掩蓋負面效應，或是企圖促使社會大眾對政府有所期待。

第四節 研究問題

英國前政治時事評論家 Robin Day 曾說，「訪問」業已逐漸變成政治人物用來宣傳的重要資源，無論在廣播或是電視訪問受訪者皆會故意忽視提問，僅說自己想要說的、預計要說的、不斷地重覆說一些與提問無關的論述。面對此一現象，訪問者（如記者）礙於時間及提問數量等因素限制，無法持續強力地要求受訪者針對問題回應，只能隨著受訪者複製其論述內容，最終忘記原提問。

長久以來，新聞記者不斷地發展各種提問技巧，試圖從官方消息來源得到明確且清楚的答案以供報導之用。然而官方消息來源多半不願直接或具體回應，與媒體問答間極易形成相互對抗之勢。又因官方消息來源在公開場合的發言有「不可逆轉」(irreversibly) 特性，話一旦說出口就難以挽回，無論正確與否立即成為媒體報導素材並為輿論重視。面對此一困境，眾多官方消息來源只好「言不及義」、「避重就輕」以免「禍從口出」，足以突顯其等運用模糊語言之普遍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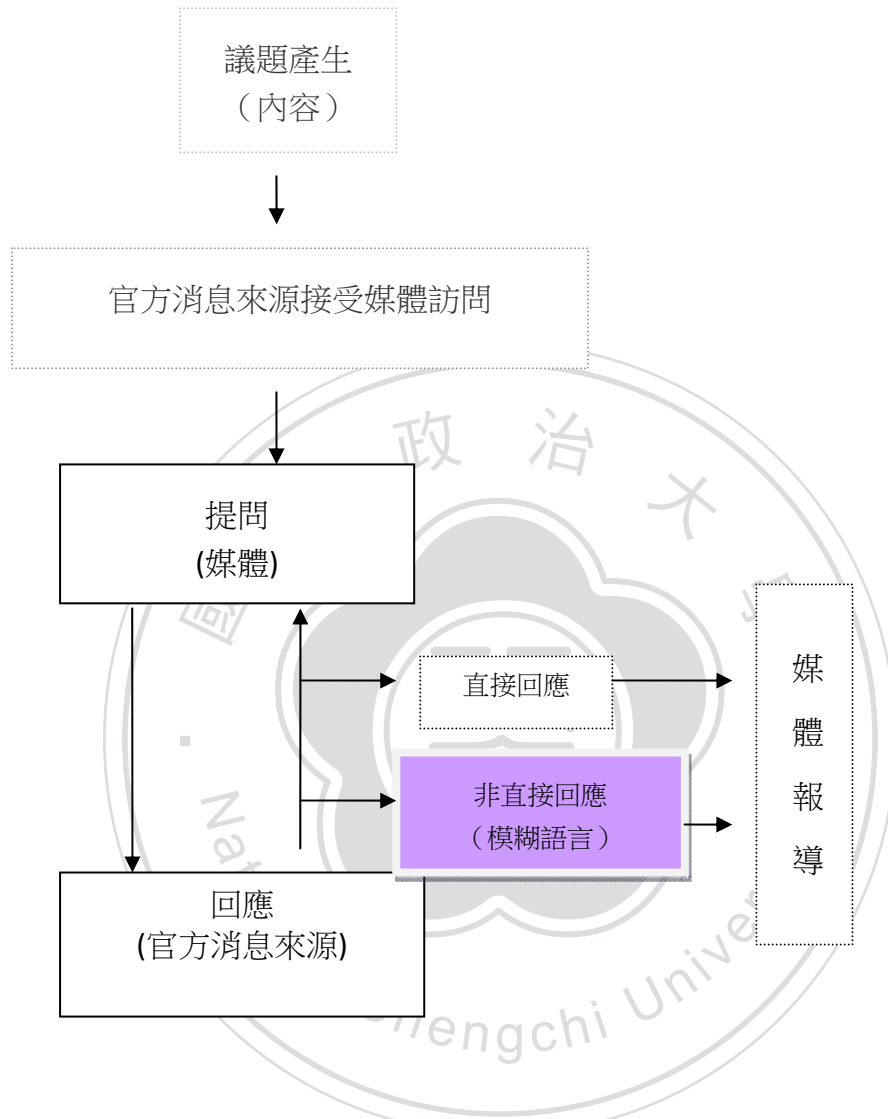
消息來源的發言容易成為媒體報導素材當與其發言時之「語境」有關。人類學者 Duranti & Goodwin (1992) 曾提出「語言情境」概念，認為任何事件之說明與轉述皆須注意其所面臨之情境問題。一般而言，官方消息來源與媒體接觸之情境大致可分為公開或非公開兩類，公開者如專訪、記者會、茶會、公共場所接受媒體採訪或說明等，非公開（或暫時不公開）者則如私下餐敘活動、電話聯繫溝通等。但無論何種語境，只要涉及與媒體互動，其說話內容便易受到重視。

此外，語用學亦多強調語境是語用學的基礎。如王德春 (1987: 184) 曾定義「言語環境」，指「使用語言時與言語行為有關的各種因素構成的實際情境。即使用語言的環境，簡稱語境。語境的客觀因素有：時間、地點、場合、對象等；主觀因素有：身份、職業、思想、修養、處境、心情等。這些因素對使用語言都有影響和約束作用。」本研究為求情境一致，擬將研究場域設定於公開性場域，如正式記者會之問答、公開場合接受採訪等。

在研究文本部份則以官方消息來源與媒體間之問答為主，擬分析政府消息來源使用模糊語言的形式，藉此了解政府消息來源如何藉由各種論述修辭之模糊語言因應媒體之提問。

本研究將以記者提問及官方消息來源回應內容為主，觀察官方消息來源針對個別議題之發言內容，擷取與「模糊語言」相關部份分析其運用情形及可能成因。

就新聞產製的發展層次而言，官方消息來源說明其有意講述的內容後，始由記者針對議題或事件提問，其後雙方再藉由消息來源之進一步解釋與由記者對消息來源所提供資訊之蒐集與整理進而形成新聞內容。相關研究架構如下：



圖一：本研究架構示意圖(來源：本研究)

*實線框所列為本研究探討範疇

依上述研究架構，本研究將研究範圍置於官方消息來源回應與媒體間問答時所涉及「模糊語言」之部份。當議題或是政策產生時，官方消息來源與媒體之間答情境即指官方消息來源或主動說明或被動接受採訪。

第五節 研究價值及重要性

一、研究價值

Leege & Francis (1974) 指出，一般研究目的可分四種，即「科學知識的增進」、「價值取向的獲得」、「個人利益的確認」及「純粹之知識性好奇」。首先，「科學知識的增進」乃為獲取新知以為社會生活的應用基礎，而獲得「價值取向之研究」其旨則在發掘社會、經濟及政治價值進而找出解決問題的妥協方案。「個人利益的確認」指個人藉由學術研究成果的發布贏得個人社會地位及聲譽，至於「純粹知識性好奇」，則指滿足人類好奇天性所進行的研究。

本研究旨在瞭解模糊語言在傳播領域之價值，藉此增進對消息來源與新聞媒體互動多樣類型之瞭解，具有促進媒體思考新聞真實報導之內涵與價值。

二、研究重要性

過去不乏與媒體及消息來源語言互動的相關研究，然就問答雙方互動面向來看，以往研究主要係以媒體記者的「問」的角度為主題，而較少由消息來源「答」的角度為主。例如翁維薇(2000)的新聞訪問之追問研究，即以「追問」為主題，針對記者如何對於消息來源之模糊及迴避語言進行探討。

另就與問答相關之「語言」互動研究來看，有「施惠語言」(蘇惠君，1989)及「威嚇語言」(林金池，2009)等亦均由媒體記者面向所進行的探討。

就此而言，相對上述記者層面之語言研究，過去已有學者主張外部傳播途徑的重要性，此乃基於任何新聞產製皆須有其消息來源，記者採訪到的內容亦可謂由消息來源決定。因此本研究採北歐傳播學者 Rosengren(1985, 1976, 1974, 1970)之「非媒介因素或資料」概念以及 Schlesinger(1990)之「外部途徑模式」改由消息來源層面為研究面向。

綜而言之，上述研究均與問答之語言互動有關，惟多由記者面向進行而少由消息來源「如何回答問題」角度著手。但消息來源當也是新聞產製的關鍵者，尤其是政府機關內部政策相關人士(如國家領導人、政府首長或是發言人等)之發

言內容對新聞報導內容實具影響力。如傳播學者 Cohen(1989)曾以美國總統為例指出，藉由白宮公關人員的協助而向總統提出的議題總能輕易地取得媒體關注；亦即對媒體而言，總統在決定政治對話方面佔有極大優勢。

因此本研究採由消息來源層面出發，探討消息來源與媒體的語言互動。亦即有別於過去多以記者媒體面向之研究，藉以補充消息來源端。

三、小結

文化研究學者認為，新聞工作者在採集社會事件真相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受到消息來源的介入與影響，顯見官方消息來源常是掌控資訊的一方。在此情形之下，官方消息來源具有主流強勢詮釋的優勢權，在與媒體記者間問答互動必然性的情形下，形成研究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策略運用之有利條件。

本研究共分成五個章節，第一章包括源起、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等。第二章文獻回顧包括新聞真實建構、模糊傳播、消息來源組織框架之相關研究，探討官方消息來源如何運用模糊語言與記者進行語言互動。第三章為研究問題說明、研究架構及重要概念定義、研究過程、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前測等。第四章為資料分析與研究發現。第五章則為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二章 文獻探討－官方消息來源之模糊語言

本研究旨在探討官方消息來源對記者提問所採取之模糊語言內容。有別於以往著重於媒體記者如何向消息來源提問之面向，由消息來源面向探討其面對記者提問所採取的模糊語言內容進行之。由於官方消息來源回應媒體之內容常成為新聞產製之內容，模糊傳播具有舉足輕重之影響力，故本章將本章分為三部分，分別針對「新聞與真實」、「模糊傳播」以及「消息來源之模糊語言」相關文獻進行探討。

第一節 新聞與真實

一般而言，新聞媒體為散佈社會訊息最重要的傳播管道，消息來源（如政府發言人）也常透過記者發送資訊並向社會大眾說明施政要項。對社會大眾而言，新聞內容代表了新聞組織與其工作者針對消息來源所述而以客觀、中立立場所做之真實撰述，有其重要社會功能。

然而在新聞報導產製過程中，除了媒介內部的眾多層層關卡（如新聞編輯、各級主管）外，媒介外之訊息來源（如消息來源、公關人員）亦可能與新聞真實間有所牽連，本章將分由媒介內、外部途徑探討新聞真實。

一、新聞真實建構的兩造：媒體組織與消息來源

何謂「真實」？Adoni & Mane (1984)曾採取 Berger & Luckman (1971)及 Schulz (1982) 等人的詮釋學觀點，就媒介如何建構社會現實提出「客觀真實」、「符號真實」和「主觀真實」等分類。所謂客觀真實，指的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不須驗證也驗證不來；符號真實則是透過文字或符號之描述（如以文學、藝術或透過新聞媒介）所表達、呈現的社會真實；而主觀真實則為個人對真實的了解與信仰，多半得自社會情境及媒介建構所形成之個人腦中圖畫。

至於「新聞真實」，係指經由新聞組織報導所再現之社會真實。早期論者多認為新聞報導必須力持客觀、平衡、中立、正確立場反映真實，因而常被指稱與

社會科學傳統所持之「實證論」(或稱「客觀論」)相符。就客觀而言, Philips(1977)認為「客觀性報導」原則包含了記者不受證據、來源、事件及閱聽人的影響,只講求公平、平衡、公正及完全公開等崇高理想。而此種要求新聞必須達到中立、客觀與平衡的說明,進一步促成「新聞專業化」(professionalism)的理想,接近早期「鏡子理論」(mirror metaphor)的看法,認為新聞媒體的主要功能在於反映真實、報導真相(Koch, 1990)。

時至今日,新聞真實之意涵已由實證論轉為由新聞媒體、消息來源及新聞情境三者主客觀交互作用的結果。臧國仁(1999)即指出,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兩者在新聞產製過程中扮演了「共同建構」的角色,兩者可能以合作或敵對等方式競相爭取對社會真實的唯一詮釋角色。而傳統實證論者一向強調新聞客觀性,認為新聞價值原即附著在社會真實的某些特質,而記者只是根據這些特質來選擇與呈現新聞。一旦此一社會真實具備某種新聞價值,便會被記者所撰並報導成為新聞事件,因此新聞報導(亦可稱為媒介真實)就當盡可能客觀地反映社會事件的特色(翁秀琪, 1994)。

晚近研究則認為新聞媒體組織、消息來源、新聞情境、意識型態等均會影響新聞事件以何種面貌呈現真實。Gandy(1982)指出,傳統新聞理論(如守門人理論)過度渲染新聞工作者個人的專業自主決策,未能將其他社會組織與機構(如消息來源)在新聞中的判斷角色一併納入考量。而Schudson(1991)曾批評守門人觀點以及其他傳統新聞學理論簡化了新聞工作的複雜性,新聞實非由新聞記者選擇產生,而係眾多社會組織共同建構而來。換言之,記者在報導新聞時一方面受到社會結構如媒體組織、傳播政策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受到客觀報導、新聞價值等意識形態以及消息來源等共同影響始能建構新聞真實。

Kenamer((1994)認為,新聞媒體在所有語言與中介結構中扮演轉換社會真實為符號意義的核心角色。首先,新聞媒體刊載的內容並非社會真實的客觀反映而係社會真實「建構」的產物。雖然新聞報導的確討論了各種社會事件,但因社會事件原就包含多種面向,而新聞媒體限於版面或截稿時間而只能就多種面向中的少數加以描述(此即框架事實的過程),因此新聞媒體無法完整呈現社會真實,此乃可以理解的事實。

再者,受到組織常規之限制,任何社會事件均需經過「加工」處理始能成為

新聞媒體組織所能接受的形式。如廣播電視受限於時間壓力而習將社會事件濃縮播報，同理平面媒體亦透過文字符號轉換事件為新聞體裁如倒寶塔形式。為了讓報導內容符合新聞常規，新聞工作者常操弄符號（manipulate symbols）以便符合閱聽大眾所需以能快速瞭解並接受訊息。

Noelle-Neumann & Mathes (1987)指出，相關研究過去多以實證論角度觀察媒體與真實間的關係，假設新聞媒體所報導的事件就是真實事件的縮影，但這兩者間實未存有必然對應關係。

另有學者主張，新聞不可諱言地必須報導「事實」，這是新聞和小說或任何虛構文體最大不同所在，也是新聞從業人員必須堅守的最後一道防線（翁秀琪，1997）。然而 Graber (1989) 引述 Lippmann 之言認為，新聞難以等同事實，因為有太多背景與情境在新聞記者報導時被捨棄或重建。Sigal (1973)亦曾指出，讀者常忽略「新聞並非真實」而僅是一些由消息來源描繪並透過媒體組織傳遞的真實，誤信新聞內容必須為真且永遠為真。

二、守門人對新聞真實選擇之影響

早期新聞學「守門人理論」之內涵即在強調新聞產製流程須經媒體組織工作人員層層節制，而其（如新聞記者）工作內涵就在篩選與排序所得訊息。李金銓（1981）指出，不同新聞工作者（包括主編、記者、編輯）在不同「關卡」(gate)前各自以其認定的讀者需求（或稱新聞價值）以及組織提供的工作規範而將新聞素材不斷選擇、刪減、調製或綜合。

「守門」（gatekeeping）概念源自White（1950）探討美國一家早報的編輯如何篩選通訊社新聞之研究，其結果顯示新聞報導的選擇具高度主觀性，標準則多奠基於新聞工作者本身的經驗、態度與期望（該研究係以「編輯」為研究對象）。此研究之焦點集中在個人層次的守門效果，發現報社編輯「守門人」選擇稿件的理由有三：一是主觀認定「不值得登」，如無趣、不佳等理由；二是同一事件的另一稿件已刊登過；三則為編輯認為不該刊登。

此點也說明了新聞處理流程主要是由新聞採訪者（如記者）和新聞處理者（如編輯）扮演選擇角色，他們有權決定哪些事件得以成為新聞而哪些事件又被排除

(Harcup, 2005)。

Breed (1955) 的研究則將守門人研究從個人層次提升到組織層次。他根據美國東北部中型報紙的120位記者進行研究，發現新聞媒體內部的社會化程度影響記者或編輯之新聞取捨。Breed因此將守門行為視為執行階層（大多指記者）順應編輯政策的情形，此即「新聞室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意涵所在。

此外，Bass (1969) 也指出編輯並非純粹個人而是組織化的個人，關鍵性的決策者是在編輯台。他並提出「新聞流通兩階段模式」(double-action internal news flow model)，包含新聞來源的蒐集(news gathering)與新聞處理(news processing)兩階段，前者指訊息尚在「原始」階段而未經新聞記者加工為新聞，第二階段則是新聞處理者將訊息修改或合併後形成新聞成品並傳送給公眾。

Gieber (1964) 也持相同看法，認為新聞守門人個別態度的影響低於涉及產製與編輯新聞的科層結構，亦即新聞並非獨立存在而是新聞蒐集或新聞創造之科層組織成員所產製的成品。

而Shoemaker (1991) 亦指出個別守門人雖以其意志與偏好篩選新聞訊息，仍須考量處於慣例常規結構下進行訊息操作，而此過程又發生於組織框架之內，另還需加上組織外部可能對內部產生的影響，因此新聞守門過程可略分為「個人層次」、「傳播常規層次」、「組織層次」、「外部媒體、社會／機構層次」以及「社會系統層次」。其中，「個人層次」涉及的是個別傳播者（如新聞記者或編輯）的決策，探究新聞工作者的個人態度與價值觀如何影響其評估與選擇新聞；「傳播常規層次」指新聞工作者的例行性作業流程如何對新聞處理造成影響；「組織層次」則是新聞室社會化對守門人的影響；「外部媒體、社會／機構層次」為新聞組織與其他組織或機構的互動所衍伸對新聞守門之影響；而「社會系統層次」則是指整體社會結構、文化與意識型態等對守門過程可能產生的影響。

由守門人理論看來，報導內容採用與否的選擇機制似由媒體（包括記者）掌握（控），其重心置於新聞媒體組織在產製新聞過程扮演的角色及重要性。

三、來自消息來源的新聞「真實」

相對於上節有關守門人對新聞真實之內部控制，主張傳播外部途徑的學者認為消息來源對新聞報導的產製亦有重大影響。Gans(1979)即曾指出，新聞媒體無法「獨自」決定新聞價值，任何新聞產製皆須有其消息來源（此乃客觀報導義理之重點所在），而記者採訪到的內容亦可謂由消息來源決定如何述說而非原始真實相貌。Gandy (1982)因而強調，新聞並非純然真實而是消息來源決定的真相。

這些研究者認為，新聞學過去太過「媒體中心論」(media-centrism)，其媒介支配並決定新聞內容呈現的論點實有過於武斷之嫌。如最早時新聞學研究守門人的概念係將「新聞」定義為新聞工作人員或媒體組織大權在握，可以任意處置新聞稿的命運。由 White (1950) 整理分析美國中西部某報電訊編輯所接收的通訊社件中發現，只有十分之一的電訊稿被報館採納，且電訊稿內容比例失衡，顯示出新聞媒體編輯的決定權頗大。

然而事實上，社會是由相互競爭的社會團體組成，沒有任何團體（包括新聞組織）能永久居於主導地位。英國文化研究者 Hall, et al. (1981: 335-367)進而指出，新聞媒體不過是制度的臣服者（structured sub-obedience），只能聽命於有權勢的消息來源。

有別於前述媒體中心論的觀點，北歐傳播學者 Rosengren(1985, 1976, 1974, 1970)曾經多次提出「非媒介因素或資料」(non-media factors)概念，將媒介資料區分為媒介內資料及媒介外資料，前者指新聞媒體提供的真實圖像，媒介外資料則是新聞記者在蒐集、評估、散布新聞時所接觸的客觀真實，包括歷史記錄、對消息來源之訪問或官方統計資料。而英國學者 Schlesinger(1990)亦曾提出類似「外部途徑模式」(externalist model)，建議以消息來源面向討論新聞報導之議題建構過程，分析社會行動者（actors，即消息來源）如何接近媒體以及採用了哪些策略與技巧以接近媒體（而非僅視媒體內容為社會真實所在）。

臧國仁(1999)因而歸納指出，過去「新聞真實」之討論多以 Galtung & Ruge (1965)與 Rosengren (1985)的模式為基礎，探詢新聞媒體之內在因素以及影響媒體報導的外在社會因素。因而最具影響力者實應包括媒體組織及消息來源兩者：前者常發揮守門人影響力而掌控報導內容，消息來源則運用媒體策略影響報導方向。

在探討消息來源對媒體的影響性前，尚須定義消息來源。Sandman (1987)認

為，消息來源就是新聞內容標明的事件製造者，或是在段落中說了些話因而可資辨認或聲稱某項訊息者，無論有無引述皆然。Shoemaker & Reese (1996)定義消息來源為提供資訊給媒體用以轉換為新聞報導的個人與團體，包括一些社會機構如政府單位、企業團體或廣告公司。Voakes (1996)亦曾指稱消息來源為一些在新聞中引述提及且可確認的個人、組織或實體（如文件或研究等），而一些學術研究常將新聞消息來源分為「官方」與「非官方」兩類並進而推論前者受到新聞媒體較多關注（羅文輝，1995）。

鄭瑞城(1991：81)另曾綜合消息來源相關研究定義廣義的消息來源為「泛指能作為新聞素材的任何資料。這些資料是新聞工作者透過人物訪問、蒐集之文件和觀察所得。其中，人物訪問（以口語資料為主）是最常運用也是最重要的新聞來源。所以狹義的新聞來源，單指人物而言」（括號內出自原文）。他依角色功能進而細分新聞來源為當事人（undertaker）、舉事人（promoter）、評論人（comment），認為消息來源在新聞製造過程中可謂主要的守門人（primary gatekeeper），最常藉著近用媒介的機會篩選或宣揚與已有利的資訊。

Schlesinger (1990)則強調消息來源的確在新聞產製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猶需具備以下四個條件：

- （一）具有相當組織規模才能適應新聞媒體的路線設置常規；
- （二）具有相當財力以能長期維持提供持常態性資訊；
- （三）不同消息來源間也可能發展競爭與合作關係，共同建立媒體策略；
- （四）具有公信力。

由上述所引觀之，消息來源與記者似都在新聞傳遞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涉及若干要素，可借用傳播學者 Lasswell (1948)指稱之 5W1H 傳播過程基本元素說明：「誰」指消息來源（尤指政府人員）；「說了什麼」指消息來源表達的語句或語言策略；「透過什麼管道」指消息來源透過與媒體間之問答而形成報導素材；「給誰」指消息來源語言表達之主要對象，即媒體記者；「取得了什麼效果」則指媒體報導之呈現效果，但此效果無法有統一標準評定係依消息來源與媒體記者各自需求而定。

除界定何謂消息來源外，其如何發佈訊息以及透過何種管道發佈均與其媒體

策略有關。基本上，消息來源提供的媒體訊息均經篩選而非完整訊息，旨在控制或影響新聞報導之內容與方向。Zoch & Galloway(1997)即曾發現警方發言人會技巧地強調某些論點或策略性地淡化某些部份甚至控制某些訊息，藉此導引新聞報導朝向警方有意框架的故事情節。Sigal(1973)亦指出，記者利用官員取得獨家新聞或降低採訪成本，而官員則藉由記者發佈正面新聞以尋求民眾支持與提高政治聲望，兩者各有所需且各盡所能彼此相互影響。

此外，消息來源提供之訊息常涉及與事實或與主題無關的內容。研究顯示，人們相互溝通時或常「不誠實」(Clark, 1996; Haiman, 1998)地運用戲謔、諷刺、說笑、誇張甚至說謊等提問方式(Haverkate, 1990);而政治人物與一般人同樣無可避免地會在表達語言時具有採取類似「不誠實」溝通特色(Verschueren, 1985)。

就此而言，新聞資訊似乎是在真實基礎上建構，然而即使是依據消息來源所言編撰的報導內容，其真實性實則來自政府消息來源依框架下所建構而非百分之分的真實。

上述研究結果似乎偏向消息來源，因而亦曾遭到「過分凸顯了官方消息來源影響力」、「無法顯示消息來源(尤其是官方)每役皆勝」之批評(臧國仁, 1999: 188-189)。唯就主控權來看，消息來源雖是控制議題及訊息效果的最大力量，但如Rogers, Dearing & Chang(1991)所稱，消息來源的議題設定力量在議題發展初期效果最強，隨著議題擴大媒介逐漸開始自行運作並決定所需。

四、 小結

新聞產製的早期研究大都專注於媒體組織如何單方面呈現新聞，Schlesinger (1990)卻認為這些研究多立基於「媒體中心論」而關注新聞記者路線分配、採訪流程、內部的自我檢查與自我控制或是新聞組織如何運作等議題。由於媒體報導內容多引自消息來源，在經守門人關卡前實已先被消息來源決定。文化學者Hall (Hall, et al. 1981)因而提出「消息來源是社會真實的首要界定者(primary definers)」概念，強調消息來源才是社會事件的第一手建構者，而新聞媒體無力單獨產製新聞，多半受到消息來源「引入(cue in)」始能注意到特殊話題。同時，由於官方消息來源較為固定、好找、發言具「權威性」，使得記者樂於接受其所

界定的事實（臧國仁，1999）。

綜合以上所述，要探討新聞真實性實應先探究消息來源媒體策略的語言策略，乃因消息來源具有掌握訊息來源的優勢地位，而直接回應與非直接的模糊回應更是影響媒體報導呈現的關鍵。



第二節 模糊傳播

英文中與模糊、含糊或不明確的詞彙至少有 vague, obscure, equivocal, unclear, slippery, ambiguous 等，譯成中文則有模糊、含糊、模稜兩可、曖昧及不明確等意涵。

所謂「模糊」與「不明確」等指的是「不精確」，而此種模糊性語言及不明確實普遍存在日常人際溝通的話語。Lipman(2006)指出，日常用語常有模糊之處。他並依 Sainsbury (1990) 的說法認為，如有一個字能夠精確地完全描述或定義出對象或標的，那就是「精確」(precise)；相較之下，如無法精確定義就是「模糊」了。例如，中文的「高」字並沒有相對應的明確已知高度或刻度，而什麼樣的界定標準其上是「高個子」實也不詳。

Lutz (1996)則指出，舉凡「委婉說法」(euphemisms)、模糊不清(obscure)、官話 (gobbledygook) 及誇張性 (inflated) 語言都屬「曖昧語」(doublespeak)；相對於直接而明確的語言，非直接性語就是模糊語言，其特點在於避免真正要說或想說的意思 (Bavelas, et al., 1990)。

根據 Bavelas, et al. (1990)，模糊語言存在於日常生活是因人們常面臨說假話或說實話可能造成傷害的情況。例如，好朋友送禮卻不喜歡這個禮物，而當朋友問及「是否喜歡」時受禮者常有兩個負向選擇 (negative choices)，一是說謊而直接告訴對方自己喜歡這份禮物，另一則是告訴對方真話，自己並不喜歡這份禮物。而依模糊理論，如有可能，人們多會傾向選擇第三種回應方式，即以模糊回應取代上述說謊話或說真話，尤其是當說出實情無濟於事卻可能有損害友情時。

一、雙避衝突(avoidance-avoidance conflict)

語言與溝通是傳播主要工具，模糊性語言普遍存在，自然也存在於消息來源與媒體的溝通之中，尤其官方消息來源如部會首長說話之內容備受媒體關切，為控制或掌握媒體報導對自己有利的訊息，消息來源的語言常會產生不精確情形。

對於此種不精確性模糊語言的運用，Bavelas, et al. (1990) 認為其與「雙避衝突」相關，因而曾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並以政治人物為研究對象提議，當「雙避

衝突」情況發生時不直接回應問題的語言策略實是主要因應方式，此處所稱「不直接回應語言策略」即可謂模糊語言。

有關傳播的模糊溝通，Bavelas, Black, Bryson, Mullet (1988)發現模糊不清及離題(tangential)就是模糊溝通的主要形式。Bull(2008)另曾指出，模糊溝通與衝突產生情境有關，而衝突又與面子威脅有關，因為面子威脅會強化模糊語言使用的機率。

Bull, et al.(1996)亦曾以前引 Bavelas, et al.(1990)的模糊溝通理論以及 Goffman (1967, 1955) 的面子觀點為基礎針對 1992 英國大選進行研究發現，在政治人物的訪問中，有 41%的提問具有衝突性，而模糊回應比例為 64%；其餘 59%的非衝突性提問有 60%被回應（亦即表示 40%未被回應）。相較之下，面對衝突性提問時選擇模糊語言回應的比例明顯高於非衝突性提問；此項研究結果與政治人物始終閃避、迴避提問及模糊回應的負面印象吻合。

至於模糊造成的衝突型式常又與個人所處情境有關 (Bavelas, et al., 1990)，即當個人面對可能產生衝突時，其語言表達內容的撰擇當受影響，基本上可分為三種情形：一是雙趨衝突 (approach-approach conflict)，指面對兩種都意屬而想要選擇時，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二是雙避衝突，指面對兩種都不想要而須作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抉擇；三是趨避衝突 (approach-avoidance conflict)，即處於「又愛又怕」的情況 (Lewin, 1938; Bavelas, et al., 1990)。而當消息來源面對「說」與「不說」實話的兩難情境時亦會擔心產生衝突，為因應此種情形只能調整說的內容。

Bavelas, et al. (1990) 指出，雙避衝突之典型情況就是當說話者遇到提問，任何切合主題的回應都可能具有潛在導致負面後果，但又被期待必須針對問題回應，此時即屬雙避衝突的情境，說話者常會選擇模糊回應。

Lewin (1938) 指出，政治人物處於「雙避衝突」情境時最常導致模糊語言。Bull(2008)則發現這種情況也存在於日常生活，最常見的情形就是當說話者無論在「說」與「不說」實話都可能造成傷害，亦即溝通處於皆為負面選項的雙避衝突但又須回應時，Bavelas, et al.(1990)認為這時個人為了避免造成負面結果常不做出任何直接或明確地回應。如有機會，甚至會想辦法「離開該情境」，以「說了等於沒說」方式避免直接回應可能產生的負面後果。模糊語言頓時成為最佳替

代方式，可讓政治人物達成「離開現場」的效果，指個人並非實際離開須面對選項的空間卻已達到不直接回應的目的。

Turner, Edgley, Olmstead (1975)指出，「說實話」在人際互動時才會發生。如在上引「不受歡迎的禮物」可能衝突中，事實是為了維護關係而使個人對收受禮物的喜愛程度「不說實話」。然而「不說實話」是種負向選擇，因其違背個人價值觀（大多數人自幼即被教育要誠實），是社會不贊同的行為（說謊被認為是不好的行為），同時還有被拆穿的風險。

Bavelas, et al. (1990) 因而指出，政治人物常處雙避衝突，尤其是當回應可能招致負面效應時（見圖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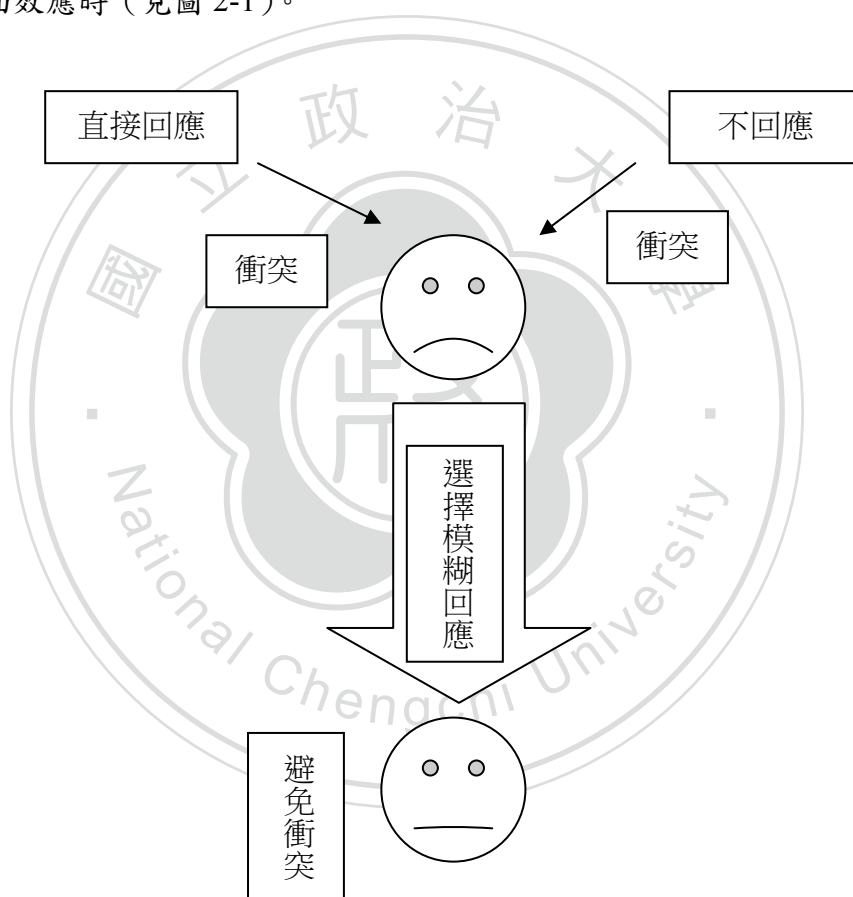


圖 2.1:模糊溝通的雙避衝突
(communicative avoidance-avoidance conflict)

來源：修改自 Bavelas, et al., 1990: 57-58

事實上，在某些情況下，模糊語言是說話者被迫在不願損害自身或其政黨之

替代方案「作出一個簡略卻不完整」或「以一個完整但錯綜複雜的形式」回應，此即「迴避」或不確定（Bull & Mayer, 1993）。

在政治人物訪問情境中，訪問者提出的問題或話題常使受訪者處於雙避衝突，即說與不說都可能造成負面結果，因此政治人物常會選擇避免衝突的方式因應，而最常被選擇運用的就是不直接回應問題的模糊語言。這種模糊語言不僅使政治人物可以安然退出雙避衝突，也能讓他們實現其他重要目標，如為自己或同僚、所屬政黨或其他具有象徵性意義的代表人物「保留面子」（Bull, et al., 1996），甚至贏得政治正確及說話得體的觀感（Obeng, 1997）。

二、模糊語言

Bavelas, et al. (1990)將模糊語言定義為非直接性溝通，包括含糊不清、矛盾對立、突然離題、隱匿甚至是逃避語言。Hamilton & Mineo (1998)則將模糊語言定義為「具有目的性的不精確性語言」，認為 Bavelas et al. (1996) 指出的模糊語言研究是在特定語境下所做的電視訪問研究，並藉由面子管理為基礎，將模糊語言理論加以概念化。

Harris (1991)曾在英國大選期間針對 18 位受訪對象進行研究，歸納出政治人物有 60.38%不回應，其中包括了「只回應一半」或「低關聯度的回應」。而 Bull, et al. (1996) 的研究與 Harris(1991)有雷同發現，即政治人物回應問題時有相當高比例是以迴避方式因應，僅有 39%直接回應。

從眾多政治人物回應媒體提問個案中可以發現，完全回應並不存在，但也不能說受訪者沒有回答問題（Bull, 2003）。對此情況，Harris(1991)指出在迴避問題及直接回應間另有間接回應（indirect answers）。

Kuznetsova (2007)認為，模稜兩可讓說話者避免不愉快的衝突而無須說謊，其實就是不直接溝通方式的另種面向，最典型者就是曖昧不清的語言，此正說明了說話者不願清楚說明的態度。

Bavelas, et al. (1990)認為，模糊語言的使用與說者(sender)、說話內容(content)、接收者(receiver)及情境(context)四者有關，且在上述四項中有一項吻合即可稱之模糊訊息。

Bavelas, et al. (1990)指出，模糊語言之說話者涉及的「模糊性」在於其回應內容必須反映自己看法，若說話者不承認自身觀點則其所言即屬模糊語言。如在前述「不受歡迎禮物」的衝突中，說話者回應「我妻子喜歡它！」，表達的是「妻子的意見」而非說話者「自己的意見」，此即說話者的模糊。「內容」是指說話者的回應內容應具「可理解性」，任何不清楚或不明確的聲明均屬模糊。「聽者」是指在特定場域或範圍內可接收到訊息的人，有可能是訪問者、觀眾（聽眾）、其他政黨或團體。「情境」則指說話者對提問的回應內容之前後相關性。基本上，回應內容與提問相關性愈少則訊息愈是模糊，亦即回應時的模糊訊息多過與問題直接相關的訊息。

對於模糊語言的界定，Bull (2003)曾經建立「回應—中間地帶—不回應」尺標，而中間地帶(intermediate replies)又可續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有暗示性或言外之意式的回應，如政治人物常藉由回應問題的時機表達自身觀點或想法，但其表達內容並非完全地針對問題回應。其次是不完全或不完整回應，又分局部回應 (partial replies)、一半回答(half-answers)及零碎回應(fractional replies)。所謂「局部回應」指政治人物僅回應針對單一性提問的一部份，「一半回應」指當提問者提出「雙重性提問」而政治人物僅回答了其中一個問題。至於「零碎式回應」，指政治人物對多重性提問僅回應其中一小部份。至於第三種中間地帶的回應類型則是斷話回答 (interrupted reply)，指政治人物在回應過程中被插話且不再有機會回應。

Bull(2003)綜合英國政治人物 John Major, Margaret Thatcher and Neil Kinnock 等人的訪談結果進而將模糊語言的類型歸類為 12 項，並就其各自回應的百分比例統計如下：

模糊語言類型	Thatcher	Kinnock	Major
1. 忽略問題	5.5	5.3	2.1
2. 不予回應	3.7	8.8	7.0
3. 對提問提出問題	1.9	1.8	0.7
4. 攻擊提問	25.9	36.8	33.1
5. 攻擊提問者	13.0	-	-

6.拒絕回應提問	22.2	7.0	36.0
7.製造政策重點	76.0	66.7	64.8
8.重複先前提問之回應內容	5.5	3.5	2.1
9.不完整的回應	9.3	12.3	4.8
10.聲稱或暗示已經回答過問題了	-	7.0	1.4
11.致歉	1.9	-	-
12.拘泥於字面意義	-	-	1.4

圖 2.2：John Major, Margaret Thatcher and Neil Kinnock 之模糊語言百分比分析表

來源：Bull(2003:122)

由 Bull(2003)的研究結果可看出，英國政治人物 John Major, Margaret Thatcher and Neil Kinnock 等人最常運用的模糊語言類型前三項大致為「製造政策重點」、「攻擊提問內容」及「拒絕回應問題」(依三位政治人物各自傾向總計採取「製造政策重點」3次、「攻擊提問內容」3次及「拒絕回應提問」2次)。

此外，本研究之問答分析涉及問句是否被回應之判別，Quirk, Greenbaum, Leech & Svartvik. (1985)曾依提問者期望得到的回答內容而將問句類型分為是非問句(yes-no questions)、選擇性問句(alternative/disjunctive questions)及開放性問句(wh-questions)等三類：

(一) 是非問句期望得到的答案具證實或是反駁性：例如，「你的工作做完了嗎？」，回應者被期望回答「是」或「否」。不過，Bolinger(1978)指出，回應形式並非侷限於是或否兩種，如當問題為「你喜歡火奴魯魯 (Honolulu, 即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市) 嗎？」，回應者若回答「一點點」也可接受。Quirk, et al. (1985)也指出，此類問句的答案另也可包括「確實」、「好的」、「當然」(of course)、「一點也不」(not at all)或「絕不」(never)等。

此外，Bull (2003)認為，是非問句的回應方式不僅是證實與反駁問句內容，有時也可能有「可能」(probably)、「也許」(perhaps)、「看似如此」(it appears so)、「某種程度」(to some extent)、「偶爾」(occasionally)、「常常」(very often)等；在這些回應語句中雖然沒有使用「是」或「不是」字眼，但也已清楚回答了問題。

(二) 選擇性問句所期望的是由回應者在兩個或多個選項中選出答案:如「你想出去走走還是留在家裡?」。Bolinger(1978)認為,雖然發問者已將答案選項列出(如「出去走走」及「留在家裡」兩個選項),但若回應者回答「我寧願開車到外面去」,即使並非提問者列出的選項也仍可被接受。Bull(2003)指出,有時回應者雖然未自問題所列選項選擇回答,仍有針對問題回應。相反地,若回應者未自提問所列答案選項選擇答案同時又未提出其他回應,即被視為「並未回應」。

(三) 開放性問句則包含了什麼、何時、為何、誰、哪些等疑問性問題。

在回應上述提問事項時,尤應注意有關負向選擇的界定。Bavelas, et al.(1990)指出,負向選項的認定需視當事者而定,如前述舉例問及是否喜歡不甚滿意的禮物時,當事者的回應是「我真的很喜歡你送我的生日禮物!」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時,由於其與真正的意向相違背,因此屬負面選項。而當事者若回應「我不喜歡你送我的生日禮物」,雖然是清楚且直接回應,也屬負面選項。

Bavelas, et al.(1990)指出,面對兩個同樣的負面選項(此即雙避衝突情境),當事者常以模糊語言為直接回應的替代品,乃因模糊語言正是解決類似情況的好方法,優於其他溝通選項甚至可以完全成功解決困境。

Bull, et al. (1996)續以 Bavelas, et al. (1990) 電視訪談的模糊溝通特定語境為基礎,認為模糊語言也受到「面子」(Goffman, 1967)影響,包括自己的面子、他人的面子、兩人所代表的政黨面子,也因基於面子進而造成模糊語言溝通。

總之,Bull (2008)認為有關政治人物的論述分析與命題應可納入框架和面子概念藉以分析其在政治論述的閃避、迴避及模糊語言。而 Bavelas, et al. (1990)的模糊語言理論與情境有關,其由社會心理角度以政治人物為對象,發現模糊語言是個人面臨雙避衝突情境時的最可能選項。

三、迴避語言

除上節所述之「模糊語言」外,政治人物在公開訪問中經常出現迴避情形。Bull & Mayer (1993)即曾指出,英國政治人物在電視政治訪問中常傾向採取迴避語言。他們的研究結果不僅驗證了政治訪問具有模糊溝通的顯著特點,也具體展

現了政治人物運用迴避語言的形式。

基本而言，模糊與迴避雖如前述都屬不直接回應問題的形式，然而兩者又不盡然相等。即如 Gnisci & Bonaiuto (2003)所言，不回應與模糊有關連性但又不完全等同迴避問題（如更改主題或主題等）。

此外，Gnisci & Bonaiuto (2003)認為言外之意與模糊語言不同，其意在於說話者以非直接和間接方式澄清觀點，此種意有所指的形式在模糊語言中扮演不同角色。Gnisci & Bonaiuto(2003)認為，「不回應」和「迴避」皆屬溫和且微妙表達同意和不同意的模糊語言，而言外之意則採省略某些句子之基礎以隱晦呈現模糊語言。

Harris (1991) 的研究得到兩個結論，一是政治人物在回答問題時確實會運用較多迴避性語言策略，另一則是這種不完整性的非直接性回應誠屬自然反應，亦即天性使然，而上述兩項結論正符合大眾對政治人物總是試圖避免提供直接答案的觀感。

Wodak (1997, 引自 Kuznetsova, 2007) 認為，策略是「行為者有計劃的表現出最佳行動」，而迴避語言可視說話者有計劃性的表現。Kuznetsova(2007)指出，說話者回應問題時會展現「消極態度」，指說話者有時表達了許多內容卻「沒有說任何事」，包括有說跟沒說一樣、拐彎抹角、胡扯、講空話、障眼法及轉移注意力；Kuznetsova 稱此為「消極性謊言」(passive lying)，看似與主題相關但又不同於問題核心而只在周圍打轉。

Bull & Mayer (1993)另將模糊語言視為習得的能力而非與生俱來的天性，屬專業技能，並可成為第二天性。他們認為導致這些政治人物在職業生涯中學習使用非直接性及模稜兩可語言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是由經驗中不斷複製面對困難情況的專業處理模式，如應對懷有敵意的提問者時的技巧；Bull(2000)則認為這種政治人物所習得視情況提供迴避和模糊的回應的能力是種行政技能。

此外，政治人物最常運用的模糊語言策略為「製造政策重點」，亦即在回應問題時故意製造引人關注的重點，其次是攻擊提問內容 (Bull, 2003)。Greatbatch (1986) 曾描述了他所謂的議程轉移程序，意即政治人物在回應前後藉機改變談話主題的情形。

四、小結

官方消息來源在與媒體記者溝通前通常會預擬 Wodak (1997) 所言的「策略」，藉由模糊及迴避語言展現出計劃性的最佳行動。Kuznetsova(2007)指出說話者運用的「消極性謊言」即模糊回應及迴避問題的策略，而無論是 Harris 的天性使然或是 Bull & Mayer 的後天習得觀點，皆印證了政治人物不直接回應問題的習性。

模糊語言此種不直接回應形式看似不完整的溝通形式，但對說話者（尤其是官方消息來源）而言，無疑是最壞情況中的最佳選擇。Bavelas, et al. (1990)即認為模糊語言是「貧乏」的溝通，但對處於語言情境中的回應者卻是比較好的（或相較之下非最壞的）替代品，甚至優於迴避、躲避、避險與其他迴避行為。



第三節 消息來源之模糊語言

如前所述，消息來源與媒體對於新聞真實的建構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但源於媒體無力單獨產製新聞，任何報導在經守門人關卡前可能即已被消息來源控制與決定，因而消息來源成為社會真實的首要界定者（Hall, et al., 1981），更加顯現消息來源的重要性。

消息來源利用語言作為溝通與傳播的工具，模糊語言是日常生活溝通無可避免的一部分，新聞報導內容自然無法將其排除，只是消息來源的模糊回應內容並非隨性，仍須考量組織或政黨等因素，如同 Hamilton & Mineo (1998)所言，模糊語言為「具有目的性的不精確性語言」。Gitlin (1980) 即曾指出，消息來源常須依賴框架來組織內部的看法，將訊息整理成可供新聞媒體接受的事件、說法或言說行為。當新聞媒介的資訊供應多來自消息來源時，也就身繫若干符合消息來源意圖的框架而無法全面客觀（McQuail, 2000／陳芸芸、劉慧雯譯，2008）。由此可知，消息來源語言受框架影響，進而影響新聞真實。

一、框架下的模糊語言策略與新聞報導

框架可簡單定義為「人們或組織對社會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臧國仁，1999：68），一方面是依過去經驗解讀現有事件或議題的參考架構，另一方面亦是轉換真實的規則或界限，更是解讀真實世界時的取材範圍。對消息來源而言，當其回應媒體時會受到組織框架影響進而影響新聞產製，因此新聞報導可說是消息來源與媒體集體創作的結果。臧國仁認為，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兩者在新聞產製過程中扮演了「共同建構」的角色（臧國仁 1999：70）。

臧國仁（1999：149）續以「框架理論」發展有關消息來源及新聞媒體的分析架構並探討新聞的產製，強調「新聞產製基本上是一項不斷受到特殊條件（包含組織常規、個人認知與語言結構）制約的社會行動，在人物選擇、主題界定、事件發生原因的推論或情結鋪陳方面，新聞報導內容均與此一隱藏之制約行動

(implicit rules) 息息相關。

就消息來源來說，臧國仁(1999:226)指出組織框架為「【消息來源】組織針對媒體報導所採取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Snow, et al., (1986)亦曾指出有關「框架結盟」概念，即社會運動者必須透過組織框架的建立與潛在參與者之個人認知框架(如興趣、價值觀與信念)連結，方能完成動員共識。此一過程之重點在於組織必須對社會問題提出新的詮釋方式(interpretative orientation)，並清晰表達組織立場，始能激發潛在動員者的支持。因此消息來源透過對媒體的回應，企圖建立聽者共同性之認知框架，進而激發支持與認同。

就新聞報導而言，框架在新聞中的影響力處處可見，決定了哪些素材有關或無關、哪些人物是主要行動者應置於前景而哪些僅應搭配表現、哪些引句應多直接摘錄或摘錄多少。雖然新聞工作者對這些影響力未必能清晰分辨，但從組織、個人與文本層次觀之，框架的確是媒介再現社會真實的重要影響因素。由此看來，媒體並非建構或轉換社會真實的唯一來源，消息來源的影響性也不容忽視。然而，消息來源所建構的真實仍要與社會產生互動，其組織框架是否能產生意義，亦須依賴新聞媒體。Ryan(1991)曾就社會運動的研究出，「集體行動能否造成任何影響，端視媒體是否加以處理，以及如何處理」。

消息來源為了建構符合本身期望的社會框架，通常採取策略性的作為藉以影響媒體新聞報導。如以資訊津貼、議題設定或議題建構等方式企圖影響媒體報導，而模糊語言則常隱含於其中，使得媒體不自覺地受到操控。

Zoch & Galloway (1997) 在針對警方發言人的研究中發現，發言人會技巧地強調某些訊息以導引新聞報導朝向警方有意框架的故事情節，這些消息來源扮演了具有專業知識的議題建構過程，訊息發布完全符合新聞媒體的需求。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消息來源受到框架影響以及新聞報導壓力，強化了雙避衝突的情境，催化模糊語言策略的運用，並與媒體提問串連循環，相關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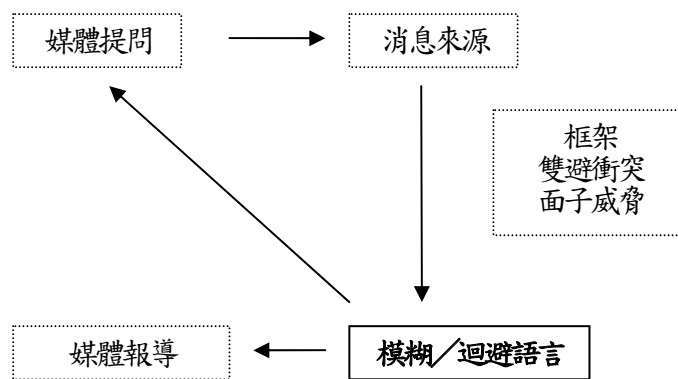


圖 2.3：消息來源模糊及迴避語言循環路徑圖
來源：本研究

綜合前述可知，過去文獻雖多次曾提出政治人物採取模糊語言策略，迄今尚無以新聞傳播角度研究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特質之形成因素。以往對於政治人物採取模糊語言策略的文獻多以 Goffman 的面子威脅及 Bavelas, et al. 等人的雙避衝突等社會心理學角度為研究基礎。雖皆以政治人物為研究對象，但少見以新聞傳播角度分析其偏向選擇模糊語言回應問題的型態。本研究將以新聞產製的消息來源端探詢官方模糊語言使用之型態與方式。

二、消息來源為何使用模糊傳播

新聞報導之真實與否不僅關係到讀者如何瞭解社會現狀，消息來源更關注其形象如何呈現於報導。而官方消息來源（如政府首長）尤其關切其與新聞媒體的互動以免形象受損影響施政品質，因而常意圖介入新聞報導的產製過程，回答記者提問不免視為其施展模糊語言的重要環節。

語言是新聞傳播的重要工具，消息來源語言則是媒體產製新聞的重要素材。而模糊語言常被消息來源用來成為選擇性回應媒體的語言策略，其對新聞真實之產製頗有影響力。而就模糊語言來說，在社會及心理等不同領域中雖有各自解讀

角度，但大都承認模糊語言確實普遍存在人類語言。若依 Goffman(1955, 1967) 之面子理論觀之，政治人物為顧及自己、他人及所屬政黨的面子而常發展與人互動之語言策略。

Bavelas, et al.(1990)認為造成模糊語言產生的原因來自於雙避衝突。Bavelas, et al. (1990) 以社會心理學角度指出，模糊語言存在於日常生活是因人們常面臨說假話或說實話可能造成的傷害。

有關模糊語言的類型多由 Bull 和 Mayer (1993) 發展並由 Bull(2003)闡述。相關分類共分為 12 大類，並進一步細分 35 種政治人物不直接回應的子類。例如，「攻擊提問」屬不回應的類型，又可續分為 8 個子類，如假設性或投機性問題，或提問基於錯誤的前提等。

由於政治人物回應媒體的內容常成為新聞報導素材，為避免出錯而常吝於回答或不正面回應。如 Bull, et al. (1996)曾例舉 1992 英國大選時的電視訪問，發現 Neil Kinnock (工黨領袖) 接受 David Forst 訪問時曾多次問及「如果 12 個月後成為總理，那麼你可以給我一個對未來的願景嗎？」、「你能給我們一個不同的生活嗎？」。面對類似問題若不回答或顧左右而言他都會傷害面子並讓 Kinnock 顯得不稱職。因此在無法直回應的情況下，很容易選擇模糊回應的語言策略。

三、消息來源之模糊語言呈現

模糊語言對於採訪者而言，雖是屬於不直接回應與不合作的負面作法，卻常被政治人物當成最佳選項。由於不同形式模糊語言具有不同效果，基於前述守門人理論的「關卡」無法摒除模糊語言，甚至還常將其納入報導並呈現效果（見下說明）。

Bull (2008) 指出，模糊語言技巧有優劣高低，效果也有所差異。有時模糊語言甚至可以讓說話者獲得高度正面價值。Bull, et al. (1996)列舉 1990 年時 John

Major 在廣播訪問播出後不久即被任命為保守黨領袖，而 Major 當時所採取的語言策略就是一種「毫無所悉」的模糊語言策略 (Bull, 2003)。如果 Major 當時真的不知道問題答案並直接表達出來，身為首相勢將承受不稱職的極大風險。當然，如他確實知道答案但表達出不願說實話的態度，其風險就是「欺騙」；面對此種兩難，難怪政治人物多會選擇模糊語言因應。又如 Tony Blair 在 1997 年英國大選活動接受電視訪談時運用高度熟練的模糊語言，進而促成所屬政黨勝選 (Bull, 2008)，足見模糊語言透過媒體發揮相當的傳播效力。

Bull (2008) 在觀察政治人物電視訪問中的表現後發現，模糊語言常是政治人物面對衝突情境中最優先選項，不僅可以滿足訪問者及聽者需求 (看似回答了提問)，甚至可為自己及所屬政黨創造正面形象而贏得勝選。然而，模糊語言的回應方式仍有風險，例如，明顯的迴避問題會讓訪問者注意到政治人物規避問題，因而重複提問要求回應 (Bull, 2003)。通常此種政治人物回應時的風險是雙重的：首先，若不知如何回應問題，那麼身為政治人物將冒著被視為無能或是不稱職的極大風險，顯然將損害其面子。而另一方面，若政治人物確實知道問題答案但不願回答，那麼他的風險則如上述在於「欺騙」 (Bull, 2008)。

由此可知，模糊語言技巧具後續影響性，其相關報導的呈現可能雖對受訪政治人物產生有利情況，卻也頗具風險。

四、小結

媒體與真實間的關係一直是新聞傳播研究探討的主題，在層次上由個人到組織，在理論及範圍上則由初期以媒體為中心的鏡子理論、守門人理論，到由實證論 (客觀論) 看待之主客觀交互作用所再現的真實，直至晚近結合新聞媒體組織、消息來源、新聞情境、意識型態等因素所探討之影響真實呈現因素，均可看出新

聞真實研究重心由媒體中心擴及各種相對因素的軌跡。

受到框架影響，消息來源模糊語言的運用受到制約而產生不同效果，Bavelas(1990)以雙避衝突解析模糊語言被選擇的原因，而在 Goffman(1955, 1967) 面子理論的基礎下，模糊語言已被概念化並得到印證。

而 Bull (2008) 認為，不同形式的模糊語言具有不同效果，且不同形式的含糊絕非等價，有些模糊語言可能具有高技巧，另些則較拙劣。為瞭解模糊語言對媒體報導的影響性，似可藉由官方消息來源與媒體間的問答內容與新聞報導呈現的相互關連性，做為理解模糊語言策略實施型態之方法。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綜合上章文獻探討，本章第一節說明論述分析法，第二節為研究架構及重要概念定義，第三節為研究過程，包含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研究設計，第四節則為研究流程及前測。

第一節 論述分析法

一、研究問題

消息來源為建構媒體報導內容之重要一環，本研究探討模糊語言內容之運用與形式。經由前章相關文獻描述可知，國內外已有研究指出模糊語言之運用與消息來源本身及其組織框架有關，同時衝突情境以及面子威脅等亦會強化模糊語言使用之情形而在模糊語言類型方面，政治人物最常採取的模糊語言類型有「製造政策重點」、「攻擊提問內容」及「拒絕回應問題」等（Bull, 2008）。然而國內消息來源使用模糊語言的情形又是如何？是否與國外相同？此為本研究欲探討之重點，茲歸納研究問題如下：

1. 國內官方消息來源面對訪問的回應是否也常使用模糊語言？
2. 國內官方消息來源最常使用的模糊語言形式為何？
3. 國內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之成因為何？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藉由消息來源模糊語言分析，瞭解國內官方消息來源之模糊語言模式與實施情形，並從面子威脅、雙避衝突及組織框架觀點出發，分析官方消息來源如何透過模糊語言避免風險、迴避責任或避免訪問者挑戰。

二、論述分析法

本研究的個案樣本以官方消息來源與記者公開性訪問活動為主，就其中模糊語言互動內容進行整理及分析。主要方法為論述分析法（discourse analysis），茲

就相關內容說明如后：

論述指在社會結構之一組系統性文本、訊息、會話或對話 (Lupton, 1992)，基本上屬語言運用形式、模式或類型，在傳播的範疇若以報紙新聞為例，即是在反映其在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脈絡所呈現的語言與風格選擇。而論述分析指針對字與句的組合內容進行討論，並探究其表面下的認知結構 (Hodge & Kress, 1993)。本研究論述分析對象以消息來源之語言為主，針對涉及模糊語言之字與句進行討論與分析。

Ball (1990) 指出，論述分析可檢測專業菁英及官僚體系的權力偏見，是跨領域的學科，衍自人類學、認知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微觀社會學、語言學、符號學與傳播學。van Dijk (1983) 另也指出，論述分析不同於傳統內容分析法，屬質化分析，主要是檢視媒介內容。除著重外顯內容外，亦重視隱含其中的語意結構、預設立場、關聯性與策略運用等意義，試圖找尋並解釋媒介產品與人們理解新聞背後隱含的規則與策略，包含論述如何被理解與再現成為記憶。

論述分析的延伸則為批判論述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即當語言內容分析焦點由語言符號的「選擇」轉換為「批判」時即為「批判論述分析」，簡稱 CDA。就「批判」意義而言，批判論述分析企圖揭露語言以何種方式蘊藏權力、優勢和意識型態，尤其在性別、種族、階級等社會權力不平等進行批判 (Fairclough, 2001; Fairclough & Wodak, 1997; van Dijk, 1997)。此外，批判論述分析重視語言形式和意識形態的關係，並由各種論述文法結構中證明權力和控制間的種種關係。

Fairclough (1992) 認為批判論述分析是以政策論述的文本分析為起點，再從分析論述文本的生產與消費過程來理解論述在社會脈絡產生和權勢的條件。他強調，權力透過論述的運作而來，因此研究者理應關注論述的霸權、意識形態、權力關係。

一般而言，論述概念包含三個面向，即文本、論述實踐、社會實踐，對應於這三個層面則有描述、詮釋、解釋等分析方式，可說明如下：

- (一) 描述，指針對文本特性進行分析。本研究主要針對官方消息來源回應媒體提問內容所涉及之不直接回應為文本分析範疇，描述模糊回應之

內容與類型。

(二) 詮釋，是探討文本與主體互動的關係。消息來源就是模糊語言的選擇及生產製造者，更是模糊語言的實施者，而模糊語言之運用與語境有關。

(三) 解釋，指研究互動與社會脈絡關係。模糊語言最直接的互動對象為媒體，其提問之語境與官方消息來源的模糊回應論述具相關性，本研究將就已有文獻基礎探討形成官方消息來源運用模糊語言的因素。

本研究與上述相關之程序計有文本分析、過程分析及社會分析三者：文本分析的程序為描述，重點在於模糊語言的內容，將以 Quirk, et al. (1985)之問句類型及 Bull (2003) 模糊語言類型進行判別及分類。過程分析的程序為詮釋，主要分析重點在於媒體提問內容與模糊語言產生之相關性。社會分析的程序為解釋，分析重點在於消息來源模糊語言與形成因素如面子威脅、雙避衝突及組織框架之相互關係。

本研究將模糊語言界定為一種傳播與溝通中無可避免採取的語言類型與模式，由媒體(記者)提出問題形成語境，而官方消息來源在特定語境中進行回應。由於模糊語言鑲嵌在人類溝通情境，本研究將就相關論述歸納整理官方消息來源之模糊語言形式。至於模糊回應之論述分析，主要針對官方消息來源接受媒體採訪時如何使用模糊語言以及可能因素進行分析。

在媒體提問層面，論述分析是針對媒介訊息形式進行分析，焦點在於語言的呈現，包括語言學的模式、字與辭彙的抉擇、文法建構、故事敘事的一致性等 (Watson & Hill, 1997)。由此可知，論述分析是針對特定情境及脈絡下實際呈現的語言內容所作的分析。

Foucault (1972) 指出，任何知識或論述的建構皆有其特定社會脈絡，無論政府、專業學術組織、利益團體以及不同階級、種族、性別、文化團體等都會對權力的行使發生作用，誰能控制權力誰就能控制知識。就本研究而言，官方消息來源論述有其特定社會脈絡及控制權力，對外界知識之建構亦應具有操控性。

Foucault 亦將論述視為變動且有生產力的過程，透過論述可能產生新而有力的議題，也會影響人們對議題的理解與回應。他同時指出，論述是由特定社會體制產生的語言陳述，不僅包含語言和符號也有約束與實踐。本研究之焦點特別著

重於媒體提問所產生的語境，因此將就媒體提問內容導致模糊語言實施情境之實質性加以詮釋。

此外，Fairclough (1992) 亦視霸權為控制論述的權力，支撐著意識形態的論述實踐，並藉意識形態的競爭得以形成認知、完成整合、獲取同意，且據此獲得權力。

本研究將藉由批判論述分析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論述進而將語言視為社會實踐，以理解論述與社會關係、權力關係、社會結構間的辯證關係，解構隱藏在被視為「常識」或「自然」的假定。

三、小結

由於本研究以語言論述中之模糊語言為主，語言運用形式為研究重點，欲回應上述各項研究問題，故採取論述分析法針對研究樣本進行字與句組合內容以及其字句中隱含的認知結構進行分析。

模糊語言為傳播與溝通中無可避免採取的語言模式，官方消息來源在特定語境中進行回應，藉由論述分析法，針對消息來源回應內容，以模糊語言為焦點，歸納其形式及成因，具體呈現國內官方消息來源與媒體模糊語言互動之情形。

第二節 研究架構及重要概念定義

不同研究設計旨在回答不同問題，而不同研究設計又須有不同設計架構，也常因研究者的目的不同而有不同著重之處。茲就本研究所探討之消息來源模糊語言實施情況說明如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官方消息來源為分析對象，分析重點在於模糊語言內容，包含論述內容以及採取模糊語言之可能因素，屬於消息來源層面，有別於以往以媒體記者之角度。相關研究架構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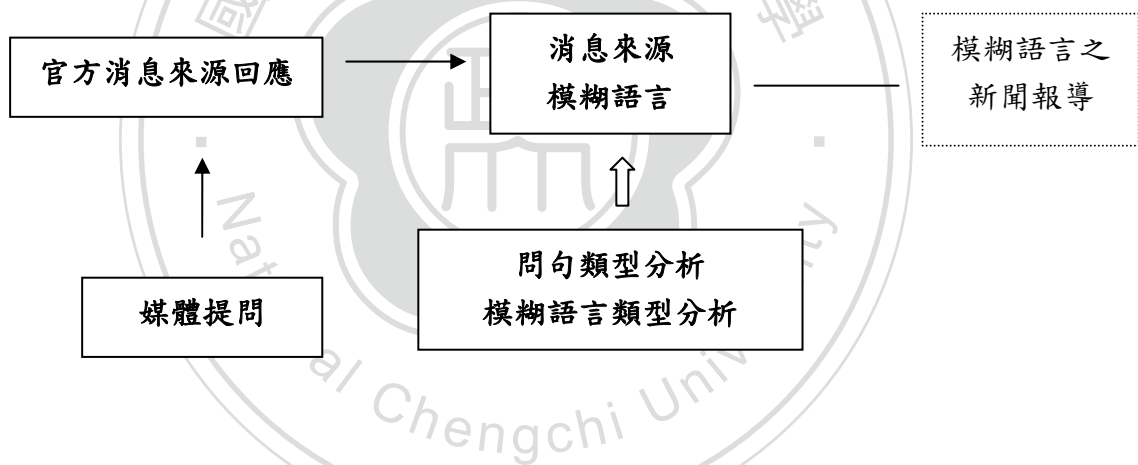


圖 3.1 模糊語言實施及歸類之論述分析研究架構（來源：本研究）

*實線框所列為本研究探討範疇

上述架構係以消息來源如何回應媒體之提問內容為分析主體，從媒體與官方消息來源實際問答資料探究說話者的論述模式，分析重點並非個人，而是個人的語言使用，因此本研究採論述分析法，就研究對象之模糊語言進行描述、詮釋及解釋。

為探究上述模糊語言模式之分析與判定，應有其認定標準，以利歸納導引模糊語言之問句類型及回應時之模糊語言類型。本研究採 Quirk, et al. (1985) 的問句類型（如是非問句、選擇性問句及開放性問句等）作為判別依據，並將判別結果依 Bull (2003) 建立之「回應—中間地帶—不回應」尺標以及 12 項模糊語言類型進行歸納整理。尺標所列之「中間地帶」及「不回應」皆屬模糊語言範疇，其中「中間地帶」對應不完整回應之模糊語言類型；「不回應」則對應迴避回應之模糊語言類型，續分 11 小類。

有關上述類型分析與判定之認定標準，首先有關 Quirk, et al. (1985) 的問句類型可分為是非問句、選擇性問句及開放性問句三類，各類型問題之判定及相對應回應之操作定義如下：

1. 是非問句：是非問句之提問主要是詢問肯定或否定之意思，回應者通常被期望回答「是」或「否」，包含 Bolinger(1978)指出的「一點點」以及 Quirk, et al.(1985)指出的「確實」、「好的」、「當然」、「一點也不」或「絕不」等。
2. 選擇性問句：提問者提出兩個以上選項提供回應者做選擇，由回應者在兩個或多個選項中選出答案。包含 Bolinger(1978)所指出的非提問者所列出之選項，如提問者問「你想在去宜蘭或是花蓮玩？」，回應者若回答「台中」也算是回應。
3. 開放性問句：此類問句包含了什麼、何時、為何、誰、哪些等疑問性問題，例如「你叫什麼名字？」或「你何時要出去？」回應者可就提問內容做開放性的回應，只要切合提問所求，即算回應了問題。

上述問句類型主要係為區分回應者被期望回應內容之型態，作用在於分辨回應者是否回應提問。若回應者給予與問句相符之回應型態，則屬直接回應，若不相符即屬模糊回應範疇。

本研究進一步依 Bull (2003) 之 12 項模糊語言類型分析其模糊語言形式，茲就各模糊語言類型之操作性定義分述如下：

1. 「忽略問題」，指消息來源完全忽視提問亦無任何回應的意願，甚至連表達確實有聽到提問的反應都沒有；如當記者詢問「你是否會參選？」，消息來源回應「我覺得今天的天氣真好！」，完全忽略問題。
2. 「不予回應」，指消息來源確實已聽到提問但無回應打算，如當提問者詢問「交

過幾個女友」，回應者回應「這不好意思說」；

3. 「對提問提出問題」，含括兩種方式，一是請提問者清楚說明其提問內容，亦即要求與問題相關之更多資訊。二是將提問反映在提問者身上，請提問者給答案，如提問者詢問「你對塑化劑事件有何看法」，消息來源回應「塑化劑是什麼？你又有什麼看法呢？」；
4. 「攻擊提問內容」，指消息來源質疑、攻擊或批判提問內容，舉凡指稱提問者「並未掌握問題核心」、「所提問題屬假設性問題」、「提問內容係基於錯誤假設」、「提問不精確」、「引用錯誤」、「斷章取義」、「令人不快的提問」或是「選十項錯誤」等情形均可列為「攻擊提問」之類型。
5. 「攻擊提問者」，有別於上者針對提問內容之攻擊，此類型指消息來源直接對提問者進行人身攻擊或批評。
6. 「拒絕回應提問」，指消息來源明確表達其不願、不能或不曾回應提問，如以「沒有能力回答」、「無意願回答」、「因某人因素不能回應」、「延遲回應」或「毫無所悉」等方式迴避問題均屬；
7. 「製造政策重點」，亦即消息來源不直接回應問題卻另外製造議題或重點，如「以外部攻擊方式攻擊對手或競爭者」、「提出新的論點」、「證明政策的正當性」、「承諾保證」、「提出呼籲如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等。此類政策重點之形式類似議題重設，主要目的係回應者藉由回應提問之時機自行提出重點，除可迴避提問又可同時創造新的議題及論點。此外，消息來源有時亦以「自行提出政策分析」、「自我辯護」或「自我肯定」等方式說自己想說的話。
8. 「重複提問回應內容」，指消息來源一再重複先前提問之回應內容而未具體回應提問；
9. 「不完整的回應」，指消息來源雖針對提問有所回應，但未完全回應，包括「有所回應但未完整回應」、「否定性回應」、「部份回應」、「半部回應」及「零碎回應」等五種形式。「有所回應但未完整回應」指消息來源以岔開話題方式中斷原欲回應內容；「否定性回應」則指消息來源以聲稱「不會發生」來取代「會發生何事」；「部份回應」指回應內容在與提問相關的比例上超過一半但不完全；「半部回應」指消息來源針對提問僅回應一半；「零碎回應」指回應不及一

半，屬零散性的回應。

10. 「聲稱或暗示已回應」，指消息來源表示已經回答過問題而不再回應；
11. 「致歉」，指消息來源以道歉來代替回應；
12. 「拘泥於字面意義」，指消息來源刻意就提問內容字面意義著墨，而不就實質提問內容具體回應。

綜合前項尺標及類型，茲就本研究相關模糊語言之判別依據及檢視指標臚列如下：

表 3.1 本研究涉及之問句類型、模糊語言尺標及類型總表

問句判別依據	回應尺標	模糊語言類型
Quirk, et al. (1985) 問句類型	Bull, 2003 建立之 尺標	Bull, 2003 之模糊語言類型 (模糊回應 12 類，含直接回應共 13 類)
1.是非問句。	回應	消息來源直接針對問題完全回答
2.選擇性問句。	中間地帶	9.不完整的回應。
3.開放性問句。	不回應	1.忽略問題； 2.不予回應； 3.對提問提出問題； 4.攻擊提問內容； 5.攻擊提問者； 6.拒絕回應提問； 7.製造政策重點； 8.重複先前提問之回應內容； 9.不完整的回應； 10.聲稱或暗示已經回答過問題； 11.致歉：以道歉來代替回應； 12.拘泥於字面意義。

上表為本研究參考與模糊語言相類型之各大項，研究分析時將就前述各類型的操作性定義具體歸類，而由於同一組問答中，官方消息來源可能會回應一項以

上模糊語言，因而於歸類時，一組回應中可能涉及多組模糊語言類型。

二、重要概念定義

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在於官方消息來源如何以模糊語言回應媒體提問，媒體並就模糊語言產製新聞，因此消息來源、模糊語言、新聞訪問及媒體報導均屬重點。綜上所述，本研究各重要概念定義如下：

(一) 消息來源

在研究消息來源語言策略對媒體影響性前，理應界定本研究所稱之「消息來源」。依前章可知，消息來源常屬一些在新聞中引述提及且可確認的個人、組織或實體（如文件或研究等），學術研究常將其分為「官方」與「非官方」兩類。廣義的消息來源泛指能作為新聞素材的任何資料，而人物訪問之口語是最常運用也是最重要的新聞來源；狹義的新聞來源則單指人物。消息來源的重要性係因其在新聞製造過程屬資訊傳遞主要守門人，最常藉著近用媒介機會篩選或宣揚與已有利的訊息。

為突顯模糊語言被運用之情形，本研究將以新聞訪問可確認的個人發言為主。在此定義下，本研究將以官方消息來源為主要研究對象。

(二) 模糊語言

由第二章文獻探討可知，消息來源的模糊語言係指當消息來源受到組織框架影響，或面臨衝突性問題及面子威脅情境時所採取不直接針對提問作出完整回應之模式，其特點在於避免真正要說或想說或是完全不回應。而相對於媒體之提問，「回應」指針對提問之回答內容。依 Bull (2003) 建立之「回應—中間地帶—不回應」尺標，除回應外，中間地帶與不回皆屬模糊回應，指消息來源僅針對提問之一部分提供資訊，包括局部回應、一半回答及零碎回應等 (Bull, 2003)。

此外，模糊語言還包含迴避，亦即 Bull (2003) 建立回應尺標中之「不回應」，

指消息來源完全未針對問題回應，並利用顧左右而言他、拒絕回應、無意願回答或是毫無所悉等方式迴避問題 (Bull, 2003)。

本研究將整理歸納並分析新聞訪問問答內容之不直接回應部分，以探究模糊回應使用情形。

(三) 媒體訪問

新聞訪問在新聞產製過程佔有重要地位，Stewart & Cash (1988) 即認為訪問指問者與答者雙方之互動過程，具有預先動機與目的，藉由一問一答之語言互動展開傳播交換行為。本研究重點雖在「答」但仍需由「問」導引，將視新聞訪問為中介工具，透過問答過程展現之消息來源語言策略探究其所含括之模糊類型，並接續討論新聞報導如何展現這些「答」的內容。

本研究以公開性新聞訪問問答內容為範疇，針對官方消息來源回應媒體提問內容蒐集論述文本。而所謂公開記者訪問活動具某些特性，如 Clayman & Heritage (2002) 曾指出的廣電新聞訪問的特徵為：(1) 討論內容聚焦於最近的新聞事件；(2) 訪問者與回應者互動形式具高度正式性，主要透過提問與回應方式進行；(3) 訪問者是專業記者，受訪者是與最近新聞事件有關者且閱聽人不直接參與互動。

在此定義下，本研究針對公開性媒體訪問之定義將排除臨時性之攔路採訪官方消息來源之參訪行程活動，另行選擇官方與媒體間具公開性、正式性之訪問活動之問答內容為分析案例，重點在於受訪者如何運用模糊語言回應媒體，包括官方消息來源於語境中之模糊語言回應內容、當媒體針對同一問題重複提問時其模糊語言之表現及其運用模糊語言之類型。

(四) 媒體報導

綜上所述，消息來源與媒體對新聞真實的建構扮演「共同建構」重要角色，而新聞媒體組織、消息來源、新聞情境、意識型態等均會影響新聞事件以何種面貌呈現真實。本研究認為，真實報導的建構無法排除消息來源語言策略，而模糊語言的不完整回應內容也包含在新聞訪問而無法排除。在組織框架、雙避衝突及

面子威脅考量下，消息來源對回應內容必須有所斟酌，愈能避免風險並促使媒體正面報導的模糊語言愈是有效語言策略。由文獻可知，Bavelas, et al. (1990) 認為不精確性模糊語言的運用與「雙避衝突」有關，亦即當「雙避衝突」情況發生時不直接回應問題的語言策略常成為主要因應方式。



第三節 研究過程

本研究採論述分析法，針對媒體提問、官方消息來源回應內容及媒體報導進行分析。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官方消息來源為研究對象，主因在於官方消息來源向來是媒體報導的主要消息來源管道，而在官方消息來源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總統及各部會首長。Sigal (1973) 即曾發現，官方消息來源在新聞產製過程中佔有重要地位，如在 1949 至 1969 年華盛頓郵報與紐約時報的頭版新聞中，美國及外國政府官員佔所有消息來源的四分之三。而 Gans (1979) 亦發現知名人物如總統、總統候選人、政府官員及違法犯紀的政界人士佔新聞消息來源百分之七十以上。

綜上觀之，無論從消息來源與媒體互動或新聞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向（羅文輝, 1995）等研究或資訊津貼等理論都可看出官方消息來源在新聞報導過程之重要性。

二、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是指引導研究進行的藍圖，藉由研究設計的正确規劃可使研究者構想研究的計畫與策略，首須考慮研究設計的適切性。基於本次研究係針對消息來源之回應內容，涉及消息來源組織框架、面子威脅以及雙避衝突心理作用，勢須針對消息來源語言策略進行詳盡分析及探討。

本研究為能精確歸類模糊語言類型，以及有效分析模糊語言形成原因，以論述分析法，進行媒體之問句判定分析、模糊語言類型歸類分析、模糊語言成因分析以及語境分析。上述分析相互關連，首先以問句判定進行模糊語言之篩選，亦即藉由問句之判定檢視消息來源是否就問句予以直接回應，剔除直接回應部份後再就非直接回應部份進行模糊語言歸類分析，藉以回應國內官方消息來源面對訪問的回應是否也常使用模糊語言以及國內官方消息來源最常使用的模糊語言形

式等研究問題；而面子威脅、雙避衝突及組織框架等分析則是為了回應模糊語言形成原因之研究目的；至於語境分析主要目的則是為確認媒體與消息來源之語言情境，以利衝突性語境之模糊語言研究分析基礎。

本研究採論述心理學觀點，探究官方消息來源如何以模糊語言回答媒體提問並透過模糊回應的內容展現傳播的優勢地位，進而強化並形成官方回應模式。語言在論述心理學中常被視為用來建構心理狀態及外在真實的重要工具（Wood & Kroger, 2000），有其行動及影響力，而當人們透過語言來理解與敘述其內心及外在世界時便會自然產生「建構的真實」（Potter & Wetherell, 1987）。

本研究之設計重點在於模糊語言論述內容分析，以媒體與官方消息來源之訪問活動論述為主，透過新聞訪問錄音帶轉錄並重現口語內容，為顧及可受公評性、隱私性及敏感性，本研究將以公開發表之新聞訪問內容為主。

三、小結

本研究採取論述分析法為研究方法，藉由消息來源語言論述資料之判別與歸類、媒體報導文本資料之蒐集、整理及比對，瞭解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形式及優勢性。同時納入語境及成因分析，確立媒體提問內容是否具有衝突性，以利後續與現有之國外研究結果之比較基礎。

第四節 研究流程及前測

一、研究程序

綜合本章節內容，相關研究程序如下：

- (一) 前測：為確定本研究可行，正式實施前將依正常程序進行前測；
- (二) 檢討及修正：就前測實施情形進行檢討及修正以利後續研究；
- (三) 蒐集官方消息來源論述：媒體與官方消息來源公開性訪問活動電視播出錄音內容；
- (四) 重整：官方消息來源回應媒體之語言活動必須經過錄音檔轉錄並轉換為文字方能形成文本；
- (五) 整理論述：整理媒體與官方消息來源問答內容以判別及歸納模糊語言類型；
- (六) 分析論述資料：分析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使用模式。

二、研究流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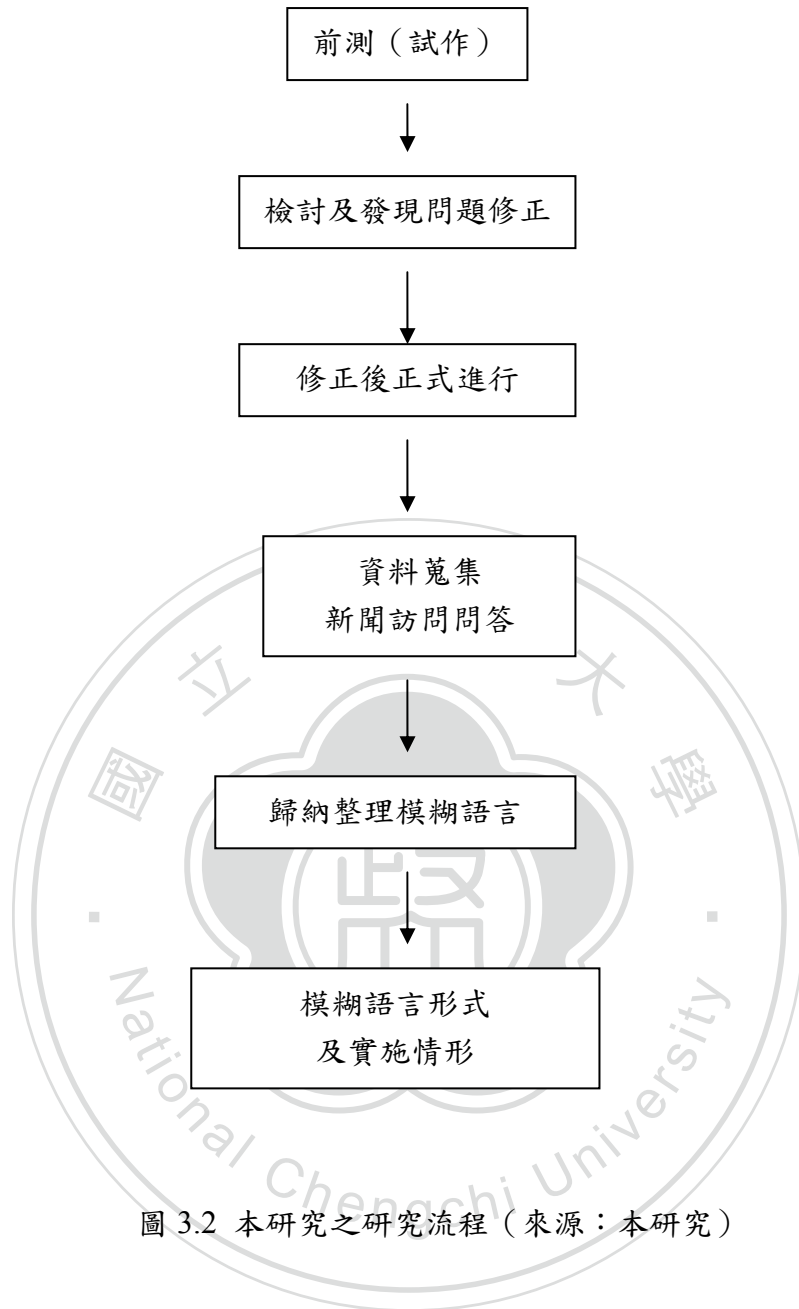


圖 3.2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 (來源：本研究)

三、研究流程說明

本研究論述分析主體有二個部份，一為媒體記者提問內容，目的在於導引消息來源論述內容；二為官方消息來源論述之語言文本，其模糊回應部份為本研究之分析重點，相關研究流程說明如下：

1. 蒐集官方消息來源記者會問答內容；
2. 整理問答內容逐字過錄稿，並區分「問」與「答」內容；
3. 先就問句部份依 Quirk, et al. (1985) 問句類型判別媒體提問類型；

4. 依上項提問類型設計消息來源應回應之型態；
5. 就上述判別結果依 Bull (2003) 之 12 項模糊語言類型歸納整理；
6. 分析國內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運用之實施情況。

四、前測案例

前測之主要目的是在進行正式研究前先行檢驗研究內容是否互相矛盾或不妥，以便事先察覺並予修正。由於本研究主要針對官方消息來源之語言策略，為瞭解本研究之可行性，因此先預就研究個案進行前測，內容如下：

本前測以研究樣本 2010 年 4 月 30 日馬英九總統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國際事務新聞節目主持人 Christiane Amanpour 越洋專訪之部份問答過程為例進行試析。為利分析操作，謹就前測相關事項備註說明如下：

1. 有關消息來源回應內容以斜體字標示；
2. 前測研析重點為消息來源之模糊語言，為便於理解，故將模糊語回應內容先予編號；
3. 前測所列提問僅係導引性質，以此作為問句判別及後續模糊語言之歸類工具；
4. 前測試析之媒體相關報導完整內容另見附錄二。

【前測一至三案例內容】

前測一：

主持人：讓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很多台灣人憂心，您並不支持獨立，自您當選總統後，您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

馬總統：中華民國台灣 99 年來一直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沒理由再度宣布獨立。

前測二：

主持人：馬總統，顯然有很多台灣人希望從您口中聽到這句話，或至少聽您解釋不說這句話的原因。且有很多台灣人表示，他們憂心或許您為了討好中國而在台灣主權上讓步。對此，您如何回應？

馬總統：所有這些指控均屬子虛烏有。過去 2 年來，我們與中國大陸就兩岸直航、食品安全、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及司法互助等簽署了 12 項協議。因為這些協

議，我們不僅建立了友誼，也解決了兩岸因貿易及投資往來迅速發展而衍生的諸多問題。所有這些協議均有助台灣的繁榮與安定，而且這些協議中沒有任何一項條款對台灣主權或自主有所讓步，而且這些協議均屬公開文件。

前測三：

主持人：我剛才想說的是，如果真的是這樣，為何您目前的民意支持度低迷？我的意思是，即使在您 25 日的電視辯論會後，您的支持度仍未達 40%，而根據民調，您的支持度約為 38%，約 4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滿意。您對此有何解釋？

馬總統：我們的經濟正在復甦，但尚未恢復到美國經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前的狀態。因此我們會更努力。「國際貨幣基金」(IMF) 已預測，我國 2010 年的 GDP 成長率將達 6.5%，因此我確信，我國的經濟好轉後，情況會有所改善。

本研究主重要重點在於消息來源回應內容，為能清楚歸類及分析，茲先就回應語句予以編號，以便後續分析之進行：

前測一：

中華民國台灣 99 年來一直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沒理由再度宣布獨立。--(1)

前測二：

所有這些指控均屬子虛烏有。--(2)

過去 2 年來，我們與中國大陸就兩岸直航、食品安全、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及司法互助等簽署了 12 項協議。--(3)

因為這些協議，我們不僅建立了友誼，也解決了兩岸因貿易及投資往來迅速發展而衍生的諸多問題。--(4)

所有這些協議均有助台灣的繁榮與安定，而且這些協議中沒有任何一項條款對台灣主權或自主有所讓步，而且這些協議均屬公開文件。--(5)

前測三：

我們的經濟正在復甦，但尚未恢復到美國經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前的狀態。--(6)

因此我們會更努力。「國際貨幣基金」(IMF) 已預測，我國 2010 年的 GDP 成長率將達 6.5%。--(7)

因此我確信，我國的經濟好轉後，情況會有所改善。--(8)

本研究針對模糊語言分析重點在於消息來源回應媒體提問時是否使用模糊語言。在進行模糊語言歸類前，應先判別問句類型，本研究以 Quirk, et al. (1985) 之問句類型判別受訪者有無回應問題。茲就各前測提問及回應內容分解如下：

前測一：

主持人：讓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很多台灣人憂心，您並不支持獨立，自您當選總統後，您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

馬總統：中華民國台灣99年來一直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沒理由再度宣布獨立。

(一) 提問分析

1. 很多台灣人憂心，您並不支持獨立—自您當選總統後，您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

---主持人詢問消息來源是否會表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屬「是非問句」，而後者則是期望受訪者回應為何「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屬「開放性問句」。

前測中由主持人問句「很多台灣人憂心，您並不『支持獨立』」及「自您當選總統後，您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可知，提問重點在於馬總統「不支持獨立」，以及為何「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消息來源被期望回應的重點在於馬總統是否「是否支持獨立」，以及「未曾表達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之理由。依 Quirk, et al. 問句分類，前測一包含「是非問句」及「開放性問句」，期望得到受訪者具證實性或反駁性答案。

(二) 模糊語言層面

模糊語言層面分析，主要針對消息來源不直接回應部份，依 Bull (2003) 模糊語言類型歸類，茲就前測一回應內容試析如下：

消息來源答句：

中華民國台灣99年來一直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沒有理由再度宣布獨立。--(1)
--由消息來源回應來看，「中華民國台灣99年來一直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並未直接回應其是否支持獨立，屬模糊回應之「不予回應」。而「沒理由再度宣布獨立」則暗示其不會宣布獨立，屬直接回應。由回應內容觀之，消息來源係以

「已存在之事實」回應，並暗示性回應其將不會宣布獨立，因此可判定此回應涉及 Bull 分類之模糊語言「不予回應」類型及「直接回應」。

(三) 語境分析

1. 讓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很多台灣人憂心，您「並不支持獨立」。
 2. 自您當選總統後，您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
- 本項提問觸及「獨立」及消息來源「有否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等議題。

上述內容可看出，語境呈現議題與「獨立」有關，進而涉及消息來源「是否支持獨立」及「為何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之理由」。由於台灣獨立與否各有其支持者，對於消息來源屬敏感之衝突性議題，由消息來源之模糊語言「不予回應」內容觀之，當語境涉及衝突性之獨立議題時，消息來源容易採取模糊語言回應。

(四) 成因分析

官方消息來源面臨國家主權相關議題，必受國家政策方向之框架限制，個人無法隨意發言；而面臨獨立主題，則涉及雙避衝突情境，因明確表達支持獨立將面臨反對者抗議之衝突情境，若明確表達反對獨立，則將面臨支持獨立者抗議之衝突情境；另礙於面子威脅，官方消息來源不能不回應等，在上述情境下，形成官方消息模糊回應之可能因素。

前測二：

主持人：馬總統，顯然有很多台灣人希望從您口中聽到這句話，或至少聽您解釋不說這句話的原因。且有很多台灣人表示，他們憂心或許您為了討好中國而在台灣主權上讓步。對此，您如何回應？

馬總統：所有這些指控均屬子虛烏有。過去 2 年來，我們與中國大陸就兩岸直航、食品安全、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及司法互助等簽署了 12 項協議。因為這些協議，我們不僅建立了友誼，也解決了兩岸因貿易及投資往來迅速發展而衍生的諸多問題。所有這些協議均有助台灣的繁榮與安定，而且這些協議中沒有任何一項條款對台灣主權或自主有所讓步，而且這些協議均屬公開文件。

(一) 提問層面

問句分析

1. 馬總統，顯然有很多台灣人希望從您口中聽到這句話，或至少聽您解釋不說這句話的原因。

-- 受訪者被期待消息來源「說明不宣布台灣獨立之原因」，屬「開放性問句」。

2. 且有很多台灣人表示，他們憂心或許您為了討好中國而在台灣主權上讓步。對此，您如何回應？

-- 受訪者被期待就「是否會為討好中國而在主權上讓步」回應，屬「是非問句」。

由上述問句分析可知，記者提問重點在於請馬總統說明不宣布獨立原因以及其是否會為了要討好中國而台灣主權有所讓步；依 Quirk, et al. 問句分類，前者屬開放性問句，後者則屬是否問句。開放性問句期望消息來源回應不宣布獨立之因。而非問句則期望得到的消息來源是否會討好中國而在主權上讓步之證實性或反駁性答案。

(二) 模糊語言層面

答句分析：

1. 所有這些指控均屬子虛烏有。--(2)

-- 受訪者針對提問提出回應，屬模糊語言之「攻擊提問內容」之「提問內容係基於錯誤假設」，亦即對提問內容進行攻擊或批判，指稱提問內容子虛烏有。

2. 過去 2 年來，我們與中國大陸就兩岸直航、食品安全、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及司法互助等簽署了 12 項協議。--(3)

-- 屬針對模糊回應「製造政策重點」之「自行提出政策分析」，亦即受訪者不直接回應問題卻利用回應製造重點藉以證明政策正當性，並在迴避提問同時創造新的論點。

3. 因為這些協議，我們不僅建立了友誼，也解決了兩岸因貿易及投資往來迅速發展而衍生的諸多問題。--(4)

-- 同上例，針對模糊回應「製造政策重點」，自行肯定其因為協議與對方不僅建立了友誼，也解決了若干問題。

4. 所有這些協議均有助台灣的繁榮與安定，而且這些協議中沒有任何一項條款對台灣主權或自主有所讓步，而且這些協議均屬公開文件。--(5)

- 亦同上例，屬針對模糊語言「製造政策重點」。由於主持人提問重點為馬總統不宣布獨立之因，而馬總統之回應與不宣布獨立一事無關，另以 ECFA 協議內容進行「自我辯護」。

由馬總統的回應來看，前測二共涉及「攻擊提問內容」及「製造政策重點」之「自行提出政策分析」、「自我肯定」及「自我辯護」等模糊語言類型。

(三) 語境分析

1. 馬總統，顯然有很多台灣人希望從您口中聽到這句話，或至少聽您解釋不說這句話的原因。

2. 且有很多台灣人表示，他們憂心或許您為了討好中國而在台灣主權上讓步。

對此，您如何回應？

本項提問為延續前（第一）組提問之追問，上述內容可看出，主持人提問消息來源「為何不宣布獨立」及「是否會為討好中國而在主權上讓步」，仍與「獨立」及「主權」等議題相關，其語境具有衝突性。

(四) 成因分析

與前測二雷同，官方消息來源於面臨國家主權及是否宣布獨立議題時，受國家政策方向框架限制，同時面臨明確表達獨立與否之雙避衝突情境，並礙於面子威脅不能不回應，故而形成官方消息模糊回應之可能因素。

前測三：

主持人：我剛才想說的是，如果真的是這樣，為何您目前的民意支持度低迷？我的意思是，即使在您 25 日的電視辯論會後，您的支持度仍未達 40%，而根據民調，您的支持度約為 38%，約 4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滿意。您對此有何解釋？

馬總統：我們的經濟正在復甦，但尚未恢復到美國經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前的狀態。因此我們會更努力。「國際貨幣基金」(IMF) 已預測，我國 2010 年的 GDP 成長率將達 6.5%，因此我確信，我國的經濟好轉後，情況會有所改善。

(一) 提問層面

問句分析

1. 我剛才想說的是，如果真的是這樣，為何您目前的民意支持度低迷？
 - 主持人詢問馬總統對民調支持度低迷之看法，並非要求受訪者提供證實或反駁，亦未提供選項供其選擇，而是請馬總統「解釋為何」。故依 Quirk, et al. 問句類型分類，應屬「開放性問句」。
2. 我的意思是，即使在您 25 日的電視辯論會後，您的支持度仍未達 40%，而根據民調，您的支持度約為 38%，約 4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滿意。您對此有何解釋？
 - 主持人詢問受訪者對民調及滿意度之看法。與本前測問句 1 同為「開放性問句」。

由上述前測可以看出，消息來源（如馬總統）在回應媒體之開放性提問時並未針對「民意支持度低迷」一事提供任何回應而是以「經濟復甦」為回答重點。

就前測三導引消息來源論述內容提問來看，本案例主持人的提問重點在於「為何您目前的民意支持度低迷？」及「根據民調，您的支持度約為 38%，約 4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滿意。您對此有何解釋？」

而依 Quirk, et al. 之問句類型分析屬性，提問並非要求回應者證實或反駁的是非問句，亦未提供選項要求受訪者，故亦非屬選擇性問句。在此提問中，由於回應者被期望回答的是針對與民意支持度低的看法及解釋，因此應屬「問句中包含了什麼、何時、為何、誰、哪些等疑問性問題」之「開放性問句」。

(二) 模糊語言層面

答句分析

1. 我們的經濟正在復甦，但尚未恢復到美國經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前的狀態。
 - (6)
 - 未回應對民調支持度低之看法，屬模糊回應之「忽略回應」。
2. 因此我們會更努力。「國際貨幣基金」(IMF) 已預測，我國 2010 年的 GDP 成長率將達 6.5%。--(7)
 - 未回應民調支持度低之看法，而是回應「因此我們會更努力」，並另陳述國際貨幣基金之預測內容作自我辯護，屬模糊回應「製造政策重點」，與未來作

法及期待有關。

3. 因此我確信，我國的經濟好轉後，情況會有所改善。--(8)

-- 未回應為何民調支持度低，僅表達個人認為「經濟好轉後情況將有改善」，即自行提出政策分析及承諾保證，屬模糊回應「製造政策重點」之「自行提出政策分析」。

由前述問題分析可知，前測三屬開放性問句，消息來源應就一些提問相關事項，如「民意支持度低迷」、「民調結果顯示不滿意」等回答。而由馬總統回應來看，其內容均未針對民調支持或對民調結果回應之相關字眼或訊息，可謂完全規避，符合 Bull 模糊語言分類之「忽略問題」。此外，馬總統在不回應同時另外提出與經濟有關的內容，應屬模糊回應的「製造政策重點」項目。

(三) 語境分析

1. 我剛才想說的是，如果真的是這樣，為何您目前的民意支持度低迷？
2. 我的意思是，即使在您 25 日的電視辯論會後，您的支持度仍未達 40%，而根據民調，您的支持度約為 38%，約 4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滿意。您對此有何解釋？

上述內容可看出，語境呈現議題與「民意支持度」有關，進而導引消息來源表達對民意支持度未達 40% 的開放性解釋回應。由於主持人提問內容是詢問消息來源「民意支持度低迷」，對消息來源而言，承認與否皆具衝突性，故而選擇以模糊語言回應，而由消息來源之模糊語言「忽略問題」及「製造政策重點」內容觀之，當涉及民意支持低之衝突性議題時，官方消息來源確有採取模糊語言回應之情形。

(四) 成因分析

官方消息來源面臨與民調支持度低相關議題時，因涉及面子威脅因素，導致該消息來源回應與不回應都尷尬的衝突情況而不願正面回應，進而形成官方消息來源模糊回應之可能因素。

經由上述分析似可判別，前測一至三之官方消息來源（馬總統）並未正面回

應問題而均以模糊語言回答，此應與衝突性語境有關，進一步依 Bull (2003) 建立之尺標來看，不直接回應猶可續分為「中間地帶」及「不回應」，而因馬總統回應內容與提問完全無涉或是僅有部分涉及則均屬不直接回應，亦即「模糊回應」（見表 3.3）。

表 3.3 本研究前測語境及模糊語類型歸類

提問分析	語境分析	回應內容分析	模糊語言類型
前測一： 讓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很多台灣人憂心，您並不支持獨立，自您當選總統後，您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	1. 國家主權 2. 宣布獨立	中華民國台灣99年來一直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沒理由再度宣布獨立。--(1)	不回應--不予回應 直接回應
前測二： 馬總統，顯然有很多台灣人希望從您口中聽到這句話，或至少聽您解釋不說這句話的原因。且有很多台灣人表示，他們憂心或許您為了討好中國而在台灣主權上讓步。對此，您如何回應？	1. 獨立 2. 主權	所有這些指控均屬子虛烏有。--(2)	不回應--攻擊提問內容
		過去2年來，我們與中國大陸就兩岸直航、食品安全、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及司法互助等簽署了12項協	不回應--製造政策重點

		議。--(3)	
		因為這些協議，我們不僅建立了友誼，也解決了兩岸因貿易及投資往來迅速發展而衍生的諸多問題。--(4)	不回應--製造政策重點
		所有這些協議均有助台灣的繁榮與安定，而且這些協議中沒有任何一項條款對台灣主權或自主有所讓步，而且這些協議均屬公開文件。--(5)	不回應--製造政策重點
前測三： 我剛才想說的是，如果真的是這樣，為何您目前的民意支持度低迷？我的意思是，即使在您 25 日的電視辯論會後，您的支持度仍未達 40%，而根據民調，您的支持度約為 38%，約 4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滿意。您對此有何解釋？	民意支持度	我們的經濟正在復甦，但尚未恢復到美國經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前的狀態。--(6)	不回應--忽略回應
		因此我們會更努力。	不回應--製造政策重點

		「國際貨幣基金」(IMF)已預測，我國2010年的GDP成長率將達6.5%。--(7)	
		因此我確信，我國的經濟好轉後，情況會有所改善。--(8)	不回應--製造政策重點
			以上共計模糊回應八項。包含不予回應1項、忽略回應1項、攻擊提問內容1項及製造政策重點5項)。

續依 Bull (2003) 之模糊語言分類尺標，中間地帶有不完整回應一類，而不回應類型有忽略問題、不予回應、對提問提出問題、攻擊提問、拒絕回應提問、製造政策重點、重複先前提問之回應內容、聲稱或暗示已經回答過問題、以道歉代替回應及拘泥於字面意義等十一類（詳表 3.1 之模糊語言尺標及類型總表所列）。

透過上述問句判別及模糊語言類型分析可知，官方消息來源（如此例之馬總統）面對提問完全採取模糊語言回應，其回應內容形式包括「中間地帶」之「不完整回應」，以及「不回應」之「忽略回應」、「不予回應」、「攻擊提問內容」及「製造政策重點」等類型。

五、檢討

本研究經上述程序及前測發現如下問題：

前測原本預期各項提問均可以單一回應對應 Bull 所列 12 項模糊回應項目，惟實際操作時，發現一項提問可能對應多個回應，亦即回應數多於提問數之情形。因此，判別及歸類時是涉及二個以上類型之情況，是否有必要合併或是保留

原類型值得思考。

本前測之語境分析與成因分析採各組前測問答各自分析方式，惟經前測後，由於是以同一採訪內容進行分析，故訪問者創造之語境以及可能造成消息來源模糊回應之成因多有雷同之處，導致後續分析內容重複性過高。

另前測三中出現消息來源以未來作法及期待之不直接回應方式，Bull 現有之模糊語言類型中並無適當類別可供歸類。

六、改進

針對前述有關模糊語言歸類重複現象及以網路資料進行蒐集等問題，相關檢討及改進如下：

在本研究前測案例，馬總統於每一組答句中均可能涉及多項模糊回應類型。經斟酌模糊回應並非單純行為反應，而是受到外在組織框架及心理衝突等作用之結果，具有重覆性應屬必然現象，為求周延討論模糊語言類型，本研究擬不排除而一併納入整體分析，採每一組答句分別歸類方式處理。

另有關語境及成因分析部份，因各組問答語境及模糊語言成因多有重複之處，為免分析內容過於冗長，本研究逐加以改善，不再採取各組分析方式，改由語境及成因各別綜合性分析方式進行。

至於模糊語言類型不足情況，為能精確分析國內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使用情形，未來進行研究分析時，將視分析內容予以重設模糊語言類型。

綜上所述，本研究對於模糊語言之探討主要係透過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論述分析台灣官方消息來源使用模糊語言之形式，研究對象以具有官方代表性之重要人物及其接受媒體訪問公開性採訪活動問答論述內容，具體探討國內消息來源模糊語言論述模式，以及模糊語言在新聞傳播之重要性。

七、正式分析樣本

（一）樣本選定

本研究沿用前測為正式樣本，亦即 2011 年 4 月 30 日馬英九總統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國際事務新聞節目主持人 Christiane Amanpour 越洋專訪

之全部問答過程內容，訪問時間約 20 分鐘，總計 17 組問答，提問共 25 個、回應共有 63 答句。

由於語境與媒體提問議題之設定有關，單一語境及多元語境均有研究價值，多元性之語境或許可以獲得豐富之模糊語言類型，但因語境多元，不利彰顯模糊語言在單一語境中之特質。基於本研究為初探性質，為能理解模糊語言在衝突性語境中實際被運用之情形，故而選定單一語境之研究樣本。本項案例為國際媒體之專訪，其提問事項以國際間關切之美中台關係議題為主，優點在於衝突性之單一語境，有利於與國外現有之衝突性模糊語言比較基礎。

（二）正式分析步驟

為清楚回應本研究之國內官方消息來源使用模糊語言情況、形式及成因等三項研究問題。經由前測修正，本研究後續以二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論述分析，分析主體包括問句及答句，藉由提問類型分析判別官方消息來源之回應是否使用模糊語言；答句分析則是將消息來源模糊回應之內容進行歸類及整理國內消息來源常用之模糊語言類型。

第二階段：語境分析及成因分析，先就提問內容涉及議題範圍進行語境分析，瞭解提問創造之語境。再就相關文獻探討之面子威脅、雙避衝突及組織框架等理論分析模糊語言可能因素，以利理解國內官方消息來源運用模糊語言之情形。

綜上言之，第一階段問句及答句分析主要係為回應前述第一項國內官方消息來源是否常運用模糊語言及第二項最常使用的模糊語言形式之研究問題。第二階段語境及成因分析則係為回應第三項國內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成因之研究問題。

（三）研究資料分析簡述

根據前測結果發現為回應消息來源是否使用模糊語言之研究問題，以問句及答句逐組逐句分析方式進行有其必要性。至於語境及成因分析，則因具有一致性，如語境屬整體氛圍，成因則具有高度重複性等因素，宜採整體性分析方式進行。

簡言之，在下一章節之研究資料分析與說明，將依上述二階段，以 Quirk, et al. (1985) 問句類型判別消息來源被預期回應型態，再依 Bull (2003) 模糊語言類型歸類整理類型。最後則進行整體性之語境分析及成因分析。



第四章 研究資料分析與說明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內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的應用情形及其成因。本章研究資料分析共分四部份，首節為問句與答句之逐句分析，次節則就問答之語境分析並就涉及模糊語言部份進行成因分析，最後則為綜合分析與說明。

第一節 問答分析

一、研究樣本問句、答句分析

首先依 Quirk, et al. (1985) 問句類型判別，續就官方消息來源回應內容依 Bull (2003) 模糊語言類型判別消息來源有無直接回應問題。茲就各組問句與答句分析如后（以下以「主持人」為 Christiane Amanpour 代稱，「受訪者」代表馬英九總統）：

第 1 組：

主持人：讓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很多台灣人憂心，您並不「支持獨立」—自您當選總統後，您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

馬總統：中華民國台灣 99 年來一直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沒理由再度宣布獨立。

(五) 提問分析

Q1 ...很多台灣人憂心，您並不支持獨立，自您當選總統後，您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

-- 主持人詢問受訪者「是否支持獨立」及「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前者屬「是否問句」，後者則屬「開放性問句」。

由主持人問句「很多台灣人憂心，您並不支持獨立」及「自您當選總統後，

您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可知，提問 1 之重點在於期望受訪者回應「是否支持獨立」以及為何「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依 Quirk, et al. 問句分類，本組問句分屬「是否問句」及「開放性問句」，期望得到受訪者是否支持台灣獨立之具證實性或反駁性回應以及為何「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之原因及理由。

(六) 答句分析

A1. 中華民國台灣 99 年來一直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沒理由再度宣布獨立。

- 本項提問重點為受訪者「是否支持獨立」及「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就其是否支持獨立面向來看，受訪者並未回應。但由其後續之「沒理由再度宣布獨立」回應觀之，受訪者確實收到提問中有關主權獨立的訊息，但僅表達了「不宣布獨立」的理由而未說明其「是否支持獨立」。因此就「是否支持獨立」提問而言，受訪者確有聽到提問但無任何回應意願或是無打算回應，屬模糊回應之「不予回應」。
- 再就「是否會宣布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提問來看，受訪者回應「中華民國台灣 99 年來一直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沒理由再度宣布獨立」。「沒理由再度宣布獨立」具體表達了受訪者「不宣布獨立」之態度及理由，以「中華民國台灣 99 年來一直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之「已存在事實」為「不宣布獨立」之理由，應屬「直接回應提問」。

第 2 組

主持人：馬總統，顯然有很多台灣人希望從您口中聽到這句話，或至少聽您解釋不說這句話的原因。且有很多台灣人表示，他們憂心或許您為了討好中國而在台灣主權上讓步。對此，您如何回應？

馬總統：所有這些指控均屬子虛烏有。過去2年來，我們與中國大陸就兩岸直航、食品安全、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及司法互助等簽署了12項協議。因為這些協議，我們不僅建立了友誼，也解決了兩岸因貿易及投資往來迅速發展而衍生的諸多問題。所有這些協議均有助台灣的繁榮與安定，而且這些協議中沒有任何一項條款對台灣主權或自主有所讓步，而且這些協議均屬公開文件。

(一) 問句分析

Q2-1 馬總統，顯然有很多台灣人希望從您口中聽到這句話，或至少聽您解釋不說這句話的原因。

-- 由第1組問答脈絡來看，主持人提及的「這句話」意指「宣布台獨」。而繼第一組提問後主持人再次提出，請受訪者「解釋『不宣布』台灣獨立」之原因。此項提問沒有肯定或否定或是選擇性的選項而是請受訪者「解釋」不宣布台獨的原因，故依 Quirk, et al. 問句分類應屬「開放性問句」。

Q2-2 且有很多台灣人表示，他們憂心或許您為了討好中國而在台灣主權上讓步。對此，您如何回應？

-- 受訪者被期待就「是否會為討好中國而在主權上讓步」回應，屬「是否問句」。

由上述問句分析可知，記者提問重點在於請馬總統說明不宣布獨立原因以及是否會為了要討好中國而台灣主權有所讓步；故依 Quirk, et al. 問句分類，前者屬開放性問句，後者則屬「是否問句」。

(二) 答句分析：

A2-1 所有這些指控均屬子虛烏有。

-- 受訪者指稱提問內容為「子虛烏有」，批判提問內容之錯誤、不正確卻未針對

主持人詢問「為何不說這句話(台灣主權獨立)」或「是否會為討好中國而在台灣主權上讓步」具體回應。依 Bull 模糊語言類型，本項提問屬模糊語言「攻擊提問內容」之「提問內容係基於錯誤假設」，亦即指受訪者針對提問內容進行攻擊或批判。

A2-2 過去 2 年來，我們與中國大陸就兩岸直航、食品安全、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及司法互助等簽署了 12 項協議。

-- 同上，受訪者並未針對提問內容具體回應而是另外提出「過去 2 年來...」。依 Bull 模糊類型分類，屬「製造政策重點」之「自行提出政策分析」，亦即受訪者不直接回應問題卻利用回應製造重點藉以證明政策正當性，迴避提問之同時創造了新的論點。

A2-3 因為這些協議，我們不僅建立了友誼，也解決了兩岸因貿易及投資往來迅速發展而衍生的諸多問題。

-- 同上例，受訪者再次另設重點，屬模糊回應「製造政策重點」之「自我肯定」，自行提出政策分析並自我辯護藉以迴避提問同時創造新的論點。

A2-4 所有這些協議均有助台灣的繁榮與安定，而且這些協議中沒有任何一項條款對台灣主權或自主有所讓步，而且這些協議均屬公開文件。

-- 與前例相同，由於主持人提問重點為詢問受訪者「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之因，然而受訪者之回應均與此無關，係另以 ECFA 協議內容自我辯護。依 Bull 模糊語言類型分類，此屬「製造政策重點」之「自我辯護」。

第 3 組

主持人：我剛才想說的是，如果真的是這樣，為何您目前的民意支持度低迷？我

的意思是，即使在您 25 日的電視辯論會後，您的支持度仍未達 40%，而根據民調，您的支持度約為 38%，約 4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滿意。您對此有何解釋？

馬總統：我們的經濟正在復甦，但尚未恢復到美國經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前的狀態。因此我們會更努力。「國際貨幣基金」(IMF) 已預測，我國 2010 年的 GDP 成長率將達 6.5%，因此我確信，我國的經濟好轉後，情況會有所改善。

(一) 問句分析

Q3-1 我剛才想說的是，如果真的是這樣，為何您目前的民意支持度低迷？

-- 主持人詢問受訪者對民調支持度低迷之看法，並非要求其提供證實或反駁亦未提供選項供其選擇，而是請其解釋或說明。故依 Quirk, et al. 問句類型分類應屬「開放性問句」。

Q3-2 我的意思是，即使在您 25 日的電視辯論會後，您的支持度仍未達 40%，而根據民調，您的支持度約為 38%，約 4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滿意。您對此有何解釋？

-- 主持人詢問受訪者對民調及滿意度之看法，故屬「開放性問句」。

依 Quirk, et al. 之問句類型分析屬性，提問並非要求回應者證實或反駁的是非問句亦未提供選項要求受訪者，故非屬「選擇性問句」。在此提問中，由於回應者被期望回答的是針對與民意支持度低的看法及解釋，因此應屬「問句中包含了什麼、何時、為何、誰、哪些等疑問性問題」之「開放性問句」。

(二) 答句分析

A3-1 我們的經濟正在復甦，但尚未恢復到美國經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前的狀態。

- 由上述問句分析可知，主持人提問重點在於受訪者對於民調低迷的看法，惟其並未回應「民意支持度低迷」而是轉以「經濟復甦」為回答重點。由於回應完全忽視提問亦無任何回應的意願，甚至連表達確實有聽到提問（對民調支持度低之看法）的反應都沒有，應屬模糊回應之「忽略回應」。

A3-2 因此我們會更努力。「國際貨幣基金」(IMF) 已預測，我國 2010 年的 GDP 成長率將達 6.5%。

- 就本組提問內容觀之，主持人提問重點在於「為何您目前的民意支持度低迷？」及「根據民調，您的支持度約為 38%，約 4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滿意。您對此有何解釋？」
- 分析受訪者本項答句，仍未對於民調支持度低回應，而是轉以「我們會更努力」以及「國際貨幣基金已預測，我國 2010 年的 GDP 成長率將達 6.5%」答覆。依 Bull 之模糊語言分類應屬「製造政策重點」，惟細部分類並無適用類型，為求精準暫將此項回應另設為「未來作法及期待」。

A3-3 因此我確信，我國的經濟好轉後，情況會有所改善。

- 受訪者仍未回應為何民調支持度低，而是表達其個人認為「經濟好轉後情況將有改善」，即自行提出政策分析及承諾保證，屬模糊回應之「製造政策重點」之「自行提出政策分析」。

第 4 組

主持人：您希望展現出成果—具體成果的議題之一，就是您希望與中國簽署「兩岸經濟協議」(ECFA)。但您的人民表示，他們並不瞭解 ECFA，並認為 ECFA

將使台灣過度依賴中國。您要怎麼向他們說明？

馬總統：這個協議的全名叫做「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ECFA 包含 3 部分。第一部分是關稅減免，第二部分是投資保障，第三部分是保護智慧財產權。當我向人民解釋的時候，民眾會瞭解。事實上，在週日（4 月 25 日）與在野黨主席電視辯論後，瞭解且支持 ECFA 的台灣人民已較之前大幅增加。因此我很有信心，只要今後持續說明 ECFA 的內涵，人民將會支持我們的政策。且這項政策將對台灣極為有利，不僅是出口增加，還可吸引更多外資。

（一）問句分析

Q4 您希望展現出成果—具體成果的議題之一，就是您希望與中國簽署「兩岸經濟協議」(ECFA)。但您的人民表示，他們並不瞭解 ECFA，並認為 ECFA 將使台灣過度依賴中國。您要怎麼向他們說明？

-- 提問者期望受訪者說明 ECFA，尤其是針對「ECFA 是否將使台灣過度依賴中國」一事回覆。依 Quirk, et al.之問句類型分析當屬「開放性問句」。

（二）答句分析

A4-1 這個協議的全名叫做「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包含 3 部分。第一部分是關稅減免，第二部分是投資保障，第三部份是保護智慧財產權。當我向人民解釋的時候，民眾會瞭解。

-- 受訪者說明 ECFA 的中文全稱及其所包含的部份，雖有針對 ECFA 回應，但對提問涉及之「ECFA 是否將使台灣過度依賴中國」則未答覆。依 Bull 之模糊語

言類型，本組問答之回應內容涉及模糊語言類型「不完整回應」之「部份回應」。

A4-2 事實上，在週日（4月25日）與在野黨主席電視辯論後，瞭解且支持 ECFA 的台灣人民已較之前大幅增加。

--本段回應既無涉 ECFA 實質內容亦未回應「ECFA 是否將使台灣過度依賴中國」一事，而是以「與在野黨主席電視辯論後，瞭解且支持 ECFA 的台灣人民已較之前大幅增加」取代。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本組回應內容涉及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之「證明政策的正當性」。

A4-3 因此我很有信心，只要今後持續說明 ECFA 的內涵，人民將會支持我們的政策。

-- 受訪者以自我肯定方式回應，內容並未涉及 ECFA 實質內容亦未針對「ECFA 是否將使台灣過度依賴中國」回覆而是強調很有信心，未來只要持續說明就會獲得人民支持與肯定。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本組回應內容涉及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之「自我肯定」。

A4-4 且這項政策將對台灣極為有利，不僅是出口增加，還可吸引更多外資。

-- 同上，受訪者回應未涉 ECFA 實質內容，亦未針對「ECFA 是否將使台灣過度依賴中國」一事回覆，而僅提及該政策「對台灣極為有利」且「不僅是出口增加，還可吸引更多外資」。受訪者對此政策不僅給予高度正面肯定，還提出具體可能產生的「出口增加」及「吸引更多外資」情況。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本組回應內容應屬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

第 5 組

主持人：我是否可以—我想引述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您當選後發表的談話。他

呼籲中國與台灣「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您是否同意?而除了 ECFA 之外，您將如何做到這些？

馬總統：除了經濟關係，我們也希望增進兩岸文化之交流。例如，我們已開放數十萬名大陸觀光客來台。他們將—事實上，他們確實能認同—台灣的生活方式—自由、民主與繁榮。

(一) 問句分析

Q5-1 我是否可以—我想引述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您當選後發表的談話。他呼籲中國與台灣「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您是否同意?

-- 提問者期望受訪者針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談話內容表達同意與否。依 Quirk, et al.之問句類型分析此屬「是否問句」，亦即受訪者被期望回應「同意」或是「不同意」的答案。

Q5-2 而除了 ECFA 之外，您將如何做到這些？

-- 提問者期望受訪者說明除了 ECFA 外如何做到「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呼籲的『中國與台灣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依 Quirk, et al.之問句類型分析應屬「開放性問句」。

(二) 答句分析

A5-1 馬總統：除了經濟關係，我們也希望增進兩岸文化之交流。例如，我們已開放數十萬名大陸觀光客來台。

-- 受訪者並未針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所言（呼籲中國與台灣「建立互信、擱

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 表示同意與否亦未表達如何進行，而係以新的期許「希望增進兩岸文化之交流」回應。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本項回應內容應屬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

A5-2 他們將一事實上，他們確實能認同一台灣的生活方式一自由、民主與繁榮。

-- 受訪者仍未針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所言表示同意與否或表達如何進行，而係以他人能認同台灣自由、民主與繁榮的生活方式回應。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本項回應內容應屬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之「自我肯定」。

第 6 組

主持人：在何種情況下您會同意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

馬總統：我目前沒有與中國大陸領導人會面的計畫。我認為，對兩岸最重要的事，是從經濟協議、文化交流、教育交流開始，為雙方進一步的關係奠定基礎。我認為，兩岸領導人會面的時機尚未成熟。

(一) 問句分析

Q6 在何種情況下您會同意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

-- 提問者期望受訪者回答將在何種情形下與特定人物（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此種情況指的是情境或是場合。依 Quirk, et al. 之問句類型分析應屬「開放性問句」，受訪者可用描述性的敘述句具體描述。

(二) 答句分析

A6-1 我目前沒有與中國大陸領導人會面的計畫。

-- 受訪者表示目前無意願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但未進一步說明在何種

情況下可以會面。由於開放性問句期待消息來源表達願意會面情境等訊息，惟消息來源以否定性回應，以「不會發生」來取代發生的條件。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本項回應內容應屬模糊語言類型「不完整回應」之「否定性回應」。

A6-2 我認為，對兩岸最重要的事，是從經濟協議、文化交流、教育交流開始，為雙方進一步的關係奠定基礎。

-- 受訪者指出「兩岸最重要的事是...」，此回應內容與提問「在何種情況下您會同意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並無關連，此為「答非所問」之情況，受訪者並不直接回應問題卻另外製造重點。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本項回應內容應屬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

Q6-3 我認為，兩岸領導人會面的時機尚未成熟。

-- 受訪者指出「時機尚未成熟」，此回應內容與提問「『在何種情況下』您會同意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並無關連，表達目前不會會面但對「在何種情況下」同意會面則未具體回應，而是另外製造重點。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本項回應內容應屬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

第 7 組

主持人：有人提出，您可能會接受由美國主辦的 2011 年「亞太經合會」(APEC) 峰會之邀請。該峰會將在夏威夷舉行。您是否會接受邀請？當然中國國家主席也會出席。

馬總統：這是一位美國學者提出的假設性問題，我們仍未收到 APEC 主辦單位對此議題的任何資訊。

(一) 問句分析

Q7 有人提出，您可能會接受由美國主辦的 2011 年「亞太經合會」(APEC) 峰會之邀請。該峰會將在夏威夷舉行。您是否會接受邀請？當然中國國家主席也會出席。

- 本項問句重點為「您是否會接受邀請？」，提問者主要係期望消息來源明確表示是否接受邀請出席亞太經合會，因此「是」與「否」將是聽者希望聽到的答案。依 Quirk, et al. 之問句類型分析屬性，應屬「是否問句」。

(二) 答句分析

A7-1 這是一位美國學者提出的假設性問題。

- 消息來源指出提問內容為美國學者提出的「假設性問題」，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觀之，本項回應內容應屬模糊語言類型「攻擊提問內容」之「所提問題屬假設性問題」。

A7-2 我們仍未收到 APEC 主辦單位對此議題的任何資訊。

- 消息來源以「未收到主辦單位資訊」提問回應，此類型回應係以非自身可掌握之「他者因素」為理由，亦即因他者或另一方緣故，導致無法回答提問。經檢視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項目，本項回應內容並未出現於其所整理之模糊語言類型。為免研究結果偏誤，故將此項目暫列於研究者自行編排之「他者因素」，可定義為「消息來源指稱因他人、另方或是超出自身可掌握範圍因素導致無法具體回應」。

主持人：但您認為，如果從現在到 APEC 舉行之前，您接獲正式邀請——而正如您所說的，您將需要更多關於邀請的細節——您是否會考慮？您是否會接受參加 APEC 之邀請？

馬總統：正如我先前所說，這是一個高度的假設性問題。因為過去我們一直無法派遣高層代表參加 APEC 會議。我不認為這個情況在短期內有任何改變的可能性。

（一）問句分析

Q8-1 但您認為，如果從現在到 APEC 舉行之前，您接獲正式邀請——而正如您所說的，您將需要更多關於邀請的細節——您是否會考慮？

-- 本項問句重點仍為「您是否會接受邀請？」。在前組提問中主持人已問及受訪者是否接受邀請出席亞太經合會但其並未明確表達「是」或「否」，以致主持人「追問」期能得到明確答案。依 Quirk, et al. 問句類型，此屬「是否問句」。

Q8-2 您是否會接受參加 APEC 之邀請？

-- 本項問句為第三次有關「是否會接受邀請出席亞太經合會」之提問，再三追問的目的仍如上述期盼聽到受訪者明確回應；依 Quirk, et al. 問句類型仍屬「是否問句」。

（二）答句分析

A8-1 正如我先前所說，這是一個高度的假設性問題。

-- 本項答句「正如我先前說」，消息來源表示已經回答過問題，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分類應屬「聲稱或暗示已回應」。

- 另與第 7 組答句相同，消息來源回應「這是一個高度的假設性問題」，再次指出提問內容為「假設性問題」。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本項回應應屬模糊語言類型「攻擊提問內容」之「所提問題屬假設性問題」。

A8-2 因為過去我們一直無法派遣高層代表參加 APEC 會議。

- 受訪者延續前組答句「他者因素」型態指出，「過去我們一直『無法』派遣高層代表參加 APEC 會議」，以「過去一直無法派遣代表」因素回應提問表示自身因素而係「他者因素」無法回應，故將此項目暫列於研究者設置之「他者因素」項目。

A8-3 我不認為這個情況在短期內有任何改變的可能性。

- 受訪者指出不可能被改變的情況，隱含其對他者因素所造成無法出席亞太經合會的看法，雖未明指無法出席結果之肇因對象，但顯然歸究其於某對象。而受訪者表示「我不認為...」，係以自身立場表達看法，由於 Bull 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中並無適當細項可供歸類，本項回應內容新增「自身立場或看法」類型。

第 9 組

主持人：如果您願意的話，我想請問您關於未來的政治情況。您對「一國兩制」的觀點與立場是什麼？例如，就像中國與香港的模式，能適用於中國大陸與台灣嗎？

馬總統：不行。我不認為「一國兩制」對台灣是好的方案，因為台灣與香港迥然

不同。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我們選出自己的總統、自己的國會，並且獨立運作。我們希望與中國大陸有更緊密的貿易與投資關係，但確定的是，我們希望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此，我在兩年前就職時，就已經非常清楚地表示，我們將會維持現狀——也就是在 1946 年制訂的中華民國憲法框架下，「不統、不獨、不武」。

(一) 問句分析

Q9-1 如果您願意的話，我想請問您關於未來的政治情況。您對「一國兩制」的觀點與立場是什麼？

-- 本項問句含兩個重點，一為受訪者對一國兩制的「觀點」，二為其對一國兩制的「立場」。由於「觀點」與「立場」的表達屬陳述性，依 Quirk, et al.之問句類型應屬「開放性問句」。

Q9-2 例如，就像中國與香港的模式，能適用於中國大陸與台灣嗎？

-- 本項問句延續前項「對於『一國兩制』的觀點與立場」提問，以例舉方式請受訪者明確表達「中國與香港的模式『是否』能適用於中國大陸與台灣？」，依 Quirk, et al.問句類型分析應屬「是否問句」。

(二) 答句分析

A9-1 不行。我不認為「一國兩制」對台灣是好的方案，因為台灣與香港迥然不同。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我們選出自己的總統、自己的國會，並且獨立運作。

-- 本項答句為受訪者先回應了提問 Q9-2（見下段）並採否定性回應「不行」，屬

明確之「直接回應」，針對提問之例舉「中國與香港的模式『是否』能適用於中國大陸與台灣？」表達看法，認為「中國與香港的模式是『不行』適用於中國大陸與台灣」。

- 受訪者接續回應「我不認為『一國兩制』對台灣是好的方案，因為台灣與香港迥然不同」，延續前項回應解釋「不行」之理由是因為「台灣與香港迥然不同」。
- 隨後受訪者進一步說明不同之處為「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我們選出自己的總統、自己的國會，並且獨立運作」，至於香港部份未有所說明。

A9-2 我們希望與中國大陸有更緊密的貿易與投資關係，但確定的是，我們希望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 本組提問期望受訪者針對「一國兩制」回應，受訪者則表達對未來之期望如「『我們希望』與中國大陸有更緊密的貿易與投資關係」及「『我們希望』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等訊息。雖未明確提及與「一國兩制」關連性，惟其開放性回應可對應與「觀點」及「立場」相關之提問。依 Bull 模糊語言分類應屬「製造政策重點」，至於細節分類選項則另列於「未來作法與期望」。

A9-3 因此，我在兩年前就職時，就已經非常清楚地表示，我們將會維持現狀——也就是在 1946 年制訂的中華民國憲法框架下「不統、不獨、不武」。

- 受訪者就提問之「立場」部份進一步回應「維持現狀」及「不統、不獨、不武」看法，係「直接回應」。

本項提問與回應相互交錯，故綜合分析如下：本組提問重點分有「一國兩制

的觀點與立場」及「中國與香港的模式，能適用於中國大陸與台灣」兩點，前者屬「開放性問句」而後者為「是否問句」。針對前者之回應受訪者有部份說明，如「不認為『一國兩制』對台灣是好的方案」、「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我們選出自己的總統、自己的國會，並且獨立運作」、「我們希望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兩年前就職時，就已經非常清楚地表示，我們將會維持現狀——『不統、不獨、不武』」等；至於「中國與香港的模式，能適用於中國大陸與台灣」之提問則明確表達「不行」。基本而言，受訪者針對本組提問係以「直接回應」方式。

第 10 組

10.主持人：而正如您所知，全世界很多人，包括美國都認為中國是一個日益強大的強權--經濟強權與政治強權。若干人士擔憂中國日漸增長的軍事實力，尤其中國持續增加國防支出，您是否認為中國將成為一個逐漸擴大的軍事威脅？

馬總統：60 年來中國大陸一直是台灣的軍事威脅。我們決定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希望透過軍事以外的手段降低台海緊張。

就我們而言，過去兩年來我們已緩和台海緊張，使這個地區較以往更和平。因此，我認為緩和緊張並降低敵對氛圍甚為重要。但達成此事的方式不必然要從事軍備競賽。我認為我們有其他降低緊張的方法，且事實上我們已做到了。有關我國與台灣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我們完全支持數十年前美中三個聯合公報所反映的一個中國政策。我們無意改變這樣的政策與立場。

(一) 問句分析

- Q10 而正如您所知，全世界很多人，包括美國都認為中國是一個日益強大的強權--經濟強權與政治強權。若干人士擔憂中國日漸增長的軍事實力，尤其中國持續增加國防支出，您是否認為中國將成為一個逐漸擴大的軍事威脅？
- 本項問句重點在於受訪者「是否認為中國將成為一個逐漸擴大的軍事威脅」，依 Quirk, et al.之問句類型應屬「是否問句」。

(二) 答句分析

- A10-1 60年來中國大陸一直是台灣的軍事威脅。
- 本組問句重點為受訪者「是否認為中國將成為一個逐漸擴大的軍事威脅」，其回應「60年來中國大陸一直『是』台灣的軍事威脅」，就提問重點來看已直接回應了提問。
- A10-2 我們決定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希望透過軍事以外的手段降低台海緊張。
- 本項答句與「中國成為一個逐漸擴大的軍事威脅」無關，而係延續受訪者前述回應「60年來中國大陸一直『是』台灣的軍事威脅」而另起重點的轉折性說明。依 Bull 模糊語言類型應屬「製造政策重點」，細項則為「未來作法與期待」。
- A10-2 就我們而言，過去兩年來我們已緩和台海緊張，使這個地區較以往更和平。
- 消息來源已於前答句中回應並再延續對台海緊張情事的看法為「已和緩...，使這個地區較以往更和平」。依 Bull 模糊語言類型觀之，本項回應內容應屬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之「自我肯定」。

A10-3 因此，我認為緩和緊張並降低敵對氛圍甚為重要。但達成此事的方式不必然要從事軍備競賽。我認為我們有其他降低緊張的方法，且事實上我們已做到了。

-- 受訪者接續回應「緩和緊張並降低敵對氛圍甚為重要，但達成此事的方式不必然要從事軍備競賽。我認為我們有其他降低緊張的方法，且事實上我們已做到了」。答句內容與問句無相關，屬額外提出看法，依 Bull 模糊語言類型應屬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之「自我肯定」。

A10-4 有關我國與台灣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我們完全支持數十年前美中三個聯合公報所反映的一個中國政策。我們無意改變這樣的政策與立場。

--本項答句係以一個中國政策立場為主，與本組問句「是否認為中國將成為一個逐漸擴大的軍事威脅」無關，同時答句「...我們無議改變這樣的政策與立場。」主要係表達受訪者身未來作法與期望，應屬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之新增類型「未來作法與期望」。

第 11 組

11. 主持人：我想繼續探討台美關係——但當然也包括美中關係。過去數年甚至數十年以來，許多人認為這是將引發或可能引發美中衝突的議題。您認為這樣的憂慮是否仍切合實際？

馬總統：是的，這的確是一項擔憂。但已是過去的擔憂。

過去兩年以來，我們在促進兩岸關係方面的作為已緩和緊張情勢。換句話說，我們與大陸達成多項協議，擴大了經貿、投資及文化交流。因此，曾經是東亞

衝突引爆點的台灣海峽如今已成為和平繁榮的地區。台美中三邊關係正處於 60 年來最佳狀態。

(一) 問句分析

Q11 我想繼續探討台美關係——但當然也包括美中關係。過去數年甚至數十年以來，許多人認為這是將引發或可能引發美中衝突的議題。您認為這樣的憂慮是否仍切合實際？

- 本項問句重點在於針對台美關係可能引發美中衝突的憂慮，受訪者「是否認為切合實際？」，依 Quirk, et al. 問句類型應屬「是否問句」。

(二) 答句分析

A11-1 是的，這的確是一項擔憂，但已是過去的擔憂。

- 受訪者採取肯定性回應直接提出「是的，這的確是一項擔憂」，係針對「台美關係可能引發美中衝突的憂慮」表達明確看法，認為台美關係可能引發美中衝突，屬「直接回應」。

A11-2 過去兩年以來，我們在促進兩岸關係方面的作為已緩和緊張情勢。換句話說，我們與大陸達成多項協議，擴大了經貿、投資及文化交流。因此，曾經是東亞衝突引爆點的台灣海峽如今已成為和平繁榮的地區。台美中三邊關係正處於 60 年來最佳狀態。

- 受訪者已於前句回應了提問，故本項答句屬延續性回應，在確認台美關係是美中關係的擔憂後接續表示那是過去的擔憂並另起一段說明，其理由如「我們與大陸達成多項協議，擴大了經貿、投資及文化交流」並強調對其政策的

肯定如「曾經是東亞衝突引爆點的台灣海峽如今已成為和平繁榮的地區」等。依 Bull 模糊語言類型觀之，本項回應內容包含了兩項模糊語言類型，即「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

第 12 組

12. 主持人：談到這裡，在我們休息之前您曾提到降低軍備競賽想法的必要性。

當然，最近美國宣布售台價值逾 60 億美元的武器，顯然引發了北京方面極為強烈的反應。我要播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此事的評論給您聽：「美方的行徑嚴重損害中方核心利益，嚴重損害了中美關係。中美在國際與區域問題方面的合作將會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美方要為此負起全部責任。」

中場休息

主持人：那麼，馬總統，這是北京方面的觀點。我提出這點是因為這個問題在美國愈來愈常被提到。我要唸一段美國前官員對台美關係的看法給您聽：羅斯可夫（David Rothkopf）年初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雙月刊撰文表示「台灣很小。她能給我們帶來的真正戰略利益非常少。事實上，中國可以隨時取回台灣，不管美國數十年來的說法為何，確實不值得為台灣捲入戰爭。」您對此如何回應？

馬總統：我們並未要求美國捲入與中國大陸的戰爭。我們只是尋求購買防禦性的武器。

事實上，美國所做的是依據「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而「台灣關係法」是美國聯邦法律。我們需要防禦性武器來捍衛台灣的民主。實際上，這不僅符合台灣的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學者的觀點並非反映行政

部門的觀點。

(一) 問句分析

Q12 那麼，馬總統，這是北京方面的觀點。我提出這點是因為這個問題在美國愈來愈常被提到。我要唸一段美國前官員對台美關係的看法給您聽：羅斯可夫 (David Rothkopf) 年初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雙月刊撰文表示「台灣很小。她能給我們帶來的真正戰略利益非常少。事實上，中國可以隨時取回台灣，不管美國數十年來的說法為何，確實不值得為台灣捲入戰爭。」您對此如何回應？

- 本項問句主要是請受訪者針對羅斯可夫有關於「台灣很小。她能給我們帶來的真正戰略利益非常少。事實上，中國可以隨時取回台灣，不管美國數十年來的說法為何，確實不值得為台灣捲入戰爭」說法回應，依 Quirk, et al. 問句類型應屬「開放性問句」。

(二) 答句分析

A12-1 我們並未要求美國捲入與中國大陸的戰爭。

- 本組回應「我們並未要求美國捲入與中國大陸的戰爭」，符合開放性問句的要求，屬「直接回應」。

A12-2 我們只是尋求購買防禦性的武器。事實上，美國所做的是依據「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而「台灣關係法」是美國聯邦法律。我們需要防禦性武器來捍衛台灣的民主。實際上，這不僅符合台灣的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利益。

- 受訪者在上述直接回應後，另外提出「我們只是尋求購買防禦性的武器。事實上，美國所做的是依據『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而『台灣關係法』是美國聯邦法律」。此處有關「防禦性武器」、「台灣關係法」及「購買防禦性武器是符合台灣、美國利益」等話題均未出現在本組提問而係由受訪者自行提出。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應屬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

A12-3 美國學者的觀點並非反映行政部門的觀點。

- 受訪者指出有關羅斯可夫的說法是「美國學者的觀點，而非反映行政部門的觀點」，認為是「他者」看法而並非美國政府政策，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應屬「製造政策重點」之「以外部攻擊方式攻擊對手」類型，唯此處之「對手」指問句中被引用說法的特定人士羅斯可夫而非真正對手。

第 13 組

13.主持人：然而，您知道，許多美國人表示—即便美國正在伊拉克、阿富汗竭盡全力打擊恐怖主義—但為台灣甘冒走向戰爭的風險真的值得嗎？因此，我想再次請教您的是：若美國為了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而減少對台軍售，您覺得會發生甚麼情況？而這也是您的目標—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馬總統：如果美國對台軍售少於目前的標準，這會降低這個區域的信心。台灣需要武器來捍衛其國家及民主，而過去 2 年因為我們努力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已經大幅降低緊張情勢，這比減少對台軍售更為重要。事實上，尤其當台灣正與中國大陸就貿易及其他事務進行談判之際，美國對台軍售可增加台

灣的信心與安全感，台灣希望從有利而非不利的立場來談判，也因此華府非常瞭解軍售會有助維持區域安全。

(一) 問句分析

Q13-1 然而，您知道，許多美國人表示—即便美國正在伊拉克、阿富汗竭盡全力打擊恐怖主義—但為台灣甘冒走向戰爭的風險真的值得嗎？

-- 本項問句「但為台灣甘冒走向戰爭的風險真的值得嗎？」指「許多美國人有此看法」，同時也延續前組（第 12 組）有關美國前官員羅斯可夫的看法，乃主持人針對「美國是否值得為台灣冒戰爭之風險」提問進行「追問」，依 Quirk, et al.之問句類型分析應屬「開放性問句」。

Q13-2 因此，我想再次請教您的是：若美國為了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而減少對台軍售，您覺得會發生甚麼情況？而這也是您的目標—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 本項問句重點在於「若美國為了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而減少對台軍售，您覺得會發生甚麼情況？」，主要期望受訪者表達對美國減少對台軍售之看法，依 Quirk, et al.之問句類型分析屬性應屬「開放性問句」。

(二) 答句分析

A13-1 如果美國對台軍售少於目前的標準，這會降低這個區域的信心。

-- 本項問句有兩項疑問句，一是 Q13-1「但為台灣甘冒走向戰爭的風險真的值得嗎？」，另一則是 Q13-2「若美國為了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而減少對台軍售，您覺得會發生甚麼情況？」

-- 受訪者先就 Q13-2 回應，「如果美國對台軍售少於目前的標準，這會降低這個

區域的信心」，內容明確包含提問之「對台軍售」關鍵字且表述了將會產生「降低區域信心」之後果，故可謂直接回應了提問。

A13-2 台灣需要武器來捍衛其國家及民主，而過去2年因為我們努力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已經大幅降低緊張情勢，這比減少對台軍售更為重要。

-- 在直接回應後受訪者另又說明台灣需要武器是因為要捍衛國家及民主，同時經過2年努力已讓兩岸關係緊張情勢降低，而這些比美國減少對台軍售更加重要。

-- 基本而言，本項說明並未回應提問而是自行提出延伸性說明，認為過去的努力產生了降低兩岸緊張情勢之結果。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應屬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之「自我肯定」。

A13-3 事實上，尤其當台灣正與中國大陸就貿易及其他事務進行談判之際，美國對台軍售可增加台灣的信心與安全感，台灣希望從有利而非不利的立場來談判，也因此華府非常瞭解軍售會有助維持區域安全。

-- 受訪者持續強調「美國對台軍售可增加台灣的信心與安全感」，意指其對美國對台軍售之期望。本項說明與提問無關而是自行表達看法與期待，並認定他者有亦有同質性看法。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本項回應內容雖可適用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但未有合適細項可供歸類，暫列「未來作法與期待」。

第 14 組

14.主持人：當然，您提到中國對台瞄準飛彈。我想問您一個問題，如果可以的話

話，請您立即回應這個在美國時而被問到的問題：美國為何要為台灣冒這麼大的險？

馬總統：誠如我所說，目前美國承受的風險為六十年來最低，過去的風險遠遠超過現在。因為我們採取與中國大陸和解政策的努力結果，緊張情勢已大幅舒緩，這就是為何如同過去政府，現任政府對過去2年達到的成果感到非常滿意。我們將持續降低風險並向美國軍購，但我們不會要求美國為台灣而戰，這是非常清楚的事。

(一) 問句分析

Q14.當然，您提到中國對台瞄準飛彈。我想問您一個問題，如果可以的話，請您立即回應這個在美國時而被問到的問題：美國為何要為台灣冒這麼大的險？

-- 本項問句重點在「美國為何要為台灣冒這麼大的險？」，本質上係追問前組提問重點「美國為何要為台灣冒這麼大的險」，依 Quirk, et al.之問句類型應屬「開放性問句」。

(二) 答句分析

A14-1 誠如我所說，目前美國承受的風險為六十年來最低，過去的風險遠遠超過現在。因為我們採取與中國大陸和解政策的努力結果，緊張情勢已大幅舒緩，這就是為何如同過去政府，現任政府對過去2年達到的成果感到非常滿意。

-- 如前所述，本句重點為主持人再次詢問「美國為何要為台灣冒這麼大的險？」，係基於受訪者於未有回應前句所提出之追問。

- 受訪者首先回應「誠如我所說...」，意指先前已經回答過了。依 Bull 模糊語言類型，本項回應內容應屬模糊語言類型「聲稱或暗示已回應」。
- 受訪者於「聲稱或暗示已回應」後繼續回應「目前美國承受的風險為六十年來最低，過去的風險遠遠超過現在。因為我們採取與中國大陸和解政策的努力結果，緊張情勢已大幅舒緩，這就是為何如同過去政府，現任政府對過去 2 年達到的成果感到非常滿意」，與提問「美國為何要為台灣冒這麼大的險」並無關連而是另外製造重點。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本項回應內容應屬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之「自我肯定」。

A14-2 我們將持續降低風險並向美國軍購，但我們不會要求美國為台灣而戰，這是非常清楚的事。

- 本組提問重點為主持人再次詢問「美國為何要為台灣冒這麼大的險？」，受訪者並未正面回應提問，而係以「我們不會要求美國為台灣而戰...」之否定性回應。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應屬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而由於受訪者對未來作法及期望無法歸屬於原 Bull 分析項目，故在此增列「未來作法與期待」。

第 15 組

主持人：讓我們討論另一項中國與全球間—事實上是與西藏間的爭議性議題，您認為西藏自治區的爭議及達賴喇嘛的議題，是否受到或應該受到美方更多或更少的關注？

馬總統：我們也支持西藏自治。我們贊成達賴喇嘛與中國大陸當局進行對話，我

認為這是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方法。

(一) 問句分析

Q15 讓我們討論另一項中國與全球間—事實上是與西藏間的爭議性議題，您認為
西藏自治區的爭議及達賴喇嘛的議題，是否受到或應該受到美方更多或更少的
關注？

-- 本項問句重點在於主持人詢問西藏自治區爭議及達賴喇嘛議題美方是否應予
關注的看法，依 Quirk, et al.之問句類型分析屬性應屬「是否問句」。

(二) 答句分析

A15 我們也支持西藏自治。我們贊成達賴喇嘛與中國大陸當局進行對話，我認為
這是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方法。

-- 本項問句重點在於主持人詢問受訪者「認為西藏自治區的爭議及達賴喇嘛的
議題，『是否』受到或應該受到『美方』更多或更少的關注？」，若回應「是」
或「否」皆屬直接回應。而就受訪者回應觀之，「我們也支持西藏自治」表
達的是對西藏自治區爭議及達賴喇嘛議題的立場與看法，而非對「美方是否
應給予更多或更少關注」的看法。

-- 提問內容關注點在於受訪者對美方立場的看法，而其則是以自己立場回應。
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觀之，本項回應內容為受訪者自行提出重點，應屬模
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但因無法歸屬原 Bull 分析項目，故將其歸類
於增列於「自身立場或看法」。

主持人：您是否擔心北京有關網路自由及其它公民社會議題的政策走向?例如，

您應該有看到最近谷歌與中國當局的爭議吧?!

馬總統：是的。我們對其中某些爭議確實表達了看法。因為我們距離中國大陸很

近，所以不僅在人權議題上，還包括其他的自由議題，我們也相當關注這類

議題。也在很多場合表達過對中國大陸人權議題的關切。

(一) 問句分析

Q16-1 您是否擔心北京有關網路自由及其它公民社會議題的政策走向?

- 本項問句重點在於主持人詢問受訪者「『是否』擔心『北京』有關『網路自由』及『其它公民社會議題』的『政策走向』?」，重點在於「是否」擔心，依 Quirk, et al. 問句類型應屬「是否問句」。

Q16-2 例如，您應該有看到最近谷歌與中國當局的爭議吧?

- 主持人延續前句提問，例舉「谷歌與中國當局的爭議」請受訪者表達看法，依 Quirk, et al. 問句類型應屬「開放性問句」。

(二) 答句分析

A16-1 是的。我們對其中某些爭議確實表達了看法。

- 本組首句提問為是否問句，受訪者以「是的」回應，符合是否問句之回應型態。但其後續回應「我們對其中某些爭議確實表達了看法」看似依提問回應，但並無具體內容，依 Bull 模糊語言類型應屬「不完整回應」之「有所回應但未完整回應」。

A16-2 因為我們距離中國大陸很近，所以不僅在人權議題上，還包括其他的自由

議題，我們也相當關注這類議題。也在很多場合表達過對中國大陸人權議題的關切。

- 提問內容關注重點與「北京」、「網路自由」及「其它公民社會議題」的「政策走向」等有關，而受訪者之回應內容均未涉及上述各提問重點。
- 受訪者回應內容提及之關注議題包括「我們距離中國大陸很近」、「人權議題」、「自由議題」等，均屬另外提出未曾出現於原提問之議題項目。依 Bull 模糊語言類型觀之應屬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

第 17 組

主持人：有關亞洲的權力核心，當然美國目前在此區域具有強大的外交、經濟及軍事力量。當您前瞻未來，您是否認為美國仍將維持其在亞洲的領導角色？中國是否將取而代之？

馬總統：我認為在此刻美國扮演著較重要的角色。但我認為，在軍事不平衡的情況下，未來的情況將有所改變。這就是為何我認為此區域的國家應該共同努力降低緊張，進而促進穩定與和平。

(一) 問句分析

Q17 有關亞洲的權力核心，當然美國目前在此區域具有強大的外交、經濟及軍事力量。當您前瞻未來，您是否認為美國仍將維持其在亞洲的領導角色？中國是否將取而代之？

- 本項問句針對亞洲的權力核心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美國仍將維持其在亞洲的領導角色？」以及「中國『是否』將取而代之？」，依 Quirk, et al.之問

句類型應屬「是否問句」。

- 本句為是否問句，而重點與「美國」、「亞洲的領導角色」及「中國是否取而代之」有關。

(二) 答句分析

A17-1 我認為在此刻美國扮演著較重要的角色。

- 提問內容關注重點與「美國」、「亞洲的領導角色」及「中國是否取而代之」有關，而受訪者回應「我認為在『此刻』『美國』扮演著較重要的角色」，此係針對美國此時此刻的角色，並未針對提問「未來」情況提出看法，雖有表達「未來情況將有所改變」，但仍未明確指出改變為何，因此回應並不完整。依 Bull 之模糊語言類型觀之，回應內容為受訪者自行提出重點，應屬模糊語言類型「不完整回應」之「有所回應但未完整回應」。

A17-2 但我認為，在軍事不平衡的情況下，未來的情況將有所改變。這就是為何我認為此區域的國家應該共同致力降低緊張，進而促進穩定與和平。

- 受訪者接續表達對未來情況之看法，認為「在軍事不平衡的情況下，未來的情況將有所改變」，同時附加回應「這就是為何我認為此區域的國家應該共同致力降低緊張，進而促進穩定與和平」。依 Bull 模糊語言類型，本項回應內容為受訪者自行提出，應屬模糊語言類型「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

二、研究分析總覽

以上研究主題訪問內容 17 組研究樣本總計問句共 25 項，答句共 48 項。答

句中有 7 項為「直接回應」，41 項則為「模糊回應」。基本而言，本研究係以一項答句歸類於一項直接回應或模糊回應之分類，唯第 1、8、14 組問答中有部分問句及答句涉及兩個選項，如依分析類型硬性分割問答句內則易造成語句中斷且語意不清。如在第 1 組「讓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很多台灣人憂心，您並不支持獨立—自您當選總統後，您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提問中，此在問句部分涉及受訪者「是否支持」或「是否宣布台灣獨立」兩項問題，而在受訪者的回應部分「中華民國台灣 99 年來一直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沒理由再度宣布獨立。」則是涉及了「沒理由再度宣布獨立」之「直接回應」（不會宣布台灣獨立）及未針對提問回應之「不予回應」，特此說明。

因研究分析內容繁多，為利觀察與判斷，茲就上述資料分析結果分就問句及答句隸屬情形以及消息來源採用次數表列呈現如后：

圖 4.1 本研究之問句及答句類型結果分析一覽表（來源：本研究）

問句及答句歸類情形一覽表

問答組別	提問類型	語境分析/ 提問重點	答句類型	簡要說明
第1組	Q1. 「是否問句」 及「問放性 問句」	◎ 是否支持或 是否宣布台 灣獨立。	A1「不予回應」及「直接回應」	* Q1 問句涉及兩項提 問類型。 * A1 答句涉及兩項模 糊類型。
第2組	Q2-1 「開放性問 句」 Q2-2 「是否問句」	◎ 同 Q1 是否 支持或是否 宣布台灣獨 立。	A2-1「攻擊提問內容」之「提 問內容係基於錯誤假設」 A2-2「製造政策重點」之「自 行提出政策分析」 A2-3「製造政策重點」之「自 我肯定」 A2-4「製造政策重點」之「自 我辯護」	◎ A2 針對第一組提問 「是否宣布台獨事」 進行「追問」。
第3組	Q3-1 「開放性問 句」 Q3-2 「開放性問 句」	消息來源民意 支持度。	A3-1「忽略回應」 A3-2「製造政策重點」之「未 來作法及期待」 A3-3「製造政策重點」之「自 行提出政策分析」	* 新增模糊語言項目「製 造政策重點」之「未來作法 及期待」。
第4組	Q4 「開放性問 句」	兩岸經濟協議 (ECFA)。	A4-1「不完整回應」之 「部份回應」 A4-2「製造政策重點」之「證 明政策的正當性」 A4-3「製造政策重點」之「自 我肯定」 A4-4「製造政策重點」之「提 出新的論點」	
第5組	Q5-1 「是否問句」 Q5-2 「開放性問 句」	對於中國國家 主席胡錦濤 談話之感 想。	A5-1「製造政策重點」之「提 出新的論點」 A5-2「製造政策重點」之「自 我肯定」	
第6組	Q6 「開放性問 句」	◎ 是否願意與 中國國家主 席會面。	A6-1「不完整回應」之「否定 性回應」 A6-2「製造政策重點」之「提 出新的論點」 A6-3「製造政策重點」之「提 出新的論點」	
第7組	Q7 「是否問句」	◎ 1. 是否出席 亞太經合會 (APEC)。 ◎ 2. 同 Q6 與中	A7-1「攻擊提問內容」之「所 提問題屬假設性問題」 A7-2「他者因素」	◎ 針對第六組提問「是 否同意與中國國家主 席會面」進行「追 問」。

		國國家主席會面。		* 新增模糊語言項目之「他者因素」。
第8組	Q8-1 「是否問句」 Q8-2 「是否問句」	◎ 同 Q7 是否出席亞太經合會 (APEC)。	A8-1「聲稱或暗示已回應」及「攻擊提問內容」之「所提問題屬假設性問題」 A8-2「他者因素」 A8-3「製造政策重點」之「表達自身立場或看法」	◎ 針對第七組提問「是否會接受參加 APEC 邀請」進行「追問」。 * A8-1 答句涉及兩項模糊語言類型。 * 新增模糊語言項目「他者因素」。 * 新增模糊語言項目「製造政策重點」之「表達自身立場或看法」。
第9組	Q9-1 「開放性問句」 Q9-2 「是否問句」	對於「一國兩制」的看法。	A9-1「直接回應」 A9-2「製造政策重點」之「未來作法與期望」 A9-3「直接回應」	* 新增模糊語言項目「製造政策重點」之「未來作法與期望」。
第10組	Q10 「是否問句」	中國軍事威脅。	A10-1「直接回應」 A10-2「製造政策重點」之「未來作法與期待」 A10-2「製造政策重點」之「自我肯定」 A10-3「製造政策重點」之「自我肯定」 A10-4「製造政策重點」之「未來作法與期待」	* 新增模糊語言項目「製造政策重點」之「未來作法與期望」。
第11組	Q11 「是否問句」	台美關係及美中關係。	A11-1「直接回應」 A11-2「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	
第12組	Q12 「開放性問句」	◎ 對美國為台灣冒風險之看法。	A12-1「直接回應」 A12-2「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 A12-3「製造政策重點」之「以外外部攻擊方式攻擊對手」	
第13組	Q13-1 「開放性問句」 Q13-2 「開放性問句」	◎ 同 Q12 對美國為台灣冒風險之看法。	A13-1「直接回應」 A13-2「製造政策重點」之「自我肯定」 A13-3「製造政策重點」之「未來作法與期待」	◎ 主持人針對第十二組提問「為台灣冒險是否值得？」進行追問。 * 新增模糊語言項目「製造政策重點」之「未來作法與期望」。
第14組	Q14 「開放性問句」	◎ 同 Q12 及 Q13 對美國為台灣冒風險之看法。	A14-1「聲稱或暗示已回應」及「提出政策重點」之「自我肯定」 A14-2「製造政策重點」之「未來作法與期待」。	◎ 主提人針對第十二、十三組提問「為台灣冒險是否值得？」繼續進行追問。 * A14-1 答句涉及兩項模糊類型。

				* 新增模糊語言項目「製造政策重點」之「 未來作法與期望 」。
第15組	Q15 「是否問句」	西藏自治區及達賴喇嘛議題。	A15「製造政策重點」之「 表達自身立場或看法 」	* 新增模糊語言項目「製造政策重點」之「 表達自身立場或看法 」。
第16組	Q16-1 「是否問句」 Q16-2 「開放性問句」	北京網路自由爭議及其它公民社會議題的政策走向。	A16-1「不完整回應」之「有所回應但未完整回應」 A16-2「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	
第17組	Q17 「是否問句」	亞洲權力核心角色。	A17-1「不完整回應」之「有所回應但未完整回應」 A17-2「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	

註：加黑粗體字為模糊語言新增項目。加◎者為「追問」項目。



另就上述分析事項有關各類型回應之分布情形整理如下：

表 4.2 直接回應及模糊回應分布情形一覽表（來源：本研究）

回應類型	類型項目	細項	相對應答句編號	小計	各類合計
直接回應	直接回應		A1 、 A9-1 、 A9-3 、 A10-1 、 A11-1 、 A12-1 、 A13-1	7 (14.58%)	7 (14.58%)
模糊回應	1. 忽略回應		A3-1	1 (2.08%)	1 (2.08%)
	2. 不予回應		A1	1 (2.08%)	1 (2.08%)
	3. 對提問提出問題		無	0	0
	4. 「攻擊提問內容」	(1)「並未掌握問題核心」	無	0	3 (6.25%)
		(2)「所提問題屬假設性問題」	A7-1、A8-1	2 (4.17%)	
		(3)「提問內容係基於錯誤假設」	A2-1	1 (2.08%)	
		(4)「提問不精確」	無	0	
		(5)「引用錯誤」	無	0	
		(6)「斷章取義」	無	0	
		(7)「令人不快的提問」	無	0	
		(8)「選項錯誤」	無	0	
5. 攻擊提問者		無	0	0	
6. 拒絕回應提問	(1)沒有能力回答	無	0	0	
	(2)無意願回答	無	0		

	(3)因某人因素不能回應	無	0	
	(4)延遲回應	無	0	
	(5)毫無所悉	無	0	
7. 製造政策重點	(1)以外部攻擊方式攻擊對手或競爭者	A12-3	1 (2.08%)	28 (58.33%)
	(2)提出新的論點	A4-4、A5-1、 A6-2、A6-3、 A11-2、A12-2、 A16-2、A17-2	8 (16.67%)	
	(3)證明政策的正當性	A4-2	1 (2.08%)	
	(4)承諾保證	無	0	
	(5)提出呼籲如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	無	0	
	(6)自行提出政策分析	A2-2、A3-3	2 (4.17%)	
	(7)自我辯護	A2-4	1 (2.08%)	
	(8)自我肯定	A2-3、A4-3、 A5-2、A10-2、 A10-3、A13-2、 A14-1	7 (14.58%)	
	(9)未來作法及期待(新增項目)	A3-2、A9-2、 A10-2、A10-4、 A13-3、A14-2、	6 (12.5%)	
	(10)表達自己立場或看法(新增項目)	A8-3、A15	2 (4.17%)	
8. 重複提問回應內容		無	0	0
9. 不完整的回應	(1)有所回應但未完整回應	A16-1、A17-1	2 (4.17%)	4 (8.33%)
	(2)否定性回應	A6-1	1 (2.08%)	

	(3)部份回應	A4-1	1 (2.08%)	
	(4)半部回應	無	0	
	(5)零碎回應	無	0	
	10. 聲稱 或暗示已 回應	A8-1、A14-1	2 (4.17%)	2 (4.17%)
	11. 致歉	無	0	0
	12. 拘泥 於字面意 義	無	0	0
	13.他者因 素(新增項 目)	A7-2、A8-2	2 (4.17%)	2 (4.17%)
合計			48 (100%)	48 (100%)

註：表格內**粗體字**者為新增項目。

第二節 語境及成因分析

一、語境分析

依本研究第二章文獻所述，消息來源面對記者訪問時之情境異於一般對話問答。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對象為官方消息來源，對於語言特定使用場合之語境設定為官方消息來源接受公開性媒體專訪活動，其議題則依提問者所設主題為範疇。

再依文獻所述，Duranti & Goodwin (1992)提出之「語言情境」概念認為任何事件之說明與轉述皆須注意其所面臨之情境。就本研究而言，語境不僅涉及如何與媒體互動，其提問主題與受訪者回應內容均屬研究重點。

進一步而言，Hamilton & Mineo (1998)將模糊語言定義為「具有目的性的不精確性語言」，認為 Bavelas et al. (1996) 指出的模糊語言研究是在特定語境下所做的電視訪問研究，並藉由面子管理為基礎而將模糊語言理論加以概念化；由此或可看出模糊語言的使用與特定語境實具關連性。

本研究將模糊語言界定為傳播與溝通中無可避免採取的語言類型與模式，由媒體（記者）提出問題形成語境，而官方消息來源（受訪者）在特定語境進行回應。

因此，在本研究樣本中，語境為公開性之電視專訪以及國際媒體設定之美、中、台關係為主要範疇。以下本研究將再就該語境與受訪模糊回應內容進行資料分析。

本項研究案例屬公開性專訪活動，主持人與受訪者間依序提問與回應。美國 CNN 為國際媒體，訪問內容鎖定與中國大陸及兩岸為主，尤其關心中國大陸與台

灣關係的發展以及美國是否值得為台灣冒大風險等具衝突性之議題。茲將各提問

重點主要涉及臚列於后：

1. 是否支持或是否宣布台灣獨立（第 1、2 組）；
2. 消息來源的民意支持度（第 3 題）；
3. 兩岸經濟協議（ECFA）（第 4 組）；
4. 對於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談話之感想（第 5 組）；
5. 是否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第 6、7 組）；
6. 是否出席亞太經合會（APEC）（第 7、8 組）；
7. 對於「一國兩制」的看法（第 9 組）；
8. 中國軍事威脅（第 10 組）；
9. 台美關係及美中關係（第 11 組）；
10. 美國是否值得為台灣冒風險（第 12、13、14 組）；
11. 西藏自治區及達賴喇嘛議題（第 15 組）；
12. 北京網路自由爭議及其它公民社會議題的政策走向（第 16 組）；
13. 亞洲權力核心角色（第 17 組）。

各語境導引出之受訪者回應內容相同，茲依提問屬性將語境分為受訪者切身相關、非切身相關、特定對象與活動、既定政策、非既定政策及美中台關係六大類。所謂與受訪者切身相關者，指的是主持人提問事項與受訪者自身立場或是具直接相關者；非切身相關者指提問事項非直接相關，而是請受訪者就他者情況提出看法；特定對象與活動指主持人提問有關是否與特定人士見面互動或是出席特定場合；既定政策指受訪者代表之政府正式立法公布實施之措施；非既定政策則指他人公布之措施但並未經政府認可或是表達支持之立場；美中台關係指與美

國、中國、大陸三者任兩者交互相關之議題，包含台美、兩岸及美中關係等。茲就其相關回應內容試析如下：

語境一：受訪者切身相關議題

1. 第 1、2 組有關「台獨」議題的明確回應與否將影響外界不同支持者反應，不論支持台獨與否均易造成反彈。受訪者為了避免被反彈的風險因而選擇模糊回應。由本研究樣本答句類型觀之，受訪者於涉及台獨議題時採取之模糊回應類型有「不予回應」、「攻擊提問內容」、「自我辯護」、「不完整回應」之「部份回應」，以及「製造政策重點」之「自行提出政策分析」與「自我肯定」等。
2. 第 3 組有關「消息來源民意支持度」議題，由於主持人表述時亦以「民意支持度『低迷』」為導引，且所舉出之民意支持度數據偏低，如「您的支持度仍未達 40%」、「根據民調，您的支持度約為 38%，約 4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滿意」等 (Q3-2)，此類回應易使受訪者有面子受損顧慮，因而常以模糊語言回應。
3. 另由於專訪為公開性質，情境異於一般對話問題，以受訪者角度而言易對「支持低」進行估算並判斷是否回應訪問者所引用的數據，唯以民意支持度議題營造的語境並未獲得受訪者的正面回應，由於失顏面效應透過媒體放大更易造成不被支持的觀感。因此在第 3 組提問中，受訪者於涉及民意支持度偏低之提問時均採取「忽略回應」、「製造政策重點」之「未來作法及期待」與「自我提出政策分析」等模糊回應類型。

語境二：非受訪者切身相關議題

1. 第 15 組「西藏自治區及達賴喇嘛議題」、第 16 組「北京網路自由爭議」及第 17 組「亞洲權力核心角色」等，主持人所提問內容均與受訪者本身無直接關

連而是請其表達看法。在此情況下，雖與自身並無直接密切關連，亦無面子威脅之顧慮，但受訪者仍未直接回應，而是藉由此機會表達自身的看法，顯示受訪者傾向掌握機會表達自身觀點。

2. 由第 15、16、17 組共計 5 項受訪者回應可看出其中有三項係與「製造政策重點」點有關，其細項為「表達自身立場或看法」及「提出新的論點」，另二項則為「不完整回應」之「有所回應但未完整回應」。

語境三：特定對象與活動

1. 對於第 5、6、7 組與特定人士有關之提問，如「對於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談話之感想」及「是否願意與中國大陸主席會面」等問題，由於受訪者與該特定人士互動備受關注，為顧及支持者贊成與反對情況以及公開場合風度禮貌的顧慮下，受訪者會衡量回應的安全性空間，在此所形成的語境使消息來源極易選擇模糊回應。本研究中對於有關與特定人士會面或的議題，受訪者的模糊回應策略有「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自我肯定」以及「不完整回應」之「否定性回應」。
2. 對於第 7、8 組是有關特定活動議題如主持人問及出否出席「亞太經合會 (APEC)」議題，受訪者均被要求回應是否出席重要公開活動，可由受訪者可能面臨的情況切入：一為受訪者尚未接到活動邀請；二為受訪者依過去經驗從未受到邀請；三考量倘若未來一旦接獲邀請將考慮出席，因而有意保留接受邀請之彈性空間。上述語境降低了受訪者直接回應的機會轉而採取模糊回應，如在本研究第 7、8 組中，受訪者即運用了「攻擊提問內容」之「所提問題屬假設性問題」以及「他者因素」等模糊回應。而在面對同一提問再次追問時，受訪者紛以「聲稱或暗示已回應」、「攻擊提問內容」之「所提問題屬

假設性問題」、「以外部攻擊方式攻擊對手或競爭者」及「他者因素」逃避回應。

語境四：既定政策

1. 第 4 組有關「兩岸經濟協議 (ECFA)」議題是主持人針對受訪者主張的大陸政策之可能效應提出「ECFA 將使台灣過度依賴中國」疑問，受訪者則就內容說明，之回應雖有涉及對應卻不完整。由於兩岸經濟協議議題屬政府政策且已公開並實施，具不可逆性，因此受訪者在無法否定該政策的情況下面對主持人質疑。只能將重點置於「解釋」及「說明」政策之內容而無法針對是否過度依賴中國一事回應。由此可知，消息來源於涉及政策性議題，尤其是已公布實施之政策議題語境下易採取「不完整回應」之「部份回應」、「製造政策重點」之「證明政策的正當性」、「自我肯定」及「提出新的論點」等模糊回應類型。

語境五：非既定政策

1. 對於第 9 組「一國兩制」及第 10 組「中國軍事威脅」等議題皆非屬政府既定政策，但因勢態已然形成且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受訪者必須明確表達立場，因此受訪者於回應時均予以「直接回應」表示一國兩制不能適用於台灣；
2. 此外，當語境涉及與國家安全議題有關時顯具高度敏感性，受訪者不可避免地採取模糊回應。如本研究中，受訪者即以「製造政策重點」之「未來作法與期待」及「自我肯定」。

語境六：美中台關係

1. 對於特定議題，如主持人提及有關第 11 組「台美關係及美中關係」及第 12、13、14 組「美國是否值得為台灣冒風險」等議題，受訪者必須同時考量美國及中國大陸反應，因此亦無可避免地使用模糊語言。

2. 對於涉及他方的提問，受訪者多半採取新的論點或對自身提出的政策以肯定方式回應，如「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以外部攻擊方式攻擊對手」、「自我肯定」及「未來作法與期待」等皆是。

依上述分析內容，本研究樣本提問之 13 項議題重點均與中國大陸及兩岸有關，此係由於國際媒體角度及立場特別關切美中台三者互動及影響性，尤其涉及美國的部份，如美台關係、美中關係以及美國是否值得為台灣冒大風險等議題。因此，受訪者面臨此語境時必須考量其支持者觀感，以及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可能反應等，而此皆可能促使受訪者選擇模糊回應。

此外，針對模糊回應之效應，在本研究樣本中主持人針對某些議題多次採取「追問」形式如「是否支持或是否宣布台灣獨立」、「是否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是否出席亞太經合會」及「美國為台灣甘冒走向戰爭的風險值得嗎」等，尤以「美國為台灣甘冒走向戰爭的風險值得嗎」共追問兩次（即提問三次），更加突顯了主持人對於受訪者模糊回應之反應及處理方式。

另由受訪者回應則可看出，訪問者與消息來源在與中國大陸、兩岸、台美關係等語言互動情境時明顯運用模糊語言，總計 48 項答句中僅有 7 項答句為直接回應，其餘 41 項均為模糊回應。而在十七組提問中訪問者共曾進行四次追問，範疇涉及八組，超過一半比例，足見模糊回應似有促發主持人追問提問產生之效應。茲就本研究提問涉及追問，以及受訪者回應方式臚如下：

表 4.3 本研究提問內容涉及追問情形一覽表圖（來源：本研究）

涉及追問組別	語境／提問重點	追問情形簡要說明	受訪者答句類型
--------	---------	----------	---------

第1組	是否支持或是否宣布台灣獨立。		A1「不予回應」及「直接回應」
第2組	是否支持或是否宣布台灣獨立。(同 Q1 提問)	本組提問係針對第 1 組提問「是否宣布台獨事」進行「追問」。	A2-1「攻擊提問內容」之「提問內容係基於錯誤假設」 A2-2「製造政策重點」之「自行提出政策分析」 A2-3「製造政策重點」之「自我肯定」 A2-4「製造政策重點」之「自我辯護」
第6組	是否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		A6-1「不完整回應」之「否定性回應」 A6-2「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 A6-3「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
第7組	1. 是否出席亞太經合會 (APEC)。 2. 同 Q6 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	針對第六組提問「是否同意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進行「追問」。 *新增模糊語言項目之「他者因素」。	A7-1「攻擊提問內容」之「所提問題屬假設性問題」 A7-2「他者因素」
第8組	同 Q7 是否出席亞太經合會 (APEC)。	針對第 7 組提問「是否會接受參加 APEC 邀請」進行「追問」。	A8-1「聲稱或暗示已回應」及「攻擊提問內容」之「所提問題屬假設性問題」 A8-2「他者因素」 A8-3「製造政策重點」之「表達自身立場或看法」
第12組	對美國為台灣冒風險之看法。		A12-1「直接回應」 A12-2「製造政策重點」之「提出新的論點」 A12-3「製造政策重點」之「以外圍攻擊方式攻擊對手」
第13組	同 Q12 對美國為台灣冒風險之看法。	◎主持人針對第十二組提問「為台灣冒險是否值得？」進行追問。	A13-1「直接回應」 A13-2「製造政策重點」之「自我肯定」 A13-3「製造政策重點」之「未來作法與期待」
第14組	同 Q12 及 Q13 對美國為台灣冒風險之看法。	◎主提人針對第十二、十三組提問「為台灣冒險是否值得？」繼續進行追問。	A14-1「聲稱或暗示已回應」及「製造政策重點」之「自我肯定」 A14-2「製造政策重點」之「未來作法與期待」。

註：一般字體為原提問，粗體字則為追問題。

二、成因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本研究樣本語境主要以美、中、台三方議題有關，而官方消息來源（如總統）面對記者問及國家主權相關議題時必受國家政策框架限制無法隨意發言，故易產生模糊回應情形。

如依前述語境分析，訪問者之提問範疇涉及台獨（第 1、2 組）、消息來源民調（第 3 組）、兩岸經濟協議（ECFA）（第 4 組）、與中國大陸主席會面（第 5、6、7 組）、出席亞太經合會（APEC）（第 7、8 組）、一國兩制（第 9 組）、中國軍事威脅（第 10 組）、台美關係及美中關係（第 11 組）、美國是否值得為台灣冒風險（第 12、13、14 組）、西藏自治區及達賴喇嘛議題（第 15 組）、北京網路自由爭議及其它公民社會議題的政策走向（第 16 組）及亞洲權力核心角色（第 17 組）等議題，均與兩岸問題及美國有關。而因台灣與中國大陸關係複雜，牽涉議題極為敏感，因此常會導致「雙避衝突」情境。

前節文獻曾經指出，模糊語言之成因有可能涉及受訪者雙避衝突、面子威脅以個人及組織框架等，茲就各項模糊語言成因試析如下：

（一）雙避衝突

依前章節文獻所述，模糊造成的衝突型式常與個人所處情境有關（Bavelas, et al., 1990），即當個人面對可能產生衝突時之語言表達內容選擇當受影響，基本上可分為「雙趨衝突」、「雙避衝突」及「趨避衝突」等三種情形。

而消息來源最常面臨的情形當屬「雙避衝突」，指面對兩種都不想要而又必須作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抉擇。依本研究樣本，通常政府消息來源（如總統）可能面臨的衝突有「情緒對立」、「形勢對立」、「議題性衝突」等。茲就本研究涉及雙避衝突情形之項目分析如后：

1. 情緒對立衝突，本研究中涉及情緒對立衝突者如下：

- (1) 第 1、2 組有關台獨相關提問，對於受訪者而言，支持者與反對者反應具有衝突性的效果。如就國內而言，面對台獨議題各有支持及反對立場的民眾，消息來源不論贊成或反對都可能面臨遭反彈，若表達贊成即易受到反台獨者的批評；若表達反應立場又會受到台獨者支持的抨擊。為了避免兩方反彈可能造成的衝突，受訪者因而採取模糊語言因應，此處之雙避衝突選項為「支持台獨」及「不支持台獨」。
- (2) 第 3 組有關消息來源民意支持度議題，對受訪者而言，在公開場合「承認」民意支持度低非其樂見，因此多半不願面對，屬於衝突情境。但完全「否認」其民調亦可能會造成主持人再度追問或是對立局面，亦是另種衝突情境。在此，「承認」及「否認」民調結果即是受訪者面對的雙避衝突情境。
- (3) 第 4 組有關「兩岸經濟協議」相關提問，提問者要求受訪者回應該項政策「是否將使台灣過度依賴中國」。對受訪者而言，「承認」政府提出的政策會使台灣過度依賴中國無疑是「自打嘴巴」，此為衝突情境；而「否認」其會使台灣過度依賴中國則必須另有相當證明支持，此為另項衝突情境。因而在此提問中，受訪者為逃避上述「承認—自打嘴巴」及「否認—提不出具體證明或說法」等雙避衝突情境時即易採取模糊語言因應。

2. 形勢對立衝突，本研究樣本涉及之形勢對立衝突如下：

- (1) 對於第 5 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談話之感想」、第 6、7 組「是否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等提問，受訪者不論對談話內容表達認同或反對或對會面及出席活動表達肯定或否定皆有顧慮。如若認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談話即可能招致親中或向大陸靠攏之批評，若不認同則可能備受中國大陸壓力；又或表達是否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亦有可能引發對方（指中國國家主席）連鎖反應而致兩岸形勢對立甚至衝突以及國內贊成者或反對者之形勢對立衝突等，權衡之下模糊語言成為最佳選項。
- (2) 第 7、8 組「是否出席亞太經合會 (APEC)」議題，受訪者若回應「有意願出席」則有可能面臨未獲邀請窘境，而若回應「無意願出席」則有可能造成主辦單位不邀請理由；衡酌客觀形勢，消息來源終究還是以模糊語言回應。此節雙避衝突的選項為一、「贊成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談話」及「反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談話」；二、「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及「不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以及三、「出席亞太經合會」及「不出席亞太經合會」等三項。
- (3) 第 9 組「一國兩制」議題並非國內政策，受訪者並無第 4 組（兩岸經濟協議議題）既定政策之不可逆性，故受訪者對於是否適用於國內雖可具體表達，但針對「一國兩制」本身則無法提供明確回應。本項議題可能造成之雙避衝突為：若對該議題表達正面肯定將有被反對者抗議衝突之風險，而表達負面否定看法則將具有引發對岸情勢衝突之風險，因此受訪仍然選擇以模糊回應方式回應提問。
- (4) 第 10 組「中國軍事威脅」議題，提問重點為「您（指受訪者）是否認為

中國『將』成為一個『逐漸擴大的軍事威脅』？」此處的「將」意指未來性，而「逐漸擴大」則有增加趨向。受訪者面臨的雙避衝突情境一是否認未來中國軍事威脅逐漸擴大情勢將與現實情況不符並有可能造成軍事衝突；二為承認中國軍事威脅在未來將逐漸擴大則顯示出自身的擔憂，可能造成信心危機之衝突情況。基此，受訪者為避免可能的軍事衝突發生或是國內民眾焦慮感倍增壓力之雙避衝突，寧可選擇模糊語言。

(5) 第 11 組「台美關係及美中關係」及第 12、13、14 組「美國是否值得為台灣冒風險」等議題，由於美中台三者關係較為敏感，受訪者面臨的衝突情境來自美方、中國大陸及國內反應等三方面，因此採取模糊語言機率相對提高，受訪者藉由模糊語言以期避免得罪美國及中國大陸所可能導致的軍事衝突及國家安全威脅。

(6) 第 17 組「亞洲權力核心角色」議題，此議題涉及美方力量的介入，因此屬美中台關係議題。與前項衝突情境相仿，受訪者回應時須顧及美方、中國大陸及國內反應等，因此採取模糊語言回應提問。

3. 議題性衝突，本研究樣本涉及與受訪者自身無關之議題性衝突者如下：

(1) 第 15 組「西藏自治區及達賴喇嘛議題」，由於西藏問題與台灣情形常被相提並論，表達對西藏自治區的看法極易引發兩岸問題爭議。雖然主持人提問係以美方是否應對該議題有更多的關注，但對受訪者而言，明確表達美方應該給予更多關注或是更少關注都將引起爭論，因此選擇模糊語言「支持西藏自治...贊成達賴喇嘛與中國大陸當局進行對話...」因應，以期避開爭議。

(2) 第 16 組「北京網路自由爭議及其它公民社會議題的政策走向」，受訪者面臨的可能雙避衝突情境為中國大陸之反應及谷歌的反應等，因此在回應上避

開直接回應而採取模糊語言。

綜而言之，基於雙避衝突，受訪者必須顧慮兩種可能發生卻欲避免之衝突選項。而因任何明確回應均將導致一方負面反應（如支持台獨者或是不支持台獨者之批評與反對），為了避免反彈風險因而選擇模糊回應。

（二）面子威脅

如上節文獻整理所示，Bull（1998）認為政治人物為顧及形象常在電視新聞訪問中對一些敏感且易造成負面形象的問題採不正面回答的迴避語言。由於螢光幕前直接拒絕回答易對其形象造成不稱職的負面效果，模糊語言因而儼然成為政治人物面對新聞訪問的最佳手段。

亦即為顧及面子，當消息來源面對媒體提問時常選擇模糊語言以避免傷害自己、他人或政黨。茲就本研究案例中涉及面子威脅因素之項目分析如后：

1. 自身面子威脅：受訪者在接受專訪當下面臨常與自己切身相關事項受到挑戰時易感面子威脅，相關情形如下：

（1）第3組有關「民意支持度」議題，主持人所提問內容為受訪者民調支持度低之情況，民意支持度與受訪者聲望有關。本組主持人提問內容為民意支持度「低迷」，由於民意支持度低對受訪者而言可能損及顏面，回應時極易出現迴避情形。本研究案例中受訪者即以「忽略回應」、「製造政策重點」之「未來作法及期待」、「自我提出政策分析」等模糊回應方式。

（2）第5、6、7組有關「對於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談話之感想」以及「是否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等二項提問，不僅是受訪者單方面意願的問題，

亦牽涉對象（即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之態度。若受訪者表示有意願，但對方無意願，則有面子威脅方面之顧慮，因而採取模糊語言方式回應。

- (3) 第 7、8 組有關「是否出席亞太經合會」情況亦與上項雷同，受訪者若表達出席意願，但如未能獲主辦單位邀請則有有失顏面之虞。此種屬於客觀情勢之議題，由於受訪者無法掌握客觀情勢，若直接回應顯具高度風險。如本組「是否出席亞太經合會」提問，受訪者在無把握能否受邀情況下，多半不願作出具體回應。而為了閃避，其採取了「攻擊提問內容」之「所提問題屬假設性問題」、「他者因素」、「聲稱或暗示已回應」、「製造政策重點」之「表達自身立場或看法外」及等多項模糊語言策略。
- (4) 第 15 組有關「西藏自治區及達賴喇嘛議題」，提問雖非直接與受訪者本身有關，但因議題與台灣政治現況常被用來相互比較，因此其回應內容常會被推述為其對台灣之看法進行引發爭議，受訪者回應時若有矮化或是比喻失當情形時易遭受挑戰而產生面子威脅問題。
- (5) 第 16 組有關「北京網路自由爭議」如上題所示，提問雖非直接與受訪者本身有關，但若受訪者回應時表現出對議題不甚瞭解或是解讀錯誤則極有可能受到挑戰，而有面子威脅的顧慮。

2. 他人面子威脅，指提問涉及他人面子威脅者，本研究相關涉及項如下：

- (1) 第 11、12、13、14 組有關美中台關係議題主要係以美方的立場及觀點，詢問受訪者對於「美國為台灣冒風險之看法」，由於相關議題關乎美方及中國大陸等「他人」，為顧及「他人」顏面，受訪者因此選擇模糊語言回應，改以「製造政策重點」回應。
- (2) 第 17 組有關「亞洲權力核心角色」議題，同樣涉及美國是否仍將維持在

亞洲的領導角度。受訪者回應時為顧及美方顏面，易採取模糊語言。

3. 政黨面子威脅，指當議題涉及政策性時，受訪者必須顧及政黨之決策及顏面等問題，亦即對於所屬政黨既定之政策或立場不宜採取否定之態度或是負面之評論等：

- (1) 第 1、2 組有關是否「支持或宣布台獨」議題涉及政黨立場，因此表達是否支持或宣布台獨時，一方面不能違背政黨立場看法，另一方面又須考慮對於台獨立場不同支持者之反應。例如本研究案例中第 1 組及第 2 組提問之台獨議題，由於贊成或反對台獨均有可能遭到另一方支持者之抨擊或反彈，極有可能損傷面子，受訪者對類似「是否」類型的問句多採模糊語言如「不予回應」、「不完整回應」或另「提出政策分析」等以避免直接回應可能引發的反對聲浪。
- (2) 另如第 4 組「兩岸經濟協議 (ECFA)」屬政府既定政策，受訪者身為國家最高領導人自然無法否認國家重大政策。但若對於政策內容無法清楚說明則將有失政黨（執政黨）顏面，因此受訪者採取模糊語言回應。
- (3) 第 9 組對於「一國兩制」的看法，一國兩制雖與前組（第 4 組）不同，非屬國家定政策，但仍涉及政黨及國家立場，受訪者被要求表達對於「中國與香港的模式，是否能適用於中國大陸與台灣」之看法。受訪者回應之內容必須與政黨立場一致，若無法即時回應易招致質疑有失顏面，在此情況下與便易採取模糊語言。
- (4) 第 10 組有關「中國軍事威脅」議題，由於軍事威脅涉及國家防禦能力及政府應變能力，受訪者在回應時，必須依政府政策及應變規劃事項回應，若無法具體回應將具有面子威脅，而模糊回應成為無法直接回應時之最佳

選項。

(三) 框架因素

依前章文獻所述，消息來源通常只在對自己有利情況下才會把訊息透露給新聞記者，對自己不利處則儘量隱瞞或採迴避方式 (Epstein, 1975)。此外，消息來源須依某種框架建構過程來組織內部看法，將訊息整理成可供新聞媒體接受的事件、說法或言說行為 (Gitlin, 1980)。因此，當政府消息來源面臨涉及組織內部敏感議題時，「模糊語言」成為官方消息來源的最優先選項。茲就本研究案例中涉及框架因素之項目分析如后：

1. 政黨立場：第 1 組提問「是否支持或是否宣布台灣獨立」及第 10 組「對於『一國兩制』的看法」，由於台獨議題及一國兩制關乎政黨及國家的立場，是否宣佈獨立及是否接受一國兩制的立場不能與所屬政黨立場相違背，因此任何回應內應勢必與政黨框架相符。此外，第 5 組「對於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談話之感想」、第 6 組「是否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及第 7 組「是否出席亞太經合會 (APEC)」活動等議題也與政黨立場有關，必須一致。
2. 政府政策：第 4 組提問「兩岸經濟協議 (ECFA)」議題是政府既定政策，消息來源不能反駁政策內容，故對該議題之回應必定與「對協議正面肯定」框架相符。
3. 客觀現實情勢：第 10 組「中國軍事威脅」、第 11、12、13 組「台美關係及美中關係」、第 14 組「美國是否值得為台灣冒風險」、第 15 組「西藏自治區及達賴喇嘛議題」、第 16 組「北京網路自由爭議及其它公民社會議題的政策走向」

及第 17 組「亞洲權力核心角色」等均與客觀情勢有關，亦屬舊有或既有現象的延續，回應時除須考量政府立場外亦須顧及現況條件及限制等框架，如面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以及台美關係及美中關係間權力平衡關係等都屬之。

綜上所述及文獻內容，接受媒體採訪一向是官方消息來源採取的媒體策略，其回應內容效用相似於資訊津貼作用，不僅可為組織或部門爭取新聞曝光機會，亦可滿足媒體需求有利雙方互動，但官方消息來源如何回應則須考量不同的形式要件與內容。臧國仁（1999: 47）曾針對新聞框架指出「框架概念中最重要的部份，就在瞭解新聞媒體為何選某個特殊內容，且選擇的比重為何」，而對消息來源而言，回應媒體時最重要之處就瞭解自身及所屬組織的需要，由此選擇可以因應提問的特殊內容及直接或模糊回應的比重。

第三節 綜合分析

一、資料分析

經本研究分析顯示，國內政府消息來源使用之模糊語言項目與過去研究所得之模糊語言類型有些差如下：

(一) 較少採取之模糊語言類型：本研究中有若干模糊語言類型是受訪者並未採取者，如「對提問提出問題」、「攻擊提問者」、「拒絕回應提問」、「重複提問回應內容」、「致歉」及「拘泥字意義」等，其因留待下章討論。

(二) 新增模糊語言類型：基於分析需要，本研究依消息來源回應內容新增若干模糊語言類型，新增項目及其理由說明如下：

1. 「製造政策重點」之「未來作法及期待」：消息來源之回應於本研究第 3-2、9-2、10-2、10-4、13-3 及 14-2 等六項均以「未來作法及期待」之模糊語言項目回應，其涉及內容包括民意支持度、對一國兩制看法、中國軍事威脅、對於美國為台灣冒風險之看法等，其中針對美國是否值得為台灣冒風險一事主持人曾經追問兩次。
2. 「製造政策重點」之「表達自身立場或看法」：消息來源於本研究第 8-3 及 15 項等二項係以「表達自身立場」模糊語言項目回應，原提問係針對「是否會接受邀請出席亞太經合會」以及「西藏自治區及達賴喇嘛議題，是否應受到或應受到美方更多或更少的關注」等議題請受訪者表達看法，但受訪者迴避了原提問而另闡述「自身立場或看法」。在「是否會接受邀請出席亞太經合會」方面，受訪者表達「不認為這個（一直無法派遣高層代表參加 APEC

會議)情形在短期內有任何改變的可能性」之自身立場；而在「西藏自治區及達賴喇嘛議題，是否應受到或應受到美方更多或更少的關注」議題，受訪者則是表達「贊成達賴喇嘛與中國大陸當局進行對話」並「認為這是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方法」，兩者皆屬不直接回應提問而另行表達自身立場或看法之回應。但因 Bull 之模糊語言項目「提出問題重點」內並無符合選項，因而另設此項。

3. 「他者因素」：消息來源針對本研究第 7-2 及 8-2 項回應時運用了 2 次「他者因素」之模糊語言策略，此兩項提問主題皆與「是否出席亞太經合會」有關（第 8 組提問係追問）。回應時，受訪者以「所提問題屬假設性問題」答覆，續以「未收到主辦單位對此議題的任何資訊」之「他者因素」回答。至於第 8 組則在主持人針對「是否出席亞太經合會」追問後受訪者再次以「這是一個高度假設性問題」回應，並續表達「過去一直無法派遣高層代表參加」之「他者因素」回應。

(三) 關連性：本研究案例之第 7 組及第 8 組答句均涉及「攻擊提問內容」之「所提問題屬假設性問題」，除引起追問外亦恰巧產生受訪者以「他者因素」回應之模糊語言類型。由資料分析來看，當消息來源運用「所提問題屬假設性問題」回應時，附帶回應「他者因素」似有相互關連，惟此屬初步發現尚待證實。

二、整體分析

依本研究分析，消息來源最多使用的模糊語言項目為「製造政策重點」，在

48 項回應佔了 28 項，又以「提出新的論點」細項最多（共 8 次），其次為「自我肯定」（7 次）、「未來作法與期待」（6 次）、「所提問題屬假設性問題」、「自行提出政策分析」、「表達自身立場或看法」、「有所回應但未完整回應」、「聲稱或暗示已回應」、「他者因素」等各 2 次；「忽略問題」、「不予回應」、「提問內容係基於錯誤假設」、「提問內容係基於錯誤假設」、「以外部攻擊方式攻擊對手或競爭者」、「證明政策的正當性」、「自我辯護」、「否定性回應」、「部份回應」則各為 1 次；因此或可判定「製造政策重點」為國內官方消息來源最常使用的模糊語言項目。

與 Bull (2003) 研究結果相較，國外政治人物最常運用的模糊語言類型前三項為「製造政策重點」(69.17%)、「攻擊提問內容」(32.93%)及「拒絕回應問題」(21.73%)，而國內政治人物的前三項則是「製造政策重點」(58.33%)、「不完整回應」(8.33%)及「攻擊提問內容」(6.25%)，顯示國內與國外政治人物模糊語言運用方式稍有不同。

三、本章小結

當消息來源身處特殊語境，面對「說」與「不說」實話的兩難情境時，為顧及組織框架、面子威脅及雙避衝突的發生，多半會調整說的內容。就如 Bavelas, et al. (1990) 所言，當消息來源遇到提問，任何切合主題的回應都可能具有潛在導致負面後果，但又被期待必須針對問題回應時，說話者因而常會選擇模糊回應或「離開該情境」。

在本研究中受訪者在衝突性議題之語境中即使面對主持人多次追問，亦仍努力運用模糊語言迴避提問企圖離開該「情境」。因此，當政府官方消息來源面臨

雙避衝突情境時，「模糊語言」確實成為官方消息來源的最優先選項。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摘述

長期以來，有關新聞訪問中的模糊語言實際運用並無具體化分析成果，本研究藉由現任總統馬英九接受國際媒體專訪之研究，以論述分析法逐一分析問句及答句，具體歸納出了模糊語言之運用方式。

一般多認為，在新聞訪問過程中「有問」就須「有答」，但實際上問答間不盡相符乃普遍現象。根據研究者長期觀察官方消息來源與媒體互動之實務經驗發現，媒體記者的確時常抱怨受訪消息來源「根本沒有回答問題」。

本研究在文獻回顧章節透過雙避衝突、面子威脅及組織框架等理論來探討官方消息來源如何使用模糊語言，再以論述分析逐一探問者問句與受訪者答句間之對應情形，並納入語境因素，試圖尋找出官方消息來源常見之模糊語言形式。

分析過程先以 Quirk, et al (1985) 之是非問句、選擇性問句及開放性問句等問句類型判別問者提問類型，再就受訪者回應內容是否與問句類型相呼應加以比對，最後再以 Bull (2003) 之模糊語言類型為主軸歸納出受訪者之回應類型，藉由上述三階段分析過程具體整理及歸納出了官方消息來源之模糊語言類型。

本研究結果有別一般「問答需相符」以及消息來源「接受媒體訪問就必定直接回應」之認知。如同本研究前言所述，語言與溝通是傳播主要工具，模糊性語言普遍存在，消息來源說話內容備受媒體關切，為掌控媒體報導對自己有利的訊息，消息來源的語言常會產生不精確情形。因此所有消息來源在面對媒體提問時，皆無可避免地必須使用模糊語言，誠屬自然現象，此無關乎對與錯之評斷。

由於模糊語言是「具有目的性的不精確性語言」(Hamilton & Mineo, 1998)，在媒體主動要求的資訊上報率遠較消息來源主動提供者為高的傳播策略下，模糊語言在其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而依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內官方消息來源與國外消息來源相類似，確實經常引用模糊語言作為回應媒體提問之方式，不論國內或是國外消息來源均偏愛採取「製造政策重點」之模糊語言方式回應，而國內官方消息來源尤其青睞採取「製造政策重點」中之「提出新的論點」、「自我肯定」及「未來作法及期待」等項目，主要是基因於模糊語言類型的運用具有「看似言之有物」、「轉移焦點」、「離開情境」、「不冷場」其「較不容易出錯」等優點，至於負面效應是媒體的「追問」，但並無礙於專訪之進行。



第二節 研究發現綜述

本研究研究問題有三，茲就本研究針對各項研究問題之具體結果說明如后：

研究問題一：國內官方消息來源面對訪問的回應是否也常使用模糊語言？

由研究樣本論述分析內容所得資料歸納發現，國內官方消息來源面對提問時確實經常使用模糊語言，總計 48 項答句中僅有 7 項(14.58%)答句為直接回應，以模糊語言回應之答句高達 41 項(85.42%)。而在 41 項模糊語言回應中，「製造政策重點」為最常被消息來源使用之模糊語言項目，總計高達 28 次(58.33%)，高出次常被使用的「不完整的回應」4 次(8.33%)許多。細觀「製造政策重點」中最常被受訪者採用之細項為「製造新的論點」8 次、「自我肯定」7 次、「未來作法及期待」6 次、「自行提出政策分析」及「表達自己立場或看法」各 2 次、「證明政策的正當性」及「自我辯護」則為各 1 次。足見官方消息來源使用模糊語言比例甚高。

就消息來源使用模糊語言之原因來看，除受到語境限制因素外，國內消息來源之模糊語言情形應與受訪自身情況有關。相較於國外研究對象多係大選候選人，而本研究之分析對象則係國家元首，角色不同，其發言立場及其所受限制亦有所差異。簡而言之，國家元首之身分使其須依國家既定政策目標回應問題，不宜表現出「不知悉」或是「拒絕回應」之態度。倘若是候選人（指非兼官方現職身分者）則較可不受既定政策限制，較有可能挑戰主持人提問或拒絕回應提問。

研究問題二：國內官方消息來源最常使用的模糊語言形式為何？

在本研究所提之 41 項模糊語言回應中，「製造政策重點」最常使用（總計高達 28 次），高出次常使用的「不完整的回應」（4 次）。

而若細觀「製造政策重點」最常採用之細項則為「提出新的論點」（8 次）、「自我肯定」（7 次）、「未來作法及期待」（6 次）、「自行提出政策分析」及「表達自己立場或看法」（各 2 次）、「證明政策的正當性」及「自我辯護」則各 1 次。

單就「製造政策重點」類型細項觀之，受訪對象最常採用的模糊語言類型當屬「提出新的論點」、「未來作法及期待」及「自我肯定」，且由前二者模糊語言可看出受訪者極欲轉移提問焦點之心態，而「自我肯定」則屬有意營造正面形象。

整體觀之，研究樣本十七組問答中最常使用之模糊語言方式為「製造政策重點」、「不完整的回應」及「攻擊提問內容」等三項。與相關文獻相較，國外政治人物傾向採取「製造政策重點」、「攻擊提問內容」及「拒絕回應提問」等三項模糊語言類型，顯示國內政治人物較為傾向「不完整的回應」，而國外政治人物則多採「拒絕回應提問」；換言之，國內政治人較不傾向以「拒絕回應提問」方式。

茲將學者 Bull（2003）綜合英國政治人物 John Major, Margaret Thatcher and Neil Kinnock 等人的訪談內容涉及模糊語言之平均數質與本研究所得相較，相關百分比統計如下：

模糊語言類型	本研究 (%)	Bull (2003) 研究均數 (%)
1. 忽略問題	2.08	4.3
2. 不予回應	2.08	6.5
3. 對提問提出問題	--	4.4
4. 攻擊提問	6.25	32.93
5. 攻擊提問者	--	4.33
6. 拒絕回應提問	--	21.73
7. 製造政策重點	58.33	69.17

(含「未來作法及期待」及「表達自己立場或看法」兩項新增項目)		
8.重複先前提問之回應內容	--	3.7
9.不完整的回應	8.33	8.8
10.聲稱或暗示已經回答過問題了	4.17	2.8
11.致歉	--	0.63
12.拘泥於字面意義	--	0.47
13.他者因素(新增)	4.17	--

圖 5.1：國內外新聞消息來源模糊語言類型之對照

來源：Bull (2003)及本研究

由上表可知國內外消息來源的研究分析均呈現出相同模糊回答類型，即「製造政策重點」特別受到青睞(69.17% vs. 58.33%)，足見此種避重就輕方式確是最常被消息來源的模糊言類型，國內外皆然。

此外，本研究發現國內官方消息來源較少採取某些模糊語言類型如「對提問提出問題」、「攻擊提問者」、「拒絕回應提問」、「重複提問回應內容」、「致歉」及「拘泥字意義」等，其原因應與前述訪問者及受訪者個案背景有關：由於本研究對象身份為國家元首，基於禮貌及形象等考量，面對國際媒體之專訪不便顯示拒絕回應之態度，或對提問者較少採取質疑態度。

研究問題三：國內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之成因為何？

本研究藉由相關文獻整理模糊語言形成原因為語境、面子威脅、雙避衝突及組織框架等，而經由本研究分析可知，模糊語言之形成與文獻所列成因有關。此

外，另有一些延伸性效果亦為消息來源採取模糊語言之成因（見下說明）。

一、塑造「不離題」效果

以語境而言，由於主持人提問議題均與「美中台關係」有關，三者間之關係複雜且具高度敏感性，受訪者回應時必須兼及三方立場以及國內民眾觀感，這是受訪者採取模糊語言方式之主因。如第3組問答中，主持人要求受訪者針對「民意支持度低迷」回應，而受訪者回以「我們的經濟正在復甦，但尚未恢復到美國經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前的狀態。因此我們會更努力。『國際貨幣基金』已預測，我國2010年的GDP成長率將達6.5%，因此我確信，我國的經濟好轉後，情況會有所改善，」明顯迴避「民意支持度低迷」提問重點。但因回應內容猶未超出美中台相關範疇（如美國經濟、金融海嘯及我國的GDP成長率等與美中台關係等辭彙），乍聽之下仍與語境相符（即便非與提問相關）。可見受訪者即使無法或不願正面回應議題，仍會將語境相關元素帶入，讓聽者感覺其回應並無離題，但事實上受訪者並未回應提問。

二、形象維護

以面子威脅及雙避衝突來看，本研究受訪者為國家元首，接受國際媒體專訪無非期待藉由專訪獲得媒體正面報導或得到社會大眾正面肯定，因此態度從容且言之有物，否則若是對提問表現毫無頭緒或一無所知即易導致個人形象受損。基於上述身分特殊及個人顏面維護等理由，受訪者即使處於不能回答、不願回答或不知如何回答也不能形色於外。尤以此處形之維護不僅牽涉個人顏面，更也包含

所屬政黨之形象與面子，甚至包含他者如中國大陸及美國等面子。因此，面對主持人提問雖非受訪者樂於回應，但因專訪屬公開性活動，受訪仍須維持形象而展現風度及自信。

在上述面子威脅及不願回應或無法回應之雙避衝突情形下，受訪者多會選擇以「看似」回答問題的模糊語方式回應。

三、塑造政、黨一致之印象

以組織框架來看，受訪者身份為元首（國家最高領導人），其發言須與政府及所屬政黨一致而不能違背施政原則或法規。又因專訪場域具公開性，即使受訪者強調為個人看法也會被預設為應與國家既定政策一致性，否則即易引起爭議。再者，除以符合期待之表達組織及政黨立場建立一致性之認知框架外，消息來源並透過對媒體的回應內容，運用模糊語言傳播效益，建立與潛在參與者（聽者）框架結盟之目的，激發其支持與認同。

四、轉移焦點策略

由研究樣本中受訪者最常運用之模糊語言類型「提出新的論點」可知，受訪者企圖不斷設立新的議題焦點轉移提問目標。如在 A12-2 受訪者答句中，面對主持人提出某美國前官員對台美關係認為「台灣很小。她能給我們帶來的真正戰略利益非常少。事實上，中國可以隨時取回台灣，不管美國數十年來的說法為何，確實不值得為台灣捲入戰爭」等看法時，受訪者並未針對該看法表示意見，反而

另行提出「我們只是尋求購買防禦性的武器。...」等未出現在本組提問之話題，可見受訪有意轉移提問焦點，另回應次多之「自我肯定」及「未來作法及期待」等細項亦屬企圖轉移話題焦點之展現。

五、避免後續追蹤提問效應

通常受訪者面對媒體提問常基於避免媒體後續追蹤報導之效應，選擇採取模糊語言因應，例如媒體報導「對於感情問題，林志玲（名模）不願再訂出時間表，深怕回應又被困擾一段間」，即顯示受訪者考量其回應內容會被媒體做為日後詢問之標的，而不願直接回應之情形。同理，本研究樣本，不斷以「製造政策重點」等模糊語言類型規避有關是否出席 APEC 或是是否與中共國家主席之具體提問，以避免後續遭追蹤提問之效應。

除上述研究結果外，本研究亦發現下列情形：

一、面對提問，消息來源並無回應之必要性。

經整理分析資料發現，專訪過程中受訪者不斷以模糊語言回應，而媒體記者在未能獲得直接回應情況下，專訪過程仍持續進行並未中斷，可見無論受訪者是否直接回應都不影響專訪進行。基於媒體在專訪前即已設定好提問內容且須在一定時間內將提問完成，即使受訪者不斷以模糊或語言回應仍不影響專訪之進行。

二、模糊語言促發追問效應卻不能促使受訪者直接回應。

在十七組提問中，記者曾因受訪者模糊回應而提出四次追問，總計 17 組的提問中，涉及追問者共有 8 組，提問事項包括針對「是否支持或是否宣布台灣獨立」、「是否願意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是否出席亞太經合會」及「美國為台灣甘冒走向戰爭的風險值得嗎」等「追問」，尤以「美國為台灣甘冒走向戰爭的風險值得嗎」共追問三次（即總計提問四次），更加突顯了記者對受訪者模糊回應之反應及處理方式。

但面對多次追問，受訪者仍然採取模糊回應（8 組答句僅有 2 項為直接回應），足見模糊回應具有促發追問之效應，但追問卻始終無法讓受訪者直接回應。對於媒體而言，由於受限於專訪時間及流程，延續相同議題之空間有限，似對受訪者的模糊回應未能妥善處理，即便是國際知名新聞媒體亦然。

三、時間限制性有利模糊語言運用之空間。

由於專訪內容均事先排定及規劃且對於訪問時間也有限制，消息來源只要「拖過」專訪時間就可避免面子威脅、雙避衝突等情境，就此而言，訪問過程之時間限制性似有利於模糊語言之運用。換言之，對消息來源來說，模糊語言是可以「離開情境」及「拖過時間」的重要受訪策略。

四、本研究新歸類之模糊語言類型

本研究之模糊語言類型分析係以 Bull（2003）所示類型為基礎，惟於實際分析時發現本研究所得部分消息來源回應並未含括在內，因而新增「他者因素」並

於「製造政策重點」新增「未來作法及期待」及「表達自身立場或看法」等小項。而此研究分析新增項目累計運用「他者因素」2次，「製造政策重點」之新增「未來作法及期待」6次及「表達自身立場或看法」2次，總計10次。

本研究所列模糊語言新增項目產生原因可能與個案身份及國情有關：本研究樣本身份為國家元首，強調「未來作法及期待」及「表達自身立場或看法」有其立場，唯具體情況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及查證。

除上述各項研究發現，更深層觀之，本研究所萃取之模糊語言可以不同角度應用於實務之中，相關說明如下：

一、媒體角度

瞭解消息來源模糊回應模式及特性，有利於媒體預測消息來源之可能性回應。長久以來，媒體深受消息來源始終問答不符之困擾，透過本研究結果，有利於媒體認知模糊語言存在之必然性，並融入問答過程作為提問設計規劃之參考，例如降低提問內容之衝突性使受訪者願意回應，或是發展減少模糊回應之訪問機制等。

二、消息來源角度

無論是官方或是非官方之消息來源本身都具有特殊需面對之情況，有時模糊語言的存在有其必要性，例如當涉及隱私或是公共利益如國家安全時，太過直接或精確之回應恐有引發負效應之虞。因此，善用模糊語言以為應對因不失為效降低負面效應發生之方式，本研究所整理之中外模糊語言類型，似可作為消息來源

保障安全及保護隱私之使用參考，惟應用時仍需注意過度運用將導致引發媒體追問、負面報導及問答不符負面觀感等效果。

三、閱聽者角度

新聞真實一直是大眾傳播領域所關切之議題，過去諸多來自媒體及消息來源端與新聞真實相關之理論，但除此之外，新聞真實亦有可能非表面所能見的，對於閱聽大眾而言，透過本研究結果可獲知模糊語言雖無可避免，但亦可思考消息來源模糊語言論述背後隱含之成因及目的，將有助於更深一層瞭解新聞真實之樣貌。



第三節 研究意涵

本研究之初即先設定以官方消息來源為研究對象。但因過去國內對相關文獻鮮少論及消息來源非直接性回應，亦未就模糊語言深入探討，故本研究初始多以國外學者研究發現為基礎。以下將分就本研究涉及之理論、研究方法及實際案例等三部分說明。

一、理論意涵

本研究討論官方消息來源如何回應媒體之提問，援引社會學之面子威脅、心理學之雙避衝突以及傳播領域之組織框架等理論及概念，依 Bull (2003) 模糊語言分類為基礎建構出國內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之類型。經研究分析後發現，國內官方消息來源回應問題時確實存在模糊回應。

傳播研究有關消息來源與媒體互動關係之研究過去多由媒體角度著手，探討記者如何提問或如何追問(翁維薇, 2000)，本研究發現模糊語言確實引發媒體「追問」效應，但重複追問無法促使消息來源直接回應。

至於語言互動相關文獻也多由媒體採訪角度出發，如施惠語言(蘇惠君, 20004)、威嚇語言(林金池, 2009)及新聞訪問之前提研究(葉方珣, 2007)等，大多由記者層面探討消息來源與媒體之互動關係，而鮮少論及消息來源與記者互動之語言特徵。

而除上述理論意涵外，依本研究結果看來，專訪進行前問答雙方都會做足準備，擬定「劇本」，亦即媒體事先設定提問主軸及擬好提問內容，而受訪者亦會就媒體關切及可能提問事項預先模擬回應內容，因此，雙方在「劇本」導引下，

無論受訪者如何迴避問題，提問者仍會一再鎖定某些特定議題追問，同理，無論提問者如何一再地追問，受訪者皆以該劇本內容作為模糊語言腳本，不斷陳述「固定」說法。再進一步分析則發現劇本內容多以「重設政策重點」呈現，實印證了文獻中模糊語言實為「具目的性的不精確性語言」，而非以隨機方式選擇回應內容。

舉例而言，本研究樣本中主持人在第 11 組提問中請受訪者回應有關台美關係可能引發之美中衝突，並在後續第 12 組至第 14 組針對同一議題重複三次追問，而受訪者則是不斷重複以「製造政策重點」之模糊語言因應，由此即可看出雙方對提問議題以及模糊回應之「堅持」，可視為「劇本」效應。

除此之外，專訪「時間」亦造就了模糊語言發展之有利條件，由於受訪消息來源的模糊語言並不影響專訪的進行，而訪問者在始終無法得到具體回應下仍然必需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專訪，雙方一來一往進退有據，受訪者只要能拖過專訪時間，即安全過關；正如上述，專訪的時間性限制提供了模糊語言運用的有利空間。

二、研究方法意涵

本研究重點在於官方消息來源之模糊語言類型及成因，而最直接的研究方式理當是由消息來源自己說明，但實際操作有其困難度。一般而言，消息來源多不願承認其在訪問時曾經多方運用模糊語言以迴避提問。在此情形下，較為接近精確的研究方式便是依消息來源的回應內容加以整理及歸類。

基於上述理由，媒體新聞報導似是可以考慮作為文本分析的主體。但觀察每

日媒體報導內容多僅呈現消息來源之回應，亦即媒體為精簡報導篇幅及強調重點，在報導呈現上多僅截取消息來源所言具有新聞性或衝突性之部分。在缺乏提問細節的情形下，若單由新聞報導內容則無法判斷或分析其發言內容是否／如何屬於模糊語言。

基於上述理由，本研究最後選擇可完整觀察提問及回應之專訪活動，並以論述分析法就訪問者問句以及受訪者答句逐句分析，藉由比對問答形式是否相符進而判斷受訪者如何採取模糊回應，如同放大鏡般地檢視各語句含意。其缺點在於僅能針對語言文本進行分析，受訪者之態度、音調、表情、肢體語言等則以無法做綜合性分析。

為補足研究對象之身份及單一語境因素可能影響模糊語言類型周延性之缺失，建議未來相關研究似可納入不同黨派或領域消息來源。例如以官方舉辦之就職週年記者會或候選人政見辯論會等，藉由議題多元化彌補單一語境造成模糊語言類型偏頗之情形。

三、實務意涵

本研究強調，模糊語言是人類語言互動過程中「正常且必然」的現象，因此官方消息來源回應時必定包含模糊語言。無論提問者及受訪者角色身分為何，只要是語言互動溝通行為，模糊語言的存在難以避免。

本研究所得分析結果可作為勾勒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之圖像，了解政治人物回應媒體提問之本質，基於前述英國學者 Schlesinger(1990)所提出「外部途徑模式」之方向，由消息來源面向討論新聞建構之內涵，促使聽者感知提問與回

應間是否相呼應。依研究結果，消息來源採用高比例的模糊語言作為回應提問之技巧。

此外本研究分析雖以國外學者 Bull (2003) 模糊語言類型為基礎，但在研究過程中藉由受訪者對模糊回應之表現發現了新的模糊語言項目如「他者因素」、「製造政策重點」之「未來作法及期待」、「表達自身立場或看法」等，除可豐富模糊語言類型分析內容外，並可用作重塑模糊語言之型態。



第四節 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限制：

(一) 語言隔閡

由本研究分析結果可知消息來源在新聞訪問過程中使用模糊語言的比例甚高，48 項提問回應中僅直接回應 7 項，此點或與研究樣本為國外媒體專訪有關。基本上，提問者與消息來源之語言互動係以提問者母語為主，雖然受訪者具有相當英語使用能力，但因訪談時主要語言並非母語，加上專訪情境容易造成壓力，有可能在回應時產生偏誤，進而造成模糊語言不斷運用之情況。

(二) 單一語境限制

本研究所稱「語境」，指在專訪場合中，媒體提問所形成之語境，在此範圍內所涉及的議題範圍，由於語境由媒體設定，當媒體提問涉及之議題皆屬單一範圍者，即造成官方消息來源在特定語境中進行回應，此即為「單一語境」。在本研究中，語境不脫美中台關係之範疇，在單一語境中形成官方消息來源模糊語言回應內容偏向問題。

由前述研究結果得知，消息來源以模糊語言回應比例高達 85.42%，相較 Bull, et al.(1996)的研究發現（對於具衝突性的提問中，模糊回應比例為 64%；而非衝突性提問中有 40%未被回應）。由於依本研究語境觀之，議題取向屬衝突性提問，國內官方消息來源模糊回應之比例 85.42%，明顯高於國外之 64%。追溯及原因，

或許與單一語境之情境有關，由於 Bull, et al.之研究係以政治人物參選人作為研究對象，媒體在提問時語境設定較為多元，相較於本研究之單一語境，形成模糊回應比例有所落差之情形。

基本而言，無論訪問者或受訪者均會針對專訪內容預作規劃與準備，訪問者事先預設之提問內容決定了語境（本研究設定於美中台三者關係），且須在一定時間內完成所有提問，而另一方面受訪者也會在專訪前預先模擬可能提問事項，此種語境限制容易導致模糊語言類型運用之機會。如本研究樣本中之消息來源不斷重複類似回應，導致「製造政策重點」類型屢被運用，因此本研究認為單一語境有可能強化特定模糊語言類型之運用。

（三） 個案背景限制

本研究之消息來源具國家元首身份，甚具官方消息來源代表性，惟其特殊性導致語境及組織框架影響甚深，對於國家政策無法以批判角度具體回應，進而影響了模糊語言類型的選用機率。另在觀察眾多官方消息來源模糊回應內容發現，基於個案背景限制，會有偏好引用特定模糊語言類型如「關於此項問題將會在近日召集會議研究…」或「本案將責請相關單位審慎評估…」等情形。因此，若能針對不同背景個案納入研究範疇，應有助於模糊語言型態之建構。此外，本研究僅限於「語言」之分析及研究，對於表情、態度及行動等未有涉及，欠缺整體性。

（四） 個案推論性

本研究係初探性研究，為突顯模糊語言特性選擇具衝突性語境之樣本，研究對象雖為官方消息來源之典型個案，而依研究結果顯示，也確實印證了國內外消

息來源於問答過程中均有高比例運用模糊語言之情形，但由於樣本個案身份、背景及語言習慣與偏向等因素，導致在相對程度上影響了對於不同身份別消息來源之推論性。例如在本研究中，具有官方身份者面對外界對於涉及公務事項提問易出現對其政策「自我肯定」高比例回應之情形，而非官方身份者則可能較少採取此類回應方式；因此後續建議累積不同類型個案及不同語境之研究，方有利於傳播領域模糊語言理論之建構。

二、 未來研究之建議

由於本研究為初探性質故採單一個案研究對象，且基於個案身分背景之限制使得模糊語言之研究結果相對受到侷限，未能廣泛完整地瞭解不同消息來源究竟如何使用模糊語言，建議未來研究可嘗試由下列方向進行。

(一) 不同個案之研究

探討其他消息來源（如非官方）、語境類型（如不同語境設定）之模糊語言運用。單一個案可能慣用採取特定模糊語言類型，因此建議以不同類型官方消息來源來進行比對，如官方與非官方，官方又可分為中央部會發言人或地方政府發言人等，而非官方又可續分為與政黨發言人或公眾人物演藝人員等研究對象，或可歸納出不同模糊語言運用情形。

此外，未來研究似可以行政首長公開之國內媒體記者會或不同政黨間候選人之辯論會為研究對象，除可免除母語隔閡造成之模糊語言問題外，亦可擴大語境（議題多元化）範疇縮小單一語境可能造成之偏誤現象。

(二) 超越語言層次之研究

本研究主要以訪問者及受訪者間之語言應答內容整理為分析文本，未曾包含聲音及表情。為豐富模糊語言研究的廣度，未來或可將研究過程之聲音、語調、表情及姿態均納入，以使分析內容更加具體與完整。

(三) 擴大語境之研究

由於單一語境設定易使消息來源回應內容造成侷限性，消息來源為塑造「不離題效果」，回應時不斷會重複特定內容，形成特定模糊語言類型重覆被運用之結果。因此若能擴大語境，使其多元化，應有助於客觀觀察及分析模糊語言之類型。本研究建議未來似可擴大語境範圍，除就語境之客觀因素如時間、地點、場合、對象等之設定，同時對於提問內容涉及議題部分亦可多元，以突破單一語境之窠臼。

經檢討分析，綜合前述將不同語境、不同身份個案消息來源納入，以及後續設計如何避免消息來源模糊回應之參考研究架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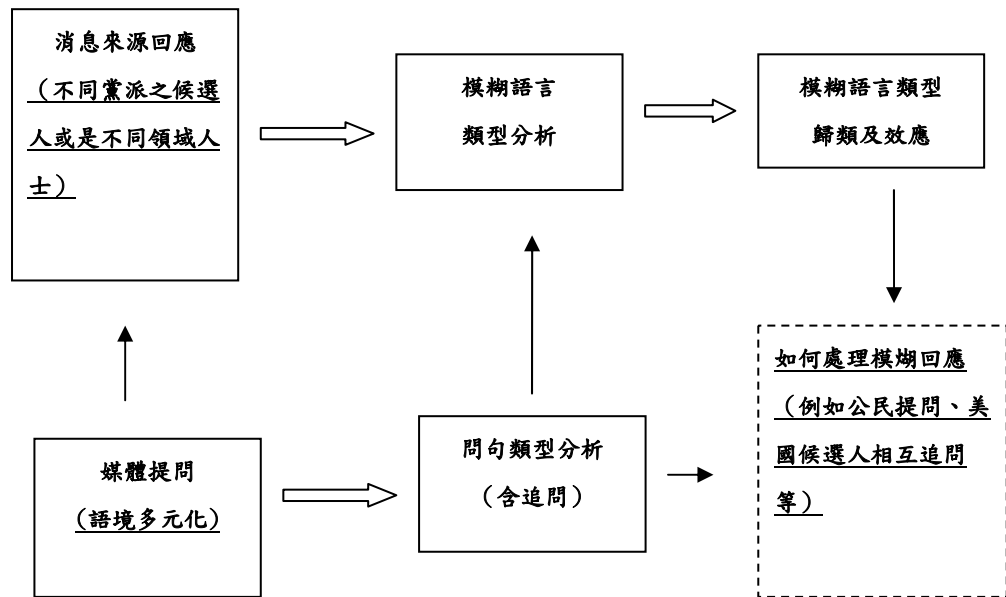


圖 5.1:修正後參考用之模糊語言研究架構

(四) 如何避免模糊回應策略之研究

近日政治人物之模糊語言備受注目，例如觀察正副總統候選人之電視辯論會，各媒體及評論人員皆認為政治人物問答不相符情形十分嚴重，因此陸續提出由候選人交互詰問，或由公民團體進行提問等各式防止政治人物模糊回應之策略，因此可預見的未來，這將是一個熱門的議題，值得發展。

三、結語

觀看每日媒體的報導內容，隨處可見消息來源的模糊語言回應，此與一般所認知之「有問有答」頗有差異。據分析，消息來源之所以偏向採取模糊語言回應除本研究文獻所述之面子威脅、雙避衝突及組織框架等因素有關，似乎亦與媒體報導呈現之效應有關。此乃基因於媒體報導時受到採訪、篇幅及編輯時間限制，

多截取具新聞性及衝突性之素材，而不會說明其報導內容是否取自消息來源「答非所問」之內容。因此當消息來源掌握此關鍵時，「問答不相符」之模糊語言進而成為對官方消息來源有利之傳播環境。

總結來說，在本研究之資料分析歸納出高比例模糊回應，足見模糊語言確實是新聞採訪對象消息來源常用之回應方式，由於模糊語言深具傳播效果，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消息來源運用模糊語言創造媒體傳播效果時，亦有可能造成預期外效應之風險，未來研究不妨可朝此方向進行，探討消息來源使用模糊語言作為其傳播策略之情形。



中文參考書目

- 王德春主編(1987)。《修辭學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 何兆熊(1992)。〈〈語用、意義和語境〉〉。西楨光正(編)。《語境研究論文集》。
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頁301。
- 李金銓(1981)。《大眾傳播理論》。台北：三民。
- 林金池(2009)。〈「合作/非合作」語用原則：論記者與消息來源之語言互動策略〉。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翁秀琪(1994)。〈我國婦女運動的媒介真實和「社會真實」〉，《新聞學研究》，
48:193-236。
- 翁秀琪(1996)。〈消息來源策略研究--探討忠實、聯合兩報對婦運團體推動「民
法親屬編」修法的報導〉。《新聞學研究》，52:121-148。
- 翁秀琪(1997)。《新聞與社會真實建構—大眾媒體、官方消息來源與社會運動的
三角關係》。台北：三民。
- 翁維薇(2000)。〈新聞訪問之追問研究--以模糊及迴避回答為例〉。國立政治大
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芸芸、劉慧雯譯(2008) Denis McQuail (2000)。《特新大眾傳播理論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4th Ed.)》。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
有限公司。
- 喻靖媛(1994)。〈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關係與新聞處理方式關聯性研究〉。國立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臧國仁(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
民。

劉蕙苓 (1989)。報紙消息來源人物之背景與被處理方式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瑞城 (1991)。〈從消息來源途徑詮釋媒體近用權〉。《新聞學研究》，45:39-56。

羅文輝(1995)。〈新聞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向〉。《新聞學研究》，50:1-13。

蘇惠君 (2003)。〈施惠語言在新聞訪談中的運用—再論其記者與消息來源之互動〉。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英文參考書目

- Adoni, H., and S. Mane (1984).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oward and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 323-340
- Ball, S. T. (1990). *Politics and policy making in education: Explorations in policy soci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 Bass, A.Z. (1969). Refining the “gatekeeper” concept: An UN radio case study. *Journalism Quarterly, 46*: 69-72.
- Bavelas, J. B., Black, A., Bryson, L., & Mullett, J. (1988). Political equivocation: A situation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7*, 137-145
- Bavelas, J. B., Black, A., Chovil, N., and Mullett, J. (1990). *Equivocal communic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 Berger, P. & Luckman, T. (1971)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 Bolinger, D. (1978). Yes-no questions are not alternative questions. In H. Hiž (Ed.), *Questions* (pp.87-105).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D. Reidel.
- Breed, W.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 analysis. *Social Forces, 33*: 326-335.
- Brown, J. D. Bybee, C. R., Wearden, S. T. & Straughan, D. M. (1987). Invisible power: Newspaper news sources and the limits of divers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64(1)*, 45-54
- Bull, P. (2000). Equivocation and the rhetoric of modernization: An analysis of televised interviews with Tony Blair in the 1997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 222-247
- Bull, P. E. & Mayer, K. (1993). How not to answer questions in political interviews. *Political Psychology, 14*, 651-666.

- Bull, P. E., Elliott, J., Palmer, D., & Walker, L. (1996). Why politicians are three-faced: The face model of political interview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5, 267-84
- Bull, P. (1998). Equivocation theory and news interview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7, 36-51.
- Bull, P.E. (2003). *The microanalysi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laptrap and ambiguity*.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 Bull, P.E. (2008). Slipperiness, evasion, and ambiguity: Equivocation and facework in noncommittal political discourse.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7, 333-344.
- Burke, K. (1955). *A rhetoric of motives*. Berkeley, 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lark, H.H. (1996). *Using langua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layman, S. E., & Heritage, J. (2002). *The news interviews: Journalists and public figures on the ai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A.A. (Ed.) (1989). Future directions in TV news research.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3, 135-268
- Duranti, A., & Goodwin, C. (1992). *Rethinking context: Language as an interactive phenomen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pstein, E. J. (1975).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UK: Polity Press.
- Fairclough, N. (2001). The discourse of new labou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M. Wetherell, S. Taylor & S. Yates (Eds.), *Discourse as data: A guide for analysis* (pp. 229-266). London : Sage.

- Fairclough, N., & Wodak, R. (1997).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pp. 258-284). London: Sage.
-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altung, J., & Ruge, M. H. (1965).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 64-91
- Gandy. O.H. Jr. (1982). *Beyond agenda 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 Norwood, NJ: Ablex.
- Gans, H.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Gieber, W. (1964). News is what newspapermen make it. In L.A. Dexter & D.M. White (Eds.). *People, societ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pp. 173-182).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erkeley, C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nisci, A., & Bonaiuto, M. (2003). Grilling politicians. A study on politicians' answer to questions comparing televised political interviews and legal examination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9, 384-413.
- Goffman, E. (1955). On face-work: 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 in social interaction. *Psychiatry*, 18, 213-231
- Goffman, E.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Doubleday.
- Graber, D. A. (1989). Content and meaning: What's it all abou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3 (2), 144-152
- Greatbatch, D. (1986). Aspects of topical organization in news interview: The use of agenda shifting procedures by interviewee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8, 441-455
-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 Cole, & J. L. Morgan (Eds.), *Syntax*

-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pp.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aiman, J. (1998). *Talk is cheap: Sarcasm, alien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 J., & Roberts, B. (1981).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news: Mugging in the media. In S. Cohen & J. Young (Eds.).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mass media* (pp. 335-367).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amilton, M. A., & Mineo, P. J. (1998).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equivocatio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7, 3-35
- Harcup, T. (2005). *Journalism: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 Harris, S. (1991). Evasive action: How politicians respond to questions in political interviews. In P. Scannell (Ed.). *Broadcast talk* (pp. 76-99). London: Sage.
- Haverkate, H. (1990). A speech act analysis of irony. *Journal of Pragmatics*, 14, 77-109.
- Hodge, R., & Kress, G. (1993). *Language as ide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 Kennamer, J. D. (Ed.). (1994). *Public opinion, the press, and public policy*. Westport, CO: Praeger.
- Koch, T. (1990). *News as myth: Fact and context in journalism*. New York: Greenwood.
- Kuznetsova, I. (2007). Dialogue Analysis XI .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IADA Conference on 'Dialogue analysis and rhetoric*, University of Münster, Russia. March 26-30, 2007.
- Lakoff, Robin (1973). The logic of politeness; or, minding your P's and Q's, in *papers from the Nin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292-305.
- Lasswell, Harold D. (1948).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 in L. Bryson (Ed.).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 Leege, D. C., & Francis, W. L. (1974) *Political research: Design,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 Lewin, K. (1938). *The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psychological forc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ipman, B. L. (2006). Why is language vague? *Working paper*, December 2006,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Boston University.
- Lupton, D. (1992). Discourse analysis: A new methodology for understanding the ideologies of health and illnes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6(2), 145-150.
- Lutz, W. (1996). *The new doublespeak: Why no one knows what anyone's saying anymore*. New York: Harper.
- Nimmo, D. (1978).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Santa Monica, CA: Goodyear.
- Noelle-Neumann, E., & Mathes, R. (1987). The "Event as Event" and the "Event as New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onance" for media effects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 391-414
- Obeng, S.G. (1997). Language and politics: Verbal Indirectnes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Discourse and Society*, 8, 49-83.
- Philips, E.B. (1977). Approaches to objectivity: Journalistic vs.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In P. M. Hirsch et al. (Eds.). *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Potter, J., & Wetherell, M. (1987).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Beyond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London: Sage.

- Quirk, R., Greenbaum, S., Leech, G., & Svartvik, J.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 Rogers, E. M., Dearing, J. W., & Chang, S.(1991). AIDS in the 1980s: The agenda-setting process for a public issue. *Journalism Monographs*, no. 126
- Rosengren, K. E. (1985).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e paradigm or four? In E.M. Rogers & F. Balle (Eds.). *The media revolution in America and in Western Europe*. Norwood, NJ: Ablex.
- Rosengren, K.E. (1970). International news: Intra and extra media data. *Acta Sociologica*, 13, 96-109
- Rosengren, K.E. (1974). International news: Methods, data, and theor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1, 145-156
- Rosengren, K.E. (1976). International news: Time and type of report. In H. Fischer & J.C. Merrill (Eds.).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astings House.
- Ryan, C. (1991). *Prime time activism: Media strategies for grassroots organizing*.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Sainsbury, R. M., (1990). Concepts without boundaries: *Inaugural lecture*, Kings College. Reprinted in R. Keefe and P. Smith (1996) (Eds.). *Vagueness: A Reader*, (251-26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andman, P.M. (1987). *Environmental risk and the pres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Schlesinger, P. (1990). Rethinking the sociology of journalism: Source strategy and limits of media centrism. In M. Ferguson (Ed.) *Publiccommunication and the news imperatives*. London: Sage.
- Schudson, M. (1991).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In J. Curran and M.

-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Edward Arnold.
- Schulz, W. (1982). News structure and people's awareness of political events, *Gazette*, 30, 139-153
- Shoemaker, P.J. (1991). *Gatekeeping*. Newbury Park, CA: Sage.
- Shoemaker, P.J., & Reese, S.D. (1996).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 on mass media content*. Now York: Longman.
- Sigal, L.V. (1973).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 MA: D. C. Heath.
- Smith, R.R. (1979). Mythic elements in TV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9(1), 75-82
- Snow, D.A., Rochford, k E.B., Worden S.K., & Benford R.D.(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454-481.
- Stewart, C.J., & Cash, Jr. W.B. (1988). *Interview: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Dubuque, Iowa: WCB.
- Turner, R. E., Edgley, C., & Olmstead, G(1975). Information control in conversations: Honesty is not always the best policy. *Kansas Journal of sociology*, 11, 69-89.
- van Dijk, T. A. (1997).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T.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 (pp. 1-34). London, : Sage.
- van Dijk, T. A.(1983). Discourse analysis: It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to the structure of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2), 20-43.
- van Turk, J. (1986).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media content: A study of public relations influence on the news. *Journalism Monograph*, 100.
- Verschueren, J. (1985). What people say they do with words. Prolegomena to an empirical-conceptual approach to linguistic action. Norwood, NJ: Ablex.

- Voakes, P. S., et al. (1996). Diversity in the news: A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3 (3), 582-593.
- Watson, James & Hill, Anniel. (1997). *A dictionary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London: Arnold.
- White, D. M. (1950). The Gatekeeper. *Journalism Quarterly*, 27, 383-390.
- Whitney, D. C., Fritzler, M., Mazzarella, S., Lakow, L. (1989). Geographic and source bias in network TV news, 1982-1984.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33(2), 159-174
- Wodak, Ruth. (1997). *Jazyk. Discurs. Politika. (Language. Discourse. Politics.)* Volgograd, Russia: Peremena.
- Wood, L. A., & Kroger, R.O. (2000). *Doing discourse analysis: Methods for studying action in talk and text*. Thousand Oaks, CA; Sage.
- Zoch, L. M. & Galloway, E. A. (1997). Spokesperson as agenda builder: Framing the Susan Smith investig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EJMC convention, Chicago.

附錄一：媒體對吳院長回應之相關報導

【中央社記者李明宗台北 25 日電】對於監察院長王建煊說「現在公務員裡有一大堆笨蛋」，行政院長吳敦義今天表示，王建煊說的不是全部沒有見地，但人非十全十美，用人就是因材施教，用人用才。

王建煊昨天對前往監察院參觀的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學生演講，除鼓勵學生養成健康價值觀，他也說，「現在公務員裡有一大堆笨蛋」，只會講問題，不能解決問題。

吳敦義上午於行政院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從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有幾十萬公務人員，絕大多數守法守紀、循規蹈矩。至於是否每個人都非常聰明伶俐，既能做事又能說話，能力、品德都很好，可能就不盡然。

他說，有些人可能較會做事，但不擅長說話；有些人可能較能表達，但也許做事速度較慢，不一而足。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一定有些缺點。

吳敦義表示，用人因材施教，用人用才。絕大多數公務員，只要好好發現他的才能，用他的才能，比較不足的地方就幫忙他一點。若用人要求十全十美，天下可用的人就不是那麼多，如「人生小孩，個個拿諾貝爾獎也不太可能」
(<http://www.cna.com.tw/SearchNews/doDetail.aspx?id=200912250061&q=%e7%ac%a8%e8%9b%8b>)。

附錄二：本研究樣本全文（共十七組）

本研究論述內容轉錄自 2010 年 4 月 30 日馬英九總統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國際事務新聞節目主持人 Christiane Amanpour 越洋專訪之全部問答內容。為使研究過程清晰，本研究將研究樣本 17 組問答句轉錄內容如下：

1.主持人：讓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很多台灣人憂心，您並不「支持獨立」—自您當選總統後，您未曾講過台灣將成為獨立國家。

馬總統：中華民國台灣 99 年來一直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沒理由再度宣布獨立。

2.主持人：馬總統，顯然有很多台灣人希望從您口中聽到這句話，或至少聽您解釋不說這句話的原因。且有很多台灣人表示，他們憂心或許您為了討好中國而在台灣主權上讓步。對此，您如何回應？

馬總統：所有這些指控均屬子虛烏有。過去 2 年來，我們與中國大陸就兩岸直航、食品安全、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及司法互助等簽署了 12 項協議。因為這些協議，我們不僅建立了友誼，也解決了兩岸因貿易及投資往來迅速發展而衍生的諸多問題。所有這些協議均有助台灣的繁榮與安定，而且這些協議中沒有任何一項條款對台灣主權或自主有所讓步，而且這些協議均屬公開文件。

3.主持人：我剛才想說的是，如果真的是這樣，為何您目前的民意支持度低迷？我的意思是，即使在您 25 日的電視辯論會後，您的支持度仍未達 40%，而根據民調，您的支持度約為 38%，約 4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滿意。您對

此有何解釋？

馬總統：我們的經濟正在復甦，但尚未恢復到美國經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前的狀態。因此我們會更努力。「國際貨幣基金」(IMF)已預測，我國 2010 年的 GDP 成長率將達 6.5%。因此我確信，我國的經濟好轉後，情況會有所改善。

4.主持人：您希望展現出成果—具體成果的議題之一，就是您希望與中國簽署「兩岸經濟協議」(ECFA)。但您的人民表示，他們並不瞭解 ECFA，並認為 ECFA 將使台灣過度依賴中國。您要怎麼向他們說明？

馬總統：這個協議的全名叫做「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1ECFA 包含 3 部份。第一部份是關稅減免，第二部份是投資保障，第三部份是保護智慧財產權。當我向人民解釋的時候，民眾會瞭解。1 事實上，在週日(4月25日)與在野黨主席電視辯論後，瞭解且支持 ECFA 的台灣人民已較之前大幅增加。因此我很有信心，只要今後持續說明 ECFA 的內涵，人民將會支持我們的政策。且這項政策將對台灣極為有利，不僅是出口增加，還可吸引更多外資。

5.主持人：我是否可以—我想引述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您當選後發表的談話。他呼籲中國與台灣「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您是否同意？而除了 ECFA 之外，您將如何做到這些？

馬總統：除了經濟關係，我們也希望增進兩岸文化之交流。例如，我們已開放數十萬名大陸觀光客來台。他們將—事實上，他們確實能認同—台灣的生活方式—自由、民主與繁榮。

6.主持人：在何種情況下您會同意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

馬總統：我目前沒有與中國大陸領導人會面的計畫。我認為，對兩岸最重要的事，是從經濟協議、文化交流、教育交流開始，為雙方進一步的關係奠定基礎。我認為，兩岸領導人會面的時機尚未成熟。

7.主持人：有人提出，您可能會接受由美國主辦的 2011 年「亞太經合會」(APEC) 峰會之邀請。該峰會將在夏威夷舉行。您是否會接受邀請？當然中國國家主席也會出席。

馬總統：這是一位美國學者提出的假設性問題，我們仍未收到 APEC 主辦單位對此議題的任何資訊。

8.主持人：但您認為，如果從現在到 APEC 舉行之前，您接獲正式邀請——而正如您所說的，您將需要更多關於邀請的細節——您是否會考慮？Q8-1 您是否會接受參加 APEC 之邀請？

馬總統：正如我先前所說，這是一個高度的假設性問題。因為過去我們一直無法派遣高層代表參加 APEC 會議。我不認為這個情況在短期內有任何改變的可能性。

9.主持人：如果您願意的話，我想請問您關於未來的政治情況。您對「一國兩制」的觀點與立場是什麼？例如，就像中國與香港的模式，能適用於中國大陸與台灣嗎？

馬總統：不行。我不認為「一國兩制」對台灣是好的方案，因為台灣與香港迥然不同。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我們選出自己的總統、自己的國會，並且獨立運作。我們希望與中國大陸有更緊密的貿易與投資關係，但確定的是，我們希望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此，我在兩年前就職時，就已經非常清楚地表示，我們將會維持現狀——也就是在1946年制訂的中華民國憲法框架下，「不統、不獨、不武」。

10.主持人：而正如您所知，全世界很多人，包括美國都認為中國是一個日益強大的強權--經濟強權與政治強權。若干人士擔憂中國日漸增長的軍事實力，尤其中國持續增加國防支出，您是否認為中國將成為一個逐漸擴大的軍事威脅？

馬總統：60年來中國大陸一直是台灣的軍事威脅。我們決定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希望透過軍事以外的手段降低台海緊張。

就我們而言，過去兩年來我們已緩和台海緊張，使這個地區較以往更和平。因此，我認為緩和緊張並降低敵對氛圍甚為重要。但達成此事的方式不必然要從事

軍備競賽。我認為我們有其他降低緊張的方法，且事實上我們已做到了。有關我國與台灣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我們完全支持數十年前美中三個聯合公報所反映的一個中國政策。我們無意改變這樣的政策與立場。

11. 主持人：我想繼續探討台美關係——但當然也包括美中關係。過去數年甚至數十年以來，許多人認為這是將引發或可能引發美中衝突的議題。您認為這樣的憂慮是否仍切合實際？

馬總統：是的，這的確是一項擔憂。但已是過去的擔憂。

過去兩年以來，我們在促進兩岸關係方面的作為已緩和緊張情勢。換句話說，我們與大陸達成多項協議，擴大了經貿、投資及文化交流。因此，曾經是東亞衝突引爆點的台灣海峽如今已成為和平繁榮的地區。台美中三邊關係正處於 60 年來最佳狀態。

12. 主持人：談到這裡，在我們休息之前您曾提到降低軍備競賽想法的必要性。當然，最近美國宣布售台價值逾 60 億美元的武器，顯然引發了北京方面極為強烈的反應。我要播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此事的評論給您聽：「美方的行徑嚴重損害中方核心利益，嚴重損害了中美關係。中美在國際與區域問題方面的合作將會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美方要為此負起全部責任。」

那麼，馬總統，這是北京方面的觀點。我提出這點是因為這個問題在美國愈來愈常被提到。我要唸一段美國前官員對台美關係的看法給您聽：羅斯可夫

(David Rothkopf) 年初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雙月刊撰文表示「台灣很小。她能給我們帶來的真正戰略利益非常少。事實上，中國可以隨時取回台灣，不管美國數十年來的說法為何，確實不值得為台灣捲入戰爭。」您對此如何回應？

馬總統：我們並未要求美國捲入與中國大陸的戰爭。我們只是尋求購買防禦性的武器。

事實上，美國所做的是依據「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而「台灣關係法」是美國聯邦法律。我們需要防禦性武器來捍衛台灣的民主。實際上，這不僅符合台灣的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學者的觀點並非反映行政部門的觀點。

13. 主持人：然而，您知道，許多美國人表示—即便美國正在伊拉克、阿富汗竭盡全力打擊恐怖主義—但為台灣甘冒走向戰爭的風險真的值得嗎？因此，我想再次請教您的是：若美國為了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而減少對台軍售，您覺得會發生甚麼情況？而這也是您的目標—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馬總統：如果美國對台軍售少於目前的標準，這會降低這個區域的信心。台灣需要武器來捍衛其國家及民主，而過去2年因為我們努力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已經大幅降低緊張情勢，這比減少對台軍售更為重要。事實上，尤其當台灣正與中國大陸就貿易及其他事務進行談判之際，美國對台軍售可增加台灣的信心與安全感，台灣希望從有利而非不利的立場來談判，也因此華府非

常瞭解軍售會有助維持區域安全。

14.主持人：當然，您提到中國對台瞄準飛彈。讓我問您一個問題，如果可以的話，請您立即回應這個在美國時而被問到的問題：美國為何要為台灣冒這麼大的險？

馬總統：誠如我所說，目前美國承受的風險為六十年來最低，過去的風險遠遠超過現在。A14-1 因為我們採取與中國大陸和解政策的努力結果，緊張情勢已大幅舒緩，這就是為何如同過去政府，現任政府對過去2年達到的成果感到非常滿意。A14-2 我們將持續降低風險並向美國軍購，但我們不會要求美國為台灣而戰，這是非常清楚的事。

15.主持人：讓我們討論另一項中國與全球間--事實上是與西藏間的爭議性議題，您認為西藏自治區的爭議及達賴喇嘛的議題，是否受到或應該受到美方更多或更少的關注？

馬總統：我們也支持西藏自治。A15-1 我們贊成達賴喇嘛與中國大陸當局進行對話，我認為這是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方法。

16.主持人：您是否擔心北京有關網路自由及其它公民社會議題的政策走向？例如，您應該有看到最近谷歌與中國當局的爭議吧?!

馬總統：是的。我們對其中某些爭議確實表達了看法。因為我們距離中國大陸很

近，所以不僅在人權議題上，還包括其他的自由議題，我們也相當關注這類議題。也在很多場合表達過對中國大陸人權議題的關切。

17.主持人：有關亞洲的權力核心，當然美國目前在此區域具有強大的外交、經濟及軍事力量。當您前瞻未來，您是否認為美國仍將維持其在亞洲的領導角色？中國是否將取而代之？

馬總統：我認為在此刻美國扮演著較重要的角色。但我認為，在軍事不平衡的情況下，未來的情況將有所改變。這就是為何我認為此區域的國家應該共同致力降低緊張，進而促進穩定與和平。

主持人：馬英九總統，十分感謝您參加我們的節目！

總統：謝謝，Amanpour 女士。